



历史战争私家收藏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钓鱼」查码
 上海「间谍门」杀伤美国总统 和尚也疯狂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死也要面河东方」
 姚燮也当官？「五百年」遇的伟人」
 私善老板支持谍报网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帝国的青春躁动 「清廷神社给我留个位」
 「大清全民都朝敌」 日军「恢复中华」
 高升号：黄海上的一国演义
 操江号：故国不堪回首
 重庆号：中国「刁民」抗日

绝版晚清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Overseas Records

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脊梁
 盖尔人号：美国军火专家日本落网
 第三部分 甲午战争：中日战争前后的档案
 奥必活动：满清岂可称中华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第四权力：媒体也是战斗力
 「无能事人，焉能事鬼」 「霞美外交，料事政治」
 当「鬼使」遭遇「神童」
 反清发明的解放者
 有国才有家：大梦难先觉
 大清精英缘何自尽？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自宫 「海龟」大对决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大清朝的抗日皇子之军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日本小村庄立碑纪念侵华

「澳大利亚」雪珥 著

绝版

甲午

——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文匯出版社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和讯
HXW.COM

搜 狐
SOHU.COM

sina 新浪

网易 NETEASE
WWW.163.COM

名家热评

十多年来，雪珥在澳大利亚默默地收藏、研究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战争文物，积累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复杂、多样和精彩。

他第一次如此详尽地揭开了100年前在华日本间谍网的全部秘密，具体到某日某时，现场的人物、情景。这是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足以成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书”。

他有望填补或加强某些国内空白，比如直接导致甲午海战的高升号事件。雪珥可以说是第一个从国际法、国际关系角度系统分析此类事件的华人学者。

他改变着我们中很多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他对史料的发掘令人如坐针毡、如鲠在喉，他的那些精辟、有时锋芒毕露的史论，也一次次地震撼了我们的耳膜，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也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刮目相看。

ISBN 978-7-80741-604-3



9 787807 416043 >

定价：29.80元

历史战争私家收藏



「澳大利亚」雪珥 著

绝版晚清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Overseas Records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 (澳) 雪珥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10

(绝版晚清书系)

ISBN 978-7-80741-604-3

I . 绝 ... II . 雪 ... III . 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 - 史料 IV . K2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7914 号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策划编辑 / 文 京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翁 涌

出版发行 /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 × 100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115 幅图

印 张 / 14.5

印 数 / 1-8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604-3

定 价 / 29.80 元

自序

1

一艘“勇敢级”(Daring)驱逐舰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从电脑前一抬眼，就能看见它那灰色的舰身和4.5英寸的主炮。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星”国旗，在舰首旗杆上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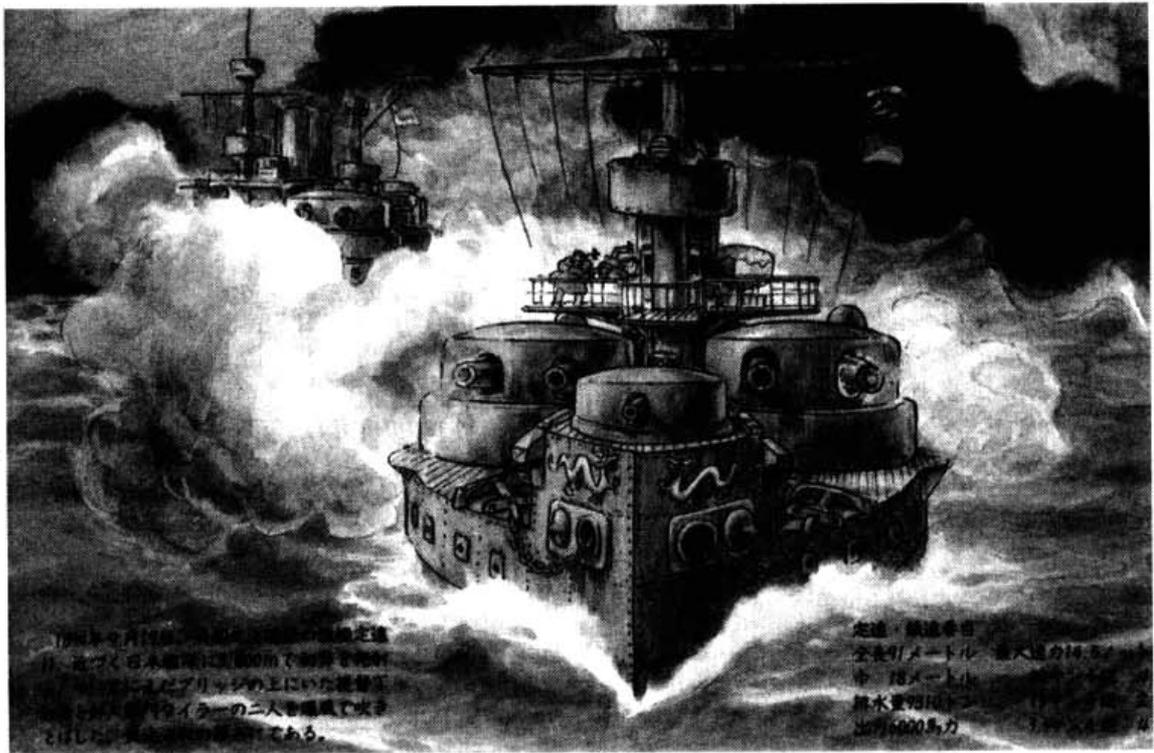
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我都会无数次地从楼上俯视这艘军舰以及与它并肩停泊的一艘潜艇。南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这些作为海事博物馆展品的退役舰艇。它们也如同家中的宠物那样，不时需要开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坞去检修，每逢它们要移动的时候，我都会赶紧下楼，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海狼们”的动作，百看不厌。

很难想象，这个宁静而时尚的“情人港”(达令港，Darling Harbor)，曾经是抗日的第一线：入侵的日本潜艇惊扰了整个悉尼，当妇孺们被转移到蓝山(Blue Mountain)后，男人们便扛着枪炮，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而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美丽的海滨。

在澳大利亚这个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孤独大陆上，二战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几乎是唯一能找到的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遗迹，尽管日本“皇军”的铁蹄一步也没踏上这块国土。

每次当我走过那艘满载时排水量也才3888吨的驱逐舰，总会想起比它年长一个甲子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那两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侧目的中国主力舰，排水量为7000吨，主炮口径为12英寸。如果与它们并列，眼前这艘澳洲军舰，将会显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定远和镇远舰如今又在何处呢？

日本人在这个城市依然顽强地展现着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不再依靠枪炮，也不依靠人多势众。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VB)左近开设了澳洲分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



日本现代漫画中的定远舰

相比亦不遑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

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2

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

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采过或不屑于开采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爆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3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摒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4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来、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历史已经证明，“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正是造成“大中国”总是胜不了“小日本”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爱国”是需要行动的。

历史研究，或者仅仅是尝试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还是史料。史料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闻采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基本条件。

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要具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两种秉性：要像新闻记者那般敏锐，也要像律师那般挑剔和严谨。这是我所从事过的两种职业，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两种职业的训练，才能使我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宝贝，也能使我从不迷信任何既定结论或任何权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总觉得自己还应是个籍着史料、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采访的记者，多看、多记、多思考，这样的“历史新闻”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摸到整只象，更不应假装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谓的全局。这样，当我在自以为历史或许是条毒蛇的时候，就不会对他人认为历史是面战鼓而感觉震惊。

因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却有幸摸到了那伟大的象屁股。这时候，我只能说：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 2009年5月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自序 1

第一部分 谍战甲午：日本间谍潜伏记

-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2
- “钓鱼”密码 9
-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11
- 和尚也疯狂 18
-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25
- “死也要面向东方” 31
- 教授也当007 38
-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47
-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53
-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59
- 帝国的青春躁动 66
- “请在神社给我留个位” 71
- “大清全民都腐败” 76
- 日军“恢复中华”？ 80

第二部分 帝国波涛：史海中的几艘船

- 高升号：黄海上的三国演义 88
- 操江号：故国不堪回首？ 113
- 重庆号：中国“刁民”抗日 119

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脊梁 129

盖尔人号：美国军火专家日本落网 141

第三部分 帝国宿命：中日战争背后的博弈

舆论动员：满清岂可称中华 148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155

第四权力：媒体也是战斗力 159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63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166

当“鬼使”遭遇“神差” 171

反清复明的解放者 175

有国才有家：大梦谁先觉？ 178

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182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186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188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自宫 192

“海龟”大对决 197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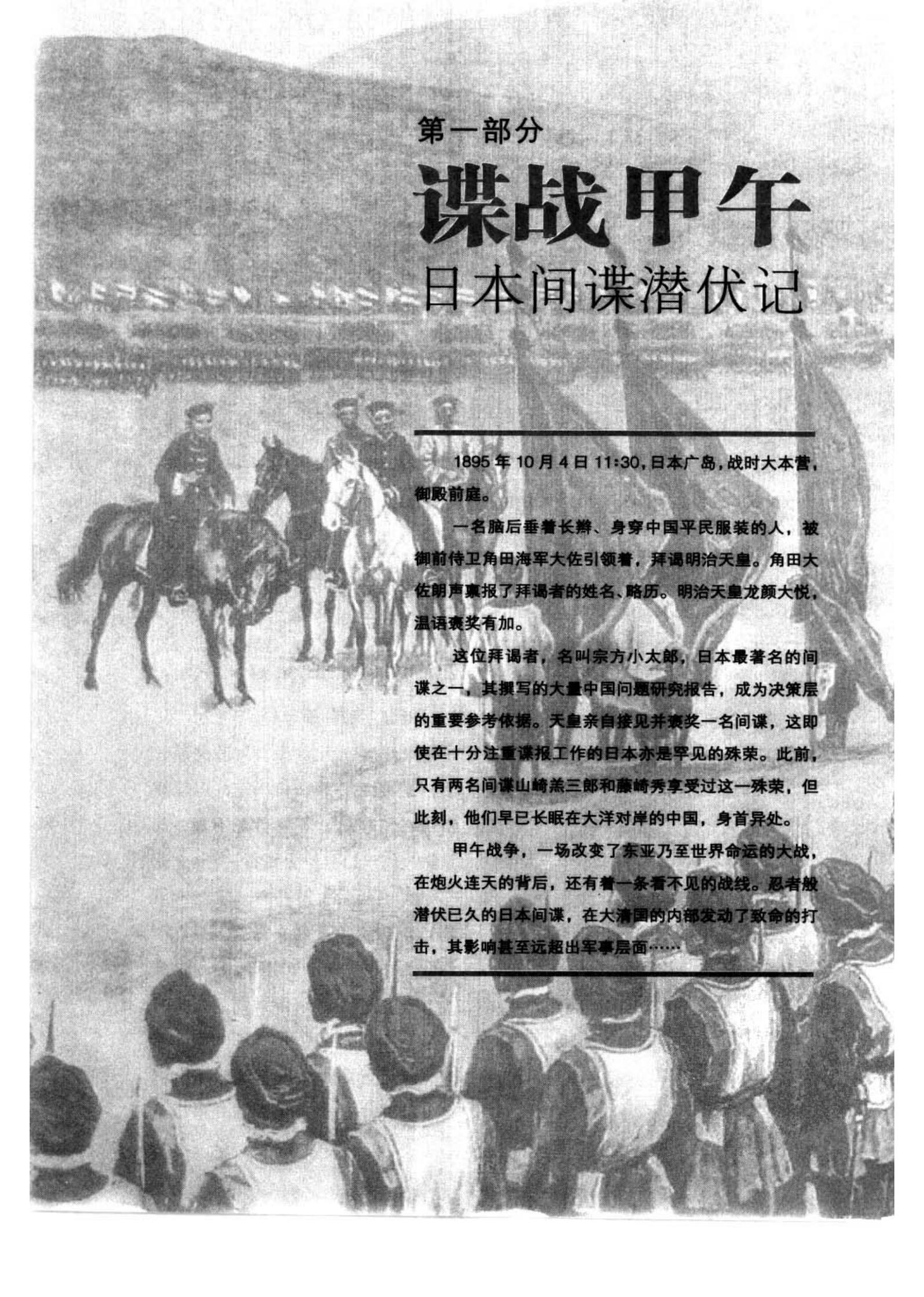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军 205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209

日本小村庄立碑纪念侵华 213

后记

主要参考资料



第一部分

谍战甲午

日本间谍潜伏记

1895年10月4日11:30,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御殿前庭。

一名脑后垂着长辮、身穿中国平民服装的人,被御前侍卫角田海军大佐引领着,拜谒明治天皇。角田大佐朗声禀报了拜谒者的姓名、略历。明治天皇龙颜大悦,温语褒奖有加。

这位拜谒者,名叫宗方小太郎,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其撰写的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成为决策层的重要参考依据。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一名间谍,这即使在十分注重谍报工作的日本亦是罕见的殊荣。此前,只有两名间谍山崎羔三郎和藤崎秀享受过这一殊荣,但此刻,他们早已长眠在大洋对岸的中国,身首异处。

甲午战争,一场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命运的大战,在炮火连天的背后,还有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忍者般潜伏已久的日本间谍,在大清国的内部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其影响甚至远超出军事层面……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忻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忻，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与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忻承认这些都是



1894年正当甲午战争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

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

张仲忻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这一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英国画师所绘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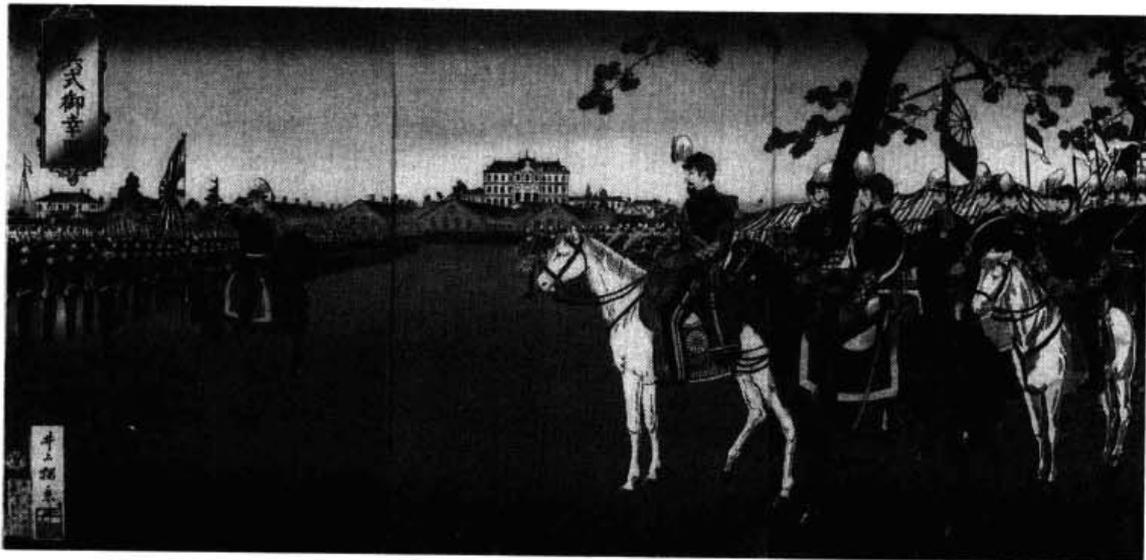
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祸首。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记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



浮士绘：明治天皇阅兵图。谍报工作在日本的崛起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

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曾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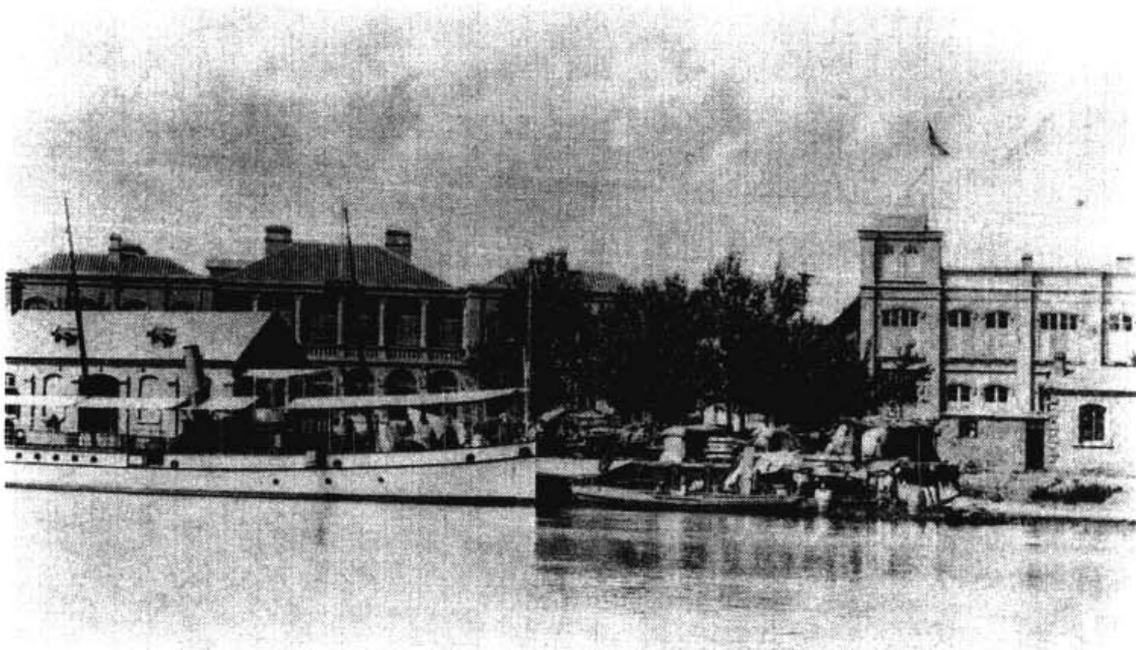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查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分别为中日两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捕内有次郎、福原



清末天津法租界码头，左上建筑为天津海关。

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六天后（8月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

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

伍一终于被官府捕获。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

“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

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囑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

《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酷刑逼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

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诘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晓他的案件居然引发如此剧烈反响，不知会做何感想？

“钓鱼”密码

日本外务省的“周到服务”，显然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已经一反常态地翻译成了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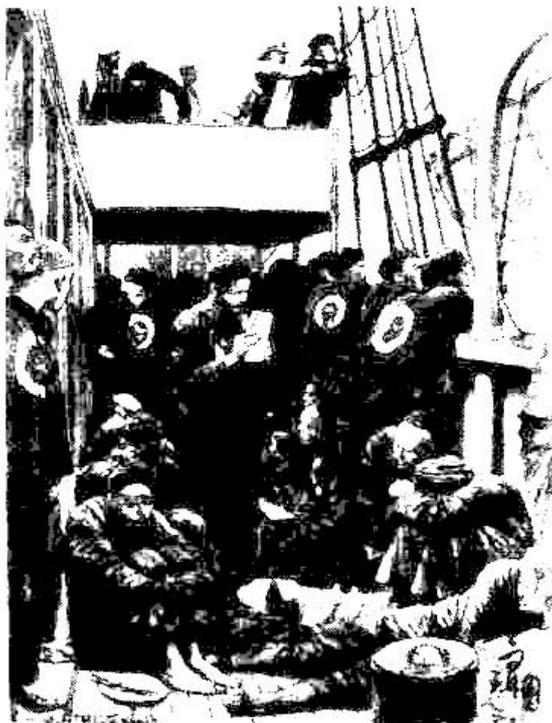
这是1894年6月22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的事宜，双方已经来回折冲了近20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汪凤藻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显然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呢。

汪凤藻将“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毕竟省下了一道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程序。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但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主动花了点日语翻译成中文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他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



清政府密码泄露，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造成清军巨大的被动。图为清军在开赴朝鲜的轮船上。

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直到193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对此都懵然无知。而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年，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具体负责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期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

百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对此细节多未重视，而美国人却似乎受到了启发。这一用“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战局大为改观。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

JAPAN'S EXECUTED SPIES

Correspondence of Consuls and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

GRESHAM'S REPORT TO THE SENATE

Entire History of the Surrender of Two Japanese Found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Claimed by China.

WASHINGTON, Jan. 16.—The President to-day transmitted to the Senate copies of fifty di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case of the

《纽约时报》于1895年1月用整版篇幅刊登上海“间谍门”事件中美国国务院与驻华外交官之间的往来函电

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上海间谍丑闻”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带来了一场政治风波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驾，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叫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叫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毕业后他加入了上海日清商品陈列所，回到日本，在九州、中国（日本地名）、大阪等地调查海产品。1894年，他陪同横滨贸易新闻社社长，到中国内地调查了数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开始实际从事间谍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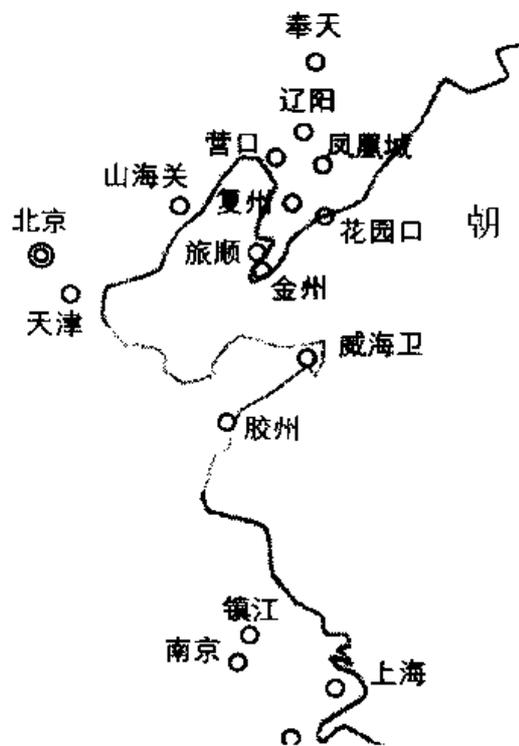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土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

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毕业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冈山县名刹国清寺随海晏法师参禅。1893年11月，他与同学高见武夫一道回到上海，临行前，海晏法师还各赠送他们一把宝刀。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以商人名义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预定的计划是，先乘船到营口，经辽阳抵奉天，再去辽阳，返回奉天后将情报以电报发到上海，然后再前往凤凰城，将沿途所见军情随时报告；之后向鸭绿江行进，调查入朝清军数量及沿途军情，提供给已经在朝鲜境内的日本第一军，然后为该军带路。布置这一任务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陈，这一任务实在很艰难。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原定的8月11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日才能开行。考虑到两人同时从日清商品陈列所出发会引起怀疑，遂决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栈去。福原先在12日搬进客栈，楠内则于13日搬进，另一刚从满洲回到上海、准备与他们同行的间谍景山则住进了全安客栈，三人装作互不认识。

8月14日半夜，楠内、福原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



潜伏在上海的楠内、福原，准备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图为1894年辽东半岛及相关地区地域分布图。



图为清末上海道台衙门的中国官员

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的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u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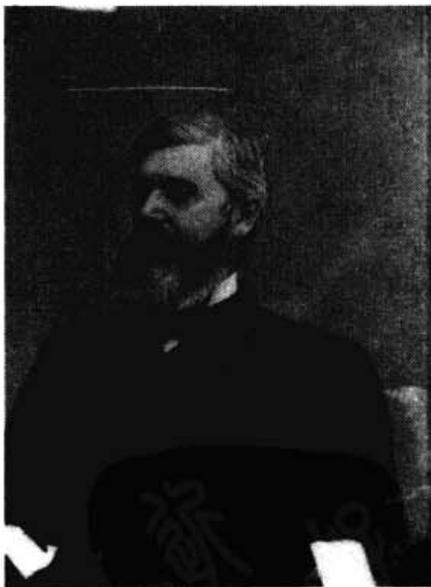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于9月3日下午5点在大东门外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上海道台（根据宗方当天日记）。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后破获了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间谍案，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美国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

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认为，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瘁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

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大清国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和尚也疯狂

1894年8月19日，浑浊的东海洋面上，一艘从镇海开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宁轮正在鼓棹前进。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节（鬼节），普陀山上要举办盂兰盆法会。来自全国各大寺庙的僧人们云集普陀，武宁轮几乎成了和尚的专轮。

旅途寂寥，又是难得的同道大聚会，僧人们在船上相互倾谈交游，十分热闹。但当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僧人，似乎与众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头皮上，并没有中国和尚独有的戒疤，而且举止相当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发现他似乎对教义不感兴趣，或对交游不感兴趣。但和尚们执著，不断地去“骚扰”他，终于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围的僧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说的是一口日本话！

此时，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一带正在大抓日本奸细，几乎人人都已经晓得日本兵舰将大清国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击沉，死了上千名士兵。出家人再与世无争，毕竟也还有国家概念，众人便将这位说日本话的年轻僧人控制住了。

船将到普陀，清军水师的元凯兵轮前来例行检查，元凯号的大副、把总贝名润登上了武宁号。这位说日本话的和尚，用并不流利的官话，自称是广西人，然后又说是贵州人。贝名润见他言语支离，而且没有随身行李，就进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纸笔、普陀山僧人名单、怀表及洋银22元，形迹十分可疑，遂将其逮捕，带到兵轮上看管了起来。

大清的和尚们一点都没搞错，这位正是日本间谍藤岛武彦，假冒和尚要

到普陀上与另一位日本间谍高见武夫接头。那位高见武夫在普陀山的法雨寺以参禅为名已经潜伏半年多了。

一起和尚间谍案掀开了帷幕。

藤岛武彦出生于日本鹿儿岛人一个藩士家庭，顺应当时日本潮流，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虽体现出了“胆气绝伦”的一面，但因数学、英语成绩很差，学业堪忧，后经前辈指点，决意到中国大陆发展。

1888年，藤岛19岁，就加入汉口乐善堂，随即被派往西北考察。藤岛的任务是配合另一重要间谍浦敬一，图谋劝说新疆巡抚刘锦棠联日抗俄，甚至希望能进入刘的幕僚长期潜伏。

湘军名将刘锦棠（1844—1894），早年随同叔父刘松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军功卓著。1870年，刘松山在镇压回部叛乱中阵亡，经左宗棠推荐，遗部由年仅26岁的刘锦棠接手。1875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刘锦棠担任统领，总理行营营务，运筹帷幄，被叛匪惊为“飞将军”。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其地位不仅是封疆大吏，更是对俄外交的关键人物。

作为在华最大的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次西北行动极为重视，堂长荒尾精专派“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平户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乐善堂行动计划十分周密：藤岛武彦携搭档大屋半一郎先行，随身带价值1000余元的书籍和杂货，到兰州先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以回收的货款作为浦敬一进入新疆的费用。

哪知刚出汉口不远，藤岛就遭到了水匪打劫。令水匪惊奇的是，这位自称来自福建的年轻书商，看到劫匪却不慌乱，从容对答。他对劫匪的头目赵某道：“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为可惜。”

根据日本的传记材料介绍，藤岛是位眉目秀丽的美青年，姿容宛如美女。面对这位“小帅哥”，赵老大倒也爽快，讲了一通官逼民反、无奈落草之类的套话，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赵老大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给了

他一份大礼：一支崭新的手枪。喜出望外的赵老大表示，将传令沿江数千徒众，对该书商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但藤岛在和水匪赵某分手之后，赵某却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达襄阳后，赵某已被梟首。藤岛便乘官府疏忽，将赵某的首级盗回。看守们一路追赶藤岛到汉水边，藤岛无奈，便将赵某的首级绑在腰间，纵身跃水，游泳逃逸，终因体力不支，而在登岸后人事不省。他醒过来后，便在岸边将赵某的首级掩埋，再通知赵的手下前去挖掘。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民国时期撰写《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的钟鹤鸣，因此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乐善堂作为侦察重点的有六类中国人：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不惜时日前往营救赵某。

藤岛中途遇寇和营救寇首，毕竟耽误了时间，浦敬一等在兰州苦候30天，不见踪迹，盘缠用尽，只好放弃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乐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岛武彦两人化装成华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汉水北上，再弃水登陆，翻越终南山，到达西安。两人从1889年3月末离开汉口，5月初方到达西安。在西安盘亘一个月，将所携带的书籍、杂货售出以作为盘缠，又辗转三个月后方于9月份到达兰州。但盘缠用尽，只好分手。藤岛武彦分得18两白银，返回汉口；浦敬一则带着剩余的50多两，独自入疆，并从此失踪，成为日本间谍史的一大悬案。

弱冠之年的藤岛武彦，至此已两次膺任西北考察重任，可见乐善堂对这一位最年轻间谍的器重和栽培。

除了与水匪的遭遇外，在日本史料中，藤岛还有另外两次奇遇。

一次是在河南，他看到当地壮汉恃强凌弱，便出手相救，夺过棍棒将那家伙教训了一通，乡民们十分感激，称呼其为“少年豪杰”。

还有一次在江西庐山，他在山中迷路，见到有三人正在生火煮粥，便过



日清贸易研究所间谍学员集体合影

去烤火，并要了粥喝。此三人其实是山贼，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从山里出来，还以为是妖怪现身呢。藤岛吃完后便睡。山贼们发现了他带的大笔盘缠，便起了歹意，想盗走。哪知藤岛忽然睁开眼睛，大吼一声，并拔出了短刀，吓得三名山贼反落荒而逃。三人下山后，就报告官府说山上有细作，官府派人前来抓捕，与藤岛发生激烈搏斗。藤岛的短刀误伤了自己的右前额，血流如注，终于被捕。在狱中，藤岛坚称自己是琉球人，居住在福建，出来旅行而已，但还是被判处了斩刑。在处决之前，山贼中有一人在行劫时被抓，坐实了他们是“诬告”，藤岛终被释放。这是藤岛间谍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遭遇。

西北之行失败后，1890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间谍在上海筹办另一家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办所经费困难，藤岛武彦遂返回大阪，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时，日本谍报多靠私人赞助的浪人组织完成，官方的财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间的“爱国热情”维持。

1894年中日开战后，藤岛武彦乘德国客轮再渡上海。此时，日清贸易研

究所由日本参谋总部所派的谍报军官、“中国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间谍前往辽东，策应日军登陆。8月中旬，藤岛武彦亦被派往东北，为日本第一军先遣队担任向导。但藤岛在返回日本时已剪去发辫，很难再伪装成中国人。踌躇之下，根津一决定干脆让藤岛伪装成和尚，先到普陀山会合另一潜伏于法雨寺的间谍高见武夫。

高见武夫是日本冈山县人，日本黑龙会所编的传记资料里说他“平生寡言沉默，手不释卷”。他曾在闲谷黉就读，和福原林平是同学兼好友。1890年在东京的哲学馆（东洋大学前身）学习宗教哲学，随后在镰仓圆觉寺学习禅学。

一个偶然的机，他在圆觉寺见到了荒尾精。两人交谈之下，相见恨晚，高见自己的记载说，两人在夜晚且饮且谈，常至深夜。潜藏在高见武夫内心深处的“东亚经纶”雄心被激发出来，他便接受了荒尾精邀请，与福原林平一起前来中国。出发前，两人前去冈山县的另一名刹国清寺，拜见住持海晏法师。这位日本高僧不仅佛学修养高，似乎也很爱国，他给他们出具了前往普陀山寺庙的介绍信后，发现了他们行李中的日本刀，就说：“你们的刀太钝了，为了给你们壮行，我送你们一把宝刀，陆上可斩犀牛，水中可屠蛟龙。”不杀生的和尚，却向间谍赠送杀生利器，这也算是日本佛界的奇怪现象。高见被杀后，日本有人吊之曰：“自重元人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说的就是这把可屠蛟龙的宝刀。

1893年11月两人到达上海。半年之后，高见受命前往普陀法雨寺，名为坐禅，实际上是潜伏待机。

藤岛削发后，搭乘8月16日的渡轮，从上海前往普陀山。19日，在镇海换乘武宁轮（又称江天商轮）。未想到，却因船上和尚太多，而露出了马脚被捕。

藤岛被捕后，只承认自己是日本大阪铁商，到普陀山是为了找到高见约其一同回国。问他：“既称铁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现因中倭开仗，来往不便，故由上海削发来镇（镇海）”。

正好此时法雨寺的方丈化闻亦在镇海，他证实寺内确有个日本僧人高见，是今年正月里才来的。官府遂派船将高见押到镇海，将他混杂在众僧人中，令藤岛辨认。

高见与藤岛从未谋面，混于众僧之中，藤岛哪里能辨。按宁绍台道吴引孙在报告中的说法，藤岛“相视良久，茫然莫识”。因此，吴引孙认为：“藤岛改扮僧装，行踪甚为诡秘；供词亦极闪烁，难保非图混入内地窥探军情。尤恐有华人作奸，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随即令候补通判梅振宗、鄞县知县杨文斌会同审讯，随后吴引孙也亲自审问，但藤岛供词依旧。

吴引孙无奈，对藤岛用上了大刑。藤岛熬刑不过，“于无可分辨之时，始据供称系上海日本大越领事遣其来甬。并称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盘问，故先落发”。再问他是否刺探军情，以及同伙等，则咬牙忍受酷刑，绝不招供。

藤岛在供词中说：“有一个姓福的东洋人，住在上海跑马场开杂货店，与高见是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国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动身，……七月初四日到上海；会见那前在汉口领事处写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带领小的去见驻上海日本领事大越大人。那大越当与小的盘费英洋二十元，囑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见和尚同到上海，可与小的一同回国。并没别言交代，也没应许赏官赏财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国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见说他有病在家的话。因想日本人到中国来不便，故于十七日剃落头发，不为识破日本人了。况且小的会讲中国话；普陀地方东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轮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家私兼开店业，汉口、上海认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讯。小的实受领事所托，去到普陀接高见，并没做奸细，探听炮台洋面消息事。求宽恩是了。”

吴引孙密令定海厅同知赵惟崧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并未发现除高见之外的其它日本间谍踪迹。再三提审藤岛和高见两人，口供如前，没有实质进展。便将藤岛送押到鄞县大牢，高见则交给城内的天宁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并要求僧人们将可能前来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获。同时，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总理衙门提交了报告。藤岛一案，因查无实据，只好暂时搁置

下来。

就在藤岛被捕的前两天，上海也破获了日本间谍案，在中国政府要求下，两名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内被中国差弁抓获，但法国人坚持将他们送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看管。中日开战后，双方均邀请美国代为照管在对方国家内的财物和人员。

9月下旬，上海谍案的两名间谍供认不讳，坐实了藤岛与高见的间谍身份。藤岛也即招认，其得到日本总领事大越的密令，并领取了密码，计划会合高见后，一道测绘中国地形，窥探军情。

案情查清后，根据大清律，“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军情者，不分首从皆斩”。10月27日，根据电旨，浙江巡抚饬将藤岛、高见两犯押赴杭州清波门外执行斩首。藤岛时年25岁，高见27岁。

高见被处刑这日，狱卒假称要释放他，等槛车来到清波门外刑场，知道自己已无可免，便向监刑官索要了笔墨，写下了绝命诗：

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不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付与断头机上雷。

而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则记载了藤岛在供词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两年后，1896年6月，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的日本，派员前往杭州，起出了两人的尸骸带回日本。

1938年，钟鹤鸣在其《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感慨道：“我人对彼辈（指日本间谍）之用心，固宜深恶痛绝，但若辈之不惧艰险，为祖国作侵略先锋的行动，以与国人早期之仅事口头呼号，不曾在实际上用功夫以救祖国危亡者相较，国人思之，能无汗颜？！”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一个日本间谍，化装成中国人，在东北刺探军事情报，饥寒交迫中却蒙一家中国人相救。日后日本军队攻占了该地区，在残酷的大屠杀中，该间谍“知恩图报”，令日军保护该户中国人，并将该户少年送到日本留学。这就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中日亲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向野坚一（1868—1931），日本著名的军事间谍，在甲午战争中立下大功。

向野坚一是福冈县人，曾就读于明善义塾和县立修猷馆，1890年来华，受训于间谍机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时年22岁。1893年毕业后，他先奉命在长江沿岸调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大多数间谍一道，随日本侨民撤回长崎，随后被派到大本营所在地广岛。

向野等十余名在上海受训的日本间谍，早在四年前就开始蓄养长辫，认为这“对于研究中国事情有很大好处”。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的辫子已经长达一尺二寸多，再加上流利的中国话，足以乔装进入中国。

日本大本营对这群“中国通”十分看重，在宣战的当天（1894年8月1日），参谋本部特别召见了向野坚一与藤崎秀、山崎羔山郎、钟崎三郎、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六人，勉励他们“为君国尽最大努力”，日本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为他们亲自训话。六人还得以拜谒明治天皇，这令他们“铭感至深”，觉得“沐浴着无尚的荣光，立誓舍身报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这六人随后编为“特别任务班”，准备执行渗透侦察任务。10月16日，他们随日军第一师团从广岛出发，前往中国前线，仓促之间还穿着西服。10

月19日，舰队停靠仁川港口。当晚，日本军舰高千穗号前往旅顺侦察，在花园口近海海面捕获了四名中国渔夫，把他们的衣服强剥下来，作为间谍们的乔装用具。10月22日夜，“特别任务班”受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亲自接见，随即接受了任务。各人分得马蹄银一块，约有三十两，作为旅费，由军舰上的水兵帮助切成了小块银两。向野负责侦察普兰店、复州一带的清军设防情况。

次日，舰队离开朝鲜前往中国，第一师团足有二十只运输船，并有十六艘军舰护航，向野在日记中为此“日本开国以来最大的远征”欢呼：“呜呼！日本帝国之海陆军竟进出到北方，可谓强盛，足以压倒欧洲，成为无与伦比的东洋强国，旭日军旗也为之更加辉煌灿烂。”

10月24日，日本第一师团在无兵设防的花园口顺利登陆，“特别任务班”便开始行动。在出发前，几位间谍互相议论此行凶多吉少，不知谁会先死，为便于认尸，遂相约将中国布袜子的袜带只系上两条，以此为凭。果然，六人中只有向野一人生还。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接见“特别任务班”，勉励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国家，义勇奉公”。师团参谋长大寺安纯大佐“洒泪”下达出发命令。

为免引起中国人怀疑，他们故意错开时间，最早的午后一点出发，向野殿后，傍晚五点多才出发。

向野穿着中国服装，背着中国式的“钱褡子”，长约三尺，宽约七八寸，两头放东西，中间折起后扛在肩上。三十多两碎银则用布包着，揣在腰里。他出发前日军第一联队已经开拔，结果他被日军当做当地人抓了夫役，扛着重物，走了一里多地后，见周边没有其他中国人，他才向日军说明真实身份，被放了出来。

次日凌晨，他从碧流河上游徒涉过河，事后证明，这是他第一次逃脱死神之手。因中国军方加强了谍报防范，乘坐渡船过河必须出示红色通行证，从下游过河的另三位间谍便因此落网被杀。

过河后，向野坚一在王家屯被当地百姓当做日本派来做间谍的朝鲜人而

被捕，当时他的靴中藏有绘制的军事地图，为了消灭证据，在押往貔子窝清军兵营途中，他故意踩泥水行走，将靴中的地图弄湿踏烂。他向押解的百姓诡称是福建福州人，以解释其古怪的口音。他说：“我实在是福建福州人，家中有父母双亲，如今蒙冤被捕，如我回不去，我父母亲会饿死的。你们如可怜我的实情，肯释放我，我死也不忘大老爷的恩德。”边说边哭，还跪下来不住磕头。然后，他把腰里的一块碎银递给押解者，说绑得太紧了，手都疼了，希望能松一松。被松绑后，他就趁天黑跳崖逃脱，以北斗星为准，向西拼命逃窜。邻近村庄的百姓都出来围堵，他终于逃离追捕后，找个僻静地方磨断了绳子，继续前往复州城侦查。

途中，在中国淳朴百姓的多次热心帮助下，向野才得以解决吃饭问题，但帽子、夹袄等均已失落，在加上大雨和冰雹，晚上露宿“倍感寒风彻骨”。

10月28日，他到达复州城，城内驻军已经被调往金州。侦察完复州后，他在前往普兰店途中迷路，露宿于黄旗大屯龙王庙门口，在此便发生了后来被他浓墨重彩渲染的“中日亲善故事”。

当夜天冷，屯中有一村民姜德纯主动邀请向野至家。姜家老父姜士采为村中私塾先生，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李宝林的向野便和他笔谈《论语》、《诗经》，甚为投机。

笔谈中，向野坚一还了解了更多的当地军情，比如复州驻军四五百人已经开到金州去，盖平的清军也要望金州集结等。姜家烧熟了炕后，向野坚一终于睡了开始侦察以来的第一个好觉。他在日记中写到：“此夜，上天怜此哀民，使我得以避朔风之寒苦，真是厚承皇天之恩！想到此，不觉潸然泪下。”

次日清晨，主人拿出玉米粥、黑豆豆酱和猪肉小菜招待他，又送了两个玉米饼作为中饭，送他上路。向野坚一向主人赠送一小块银子，却被主人坚决辞谢。

向野坚一在前往普兰店途中被清军多次盘查，均被他侥幸蒙混过关。10月30日，他到达普兰店，顺利进行了军情侦察。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所有预定任务，但他认为，金州离此仅四五里路，如果受命侦察金州城的藤崎秀

出意外的话，金州重镇的情报就无从得知了。但毕竟关乎自己生命安危，他也多少有些害怕，于是就拣了小石子占卜，卦象显示金州可行。

当夜，他露宿金州城外，次日混在菜农队伍中顺利入城，将金州布防情况看了个遍，并意外发现了清军在石门子地区布防。后来日军进攻金州时，根据向野坚一提供的情报，绕过埋有地雷的石门子，从二十里堡实行进攻，避免了伤亡。

向野的功绩受到了日本军方的高度赞赏，12月24日在师团司令部的宴会上，他被山地中将称为“我们的爱子”，甚至连乃木西典等著名将领也为他斟酒，礼遇甚隆。

1895年5月1日，在复州随军行动的向野坚一，决定去拜访姜家，“以尽礼节”。几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黄旗大屯姜家。姜家人却早已忘却此事，



图为作为商人的向野坚一从北京回日本时与家人及创办《骨肉》杂志的子孙们合影。图中的MOTO后来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直到其在1994年去世，享年91岁。

经向野坚一反复提醒,才知道眼前这位日本军官就是当时的落难人。两人“回想去年相逢事,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向野坚一记载道:“我作为一个曾被救助的落难人,语言难以表达我此时的快活。”

向野坚一将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特别奖励给姜家的5元日本银币送上,双方又是一番推谢。此时,村民们也围拢来看新鲜,据向野日记记载,村民都纷纷称赞他是一个“不忘恩德的人”。向野向姜家表示,日本军队将对他们家族给予保护,并请他到当地日本驻军指挥部一起吃饭,当面将保护之事落实给当地日本驻军,又带驻军军官到姜家串门,并给姜家老父留了一封书信。向野坚一办完这些回到师团部,师团长山地元治等高级军官为此“中日亲善佳话”十分高兴。

一周后,5月7日,姜家老父在孙子姜恒甲的陪同下,前来探望病中的向野坚一,送来了十八个鸡蛋和四只鸡,并要求向野将其孙子姜恒甲收为义子。向野很兴奋地答应了,承诺将姜恒甲安置在日军建立的行政署工作。

5月18日,向野坚一离开复州,姜家前来送别,向野坚一“想到复州从此难以再见时,不禁怀恋此地的山和水”。

此后,向野坚一将13岁的姜恒甲引荐给另一日军将领桂将军,桂将军很喜欢这个中国男孩,便提议将他带回日本留学。姜家十分兴奋。6月17日,姜恒甲来到金州准备奔赴日本京都。向野坚一送别姜恒甲时,“姜含悲告别”。当日,姜恒甲的父亲姜德纯也到金州买马,向野坚一热情招待。姜恒甲到日本后,在名古屋小学毕业,随后在京都中学学习三年,后到神户的广和号上工作。日俄战争时,姜恒甲成了煤炭商人,获利巨大。1914年日本攻占德国殖民地青岛后,姜恒甲又在青岛担任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广置田产,“成了很体面的绅士”。1924年,向野坚一曾到青岛与姜恒甲见面,正好其父姜德纯也在,两人拥抱在一起,“互相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895年6月1日,向野给升任师团长的乃木希典写了《申请书》:“今战争已结束,幸保全一命,两国之和平既成事实,今后即商业之战。故报定以往之志向,去长江以南从事贸易为目的……又对台湾曾寄极大期望之处,一



晚年的向野坚一在回忆录中，如实记载了当年日军在东北尤其是旅顺的大屠杀。

且归国，如派往台湾，诚乃厚望之事。”

根据日本史料，作为侦查东北的间谍中唯一的幸存者，向野坚一一直难以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为此，他还特意与军队脱离了关系，而往商业方面发展。他于1906年在奉天开设了茂林洋行，两年后又和中国人合股设立了一家正隆银行，成为东北地区最为活跃的企业家之一，还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向野坚一后来执迷于教育，在北京和奉天（沈阳）建立了他的商业。他的妻子死后，妻子的三妹又嫁给他作为续弦，督导他前妻的四个儿子，经常给他写信、寄作文，向野坚一便帮他们批改作文，并交流对教育的

看法。后来，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一道，创办了一份家庭手绘刊物《骨肉》，至今已成为研究当时日本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

向野坚一在1926年（昭和元年）写了一本回忆录《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见闻》，全书共三册，内容有向野之从军日记、笔述、口叙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多篇。其子向野晋于1932年将上述内容油印成册。当时仅分赠各日本社会团体，数量不多，流传不广。其中除《回忆日清战争》曾刊于1931年元旦出版的《满洲及日本》杂志外，其余均未公开发表。《向野坚一从军日记》和《向野坚一回忆录》史料价值为最高，在记录向野的“英雄事迹”及其和姜家的“中日亲善”之外，也如实记载了日军在东北尤其是旅顺的大屠杀。

向野坚一去世于1931年9月17日，第二天就爆发了著名的“九一八”事件，连日本史料也对他去世时间上的巧合表示惊讶。

“死也要面向东方”

1894年10月31日晚，金州城西门外玉皇庙附近的杀人场又戒严了。全副武装的清军戒备森严，囚车载来了三名日本间谍。这三人都是清一色的中国打扮，脑后留着大辮子，穿着中国服装。

刽子手喝令他们面向西南方跪下，但三人坚决拒绝。他们说，天皇陛下和日本在东方，一定要朝东受刑，死后灵魂好回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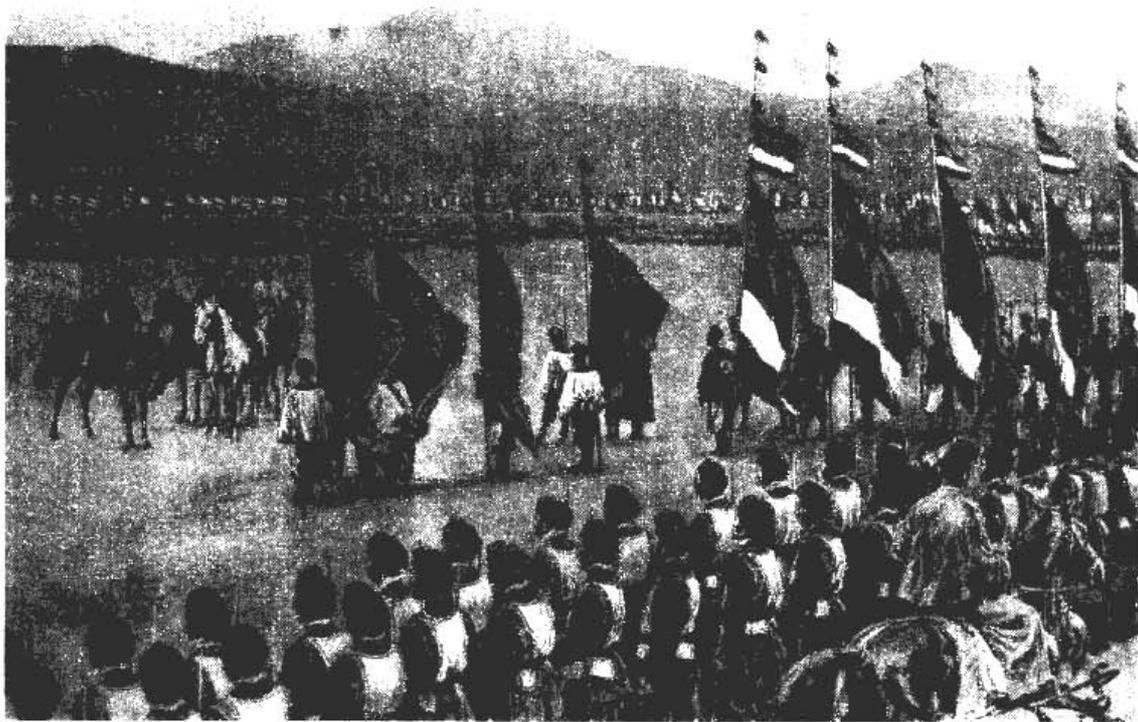
刽子手大怒，挥刀劈向他们，脸上被砍得血肉模糊，但他们坚持面向东方受刑，三人高叫着：“我们是大日本臣民，决不会贪生怕死”。

刽子手手起刀落，三颗头颅滚落在地，清军随后将他们草草掩埋。深夜里，日军的炮火已经依稀可闻，金州就快陷落了。

这三名间谍名为山崎羔三郎（1864—1894）、钟崎三郎（1869—1894）、藤崎秀（1872—1894），名字中均有一“崎”字，死时分别为30岁、25岁和22岁。

日军占领金州后，多方寻找到他们的遗骸，将其埋葬在金州城北虎头山上，并将虎头山改名为“三崎”山。“三崎”临刑的地方，则立起“三崎处死地纪念碑”。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随即被沙俄强租，“三崎处死地纪念碑”和三崎墓全部被毁。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军重占旅大，在虎头山大兴土木，为“三崎”立起了“殉节三烈士碑”，高五米宽一米，在中国大地上树立几十年，直到1945年光复后被中国民众砸倒。

“三崎”中，山崎居长，资历也最深。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他并非



驻守旅顺口的清军

如钟崎、藤崎那般是学员，而担任庶务一职，算是教职员工之一。

山崎本姓白水，原名濯，后改名为白水羔三郎，为福冈县藩士之后。白水羔三郎幼习汉典与英文，“夙怀四方之志，广交天下志士”。在 21 岁那年，出继于山崎茂一郎，遂改名山崎。他先入玄洋社，被称为“福冈玄洋社”青年三杰之一。后来，他被荒尾精的“兴亚”思想吸引，经玄洋社前辈平冈浩太郎的安排，于 1888 年到中国，先在上海学习中文，后追随荒尾精到汉口乐善堂继续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次年，他的中文有了进步，发辫也已养长，可以扮成中国人，即参与了乐善堂组织的对抗中国的全面情报刺探活动。

山崎负责云贵调查，“寻找一块割据地”，目的是“占而据之，集天下志士好汉于此，生养之，训练之，伺机举事”。他因口音甚重，只好自称为福建人或广东人，化名常致诚，字子羔，先扮走方郎中，及至所带药材售尽，又改扮卜者，继续前行。随后被当地官员怀疑被捕，刑讯拷问下始终坚不吐

实，竟然最后又被释放。这次考察，“云烟万里，涉湖南之水，越贵州之山，过云南之野，穿广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游獠獠苗蛮之巢，彷徨于瘴疠毒雾之间”（引自其发给胞兄的信），十分艰难，最后病倒在云南边境，不得不结束这历时一年的冒险，返回汉口。

甲午战争前，山崎奉命到朝鲜，协助当时驻扎在汉城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搜集清军情报。他化装成从日本撤回的华商，“最早深入牙山敌营”，弄清楚了牙山清军的兵力、虚实甚至防御计划，收获颇丰。开战后，他“又从军于平壤”，直接参与战斗。向野坚一曾称赞他“既奏大功又当大任，真九州男子之忠心光照东方，为后世之鉴”。因功回国与宗方小太郎等接受明治天皇亲自召见。

蒙天皇召见的间谍共有三人，除了山崎、宗方外，另一人就是“三崎”之一的钟崎三郎。钟崎是山崎的福冈老乡，曾在日本陆军幼年军校学习，因哥哥去世而退学，随后到长崎学习中文。1891年来华，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随后化名为李钟山到安徽芜湖潜伏，当时芜湖正在兴起反日风潮。甲午战前，他奉命到胶州湾侦察，历时35天。其时，正值日本轮船日本丸在威海卫附近触礁，钟崎遂以日本领事馆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借机侦察威海卫军港情况。随后，他到天津，陪同日本驻天津海军武官泷川具和，驾驶帆船对各个海口进行水文测量，选择日军最佳登陆地点。中日宣战后，钟崎并没有像日侨及其他日本间谍那样先行撤离回国，而是悄悄去了山海关一带进行侦察，填补了日本大本营的情报空白，被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称为“不世之功”。川上操六向天皇报告了此事，因此，



日本明治天皇的官方画像

钟崎三郎获得天皇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无论遭遇何等危险，都要在敌国潜伏，以探听敌情。若能逢凶化吉，当有鱼雁报闻。倘无音信之时，亦即再无会期之日也。”

“三崎”中最年轻的藤崎秀，是鹿儿岛人氏，毕业于熊本济济贲中学。主持济济贲中学的正是著名的军国主义者佐佐友房。藤崎毕业后，因体检不合格而无法报考海军军校，遂到长崎谋生，立志成为实业家，却被荒尾精的演说吸引，表示要追随荒尾复兴亚洲。但他家境贫寒，支付不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费，荒尾还同意帮助他提供一半的学费。1890年藤崎秀到上海，学习间谍业务长达三年。他认定荒尾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禽兽尚知报恩，何况人乎？”因此，他成为日清贸易研究所最勤奋的间谍之一。战争爆发后，他随日侨撤回广岛，在日本第一师团工作，侵华第二军组建后他又转入军司令部参谋部。

日本大本营十分重视谍报工作，将山崎、钟崎、藤崎等“三崎”，与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六人组成“特别任务班”，准备执行在旅顺、大连一带的渗透侦察任务。

1894年10月24日，“特别任务班”随日本第二军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



浮士绘：日本第二军攻占金州城。

登陆，并分别衔命出发。其中，山崎负责最重要的旅顺炮台侦察，钟崎、藤崎则负责侦察金州、和尚岛的防卫情况。

根据“特别任务班”唯一幸存的向野坚一的记录，日军军舰此前曾俘获了一艘中国渔船，那些渔民的衣服被扒下作为间谍们的道具。山崎羔三郎穿着中国渔民的马褂和棉裤，随身携带朝鲜长烟杆一支，肩扛铺盖，随日军第一波登陆士兵上岸，最早出发。随后是身着长褂、肩扛白色包袱的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侦察任务很艰巨，一旦被支那人识破势必一命休矣。我们为他们送行时无不落泪。”

午后三点，藤崎秀与向野一同出发，在洼地告别时，向野为藤崎编好发辮，“完成支那装束最后工序”，两人洒泪相别。

但此时，中国军民已经在前线严加设防，稽查日本奸细。为此，特别颁发了一种赤色的通行证，乘船摆渡必须出示，否则将被缉拿审讯，因此也有不少中国人被冤杀。“特别任务班”六人先后落网，除向野坚一逃脱并圆满完成侦察任务外，其余间谍中，“三崎”被同时处决，另两人大熊鹏、猪田正吉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三崎”中，钟崎最先在碧流河西岸渡口被一名姓张的清军巡逻兵抓获，随后是山崎在离碧流河不远的魏子窝被清军骑兵抓捕，最后是藤崎在曲家屯被当地民众识破后落网。根据向野的回忆，他本人完成侦察任务后，于11月6日随军攻占金州，即随同日本海军司令部的人到金州都统衙门检查缴获的文件，发现了三份日本间谍档案，其中一人名为钟崎，再经检视，另一名为“赵外梅”的应为藤崎，日军此时才知至少这两人已经落网。

向野遂开始四处寻找这些间谍同伴的下落，甚至命令日军收集那些被清军砍杀的人头，“掰其口，解其辮，细细检查”。在金州海防分府大牢中，向野发现了钟崎、山崎和“赵外梅”的口供，确证了三人已经被捕。据向野记载，只有山崎在口供中交代了学中文、蓄发等，“别无他事”。

12月21日，日本第二军在金州为阵亡士兵以及“三崎”等间谍们举行招魂祭，向野在日记中悲叹：“昨天还相互交谈，握手言欢，知己朋友今留白



浮士绘：日本侦察兵在奉天侦察

骨在此地，虽流芳千古，实为异域之鬼，又怎能不使人痛哭？”

12月26日，日军处决一名华人徐三，罪名是他“戕害通译官藤城龟彦”，行刑时故意选用了钟崎遗留下来的日本军刀。

“三崎”是被金州副都统连顺下令于10月31日夜斩决的，但日本有媒体说是火刑，以突出清国的野蛮，但向野认为这并不确切。向野在当地汉奸帮助下，四处寻找三人尸体，询问被杀经过。据当地人说，“三名奸细虽年轻，但毫无惧容，说：‘我们不逃，你们杀吧。’至死坦然自若。”

日军占领金州后，多方寻找“三崎”等人的下落。

6日，日军在金州西北门外的草地上发现了山崎所穿的衣服的碎片，随即在第二天进行了全面挖掘。先挖出山崎的尸体，“发现首级完全砍落埋在脚下”，接着挖出钟崎、藤崎的尸体和首级，确认身份后，随军僧侣诵经焚香，就地火化。

两天后，2月9日，日军在金州为“三崎”举行隆重葬礼，师团司令部特赐三氏以“忠死”二字。同一日，钟崎的故乡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福冈知事主持，四千多人参加，仅僧侣就有三百人，哀荣倍极，可见日本人对“英雄”的态度。他的好友中村纲次在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刊物中写下长篇《故



浮士绘：日本侦察兵在田庄台侦察设伏

军事大探侦钟崎三郎君传》(原文为“大探侦”), 传尾有诗吊曰:“富贵安逸君不顺, 欲立奇功试雄才; 托身细作事远游, 尝胆卧薪担国忧; 五尺短身总是胆, 跋涉支那四百州。”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这些日本间谍的集体写照, 其虽为中华仇寇, 但“尝胆卧薪担国忧”的气节和“跋涉支那四百州”的坚忍, 却是值得我辈深长思之!

而与向野坚一、“三崎”等一起登陆的“特别任务班”另两位成员大熊鹏、猪田正吉却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两人是中学同学, 又都毕业于日清贸易研究所。他们失踪后, 日军打听到清军中有两名日本青年很受器重, 估计是此二人潜伏在内, 但在惨烈的田庄台战斗结束后, 多方查找也无音讯。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 此二人在离开花园口后, 均被清军抓获, 但很幸运地未被确认为间谍, 而被收留在了清军军营中。猪田正吉估计是在田庄台大战中, 被日军炮火直接击中, 尸首残缺而混于乱军之中。而大熊鹏则在左宝贵军营中, 一直待到战后, 可能在遣送之前死于当地的瘟疫。日本黑龙会所编的史料, 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日军对此二人的寻找, 最终二人都被追认为“烈士”, 名列“征清殉难九烈士”。

教授也当 007

1894年8月29日晚上，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正从烟台开往上海，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桅杆上猎猎飘扬，在这个早已危机四伏的海面上，给人一种貌似安全的感觉。

宗方小太郎躺在船舱里，却丝毫也没有安全感，心里七上八下的。在这艘船上，他居然发现了6个他认识的华人，其中有一个叫蔡廷标的，还是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而宗方知道，中国官方已经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重点就在烟台和上海一带。

宗方知道，这一夜将是他一生中最漫长而艰难的一夜。

教授学者型间谍

宗方小太郎在日本间谍圈内，是一位教授学者型的重量级人物。他在中国不仅深入第一线到处刺探情报，更是提出了大量的战略分析报告，成为日本决策层的重要参考，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日本外务省的文件是如此评价的：“此人抱夙志于支那，壮年之交赴当地以来；专心努力于该国习俗国情之研究，其间，或谍报事务，或国情介绍，等等，苦心努力于帝国势力之扩张。外务省自xxxx年（原文如此）起囑其谍报事务，其报告于当局公务裨益颇多，功绩卓著。”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以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黄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90年佐佐友房当选日本首届国会众议员。1900年义和团动乱时，他曾出面策动李鸿章组建南方联邦，被李鸿章严辞拒绝。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薙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以北京崇文门外“积善堂”药店为掩护。北京支部是乐善堂谍报网的关键，荒尾精给宗方的信中就指出：“彼地（北京）为他日我党（乐善堂）演戏之首要地方”，设立北京支部的目的就是“无论遭遇任何时势之变迁，得以及早透露其机于未显之先，使我党不失其机先也”。



宗方小太郎日记原样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而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所负责的北京支部，主要任务就是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在北京期间，为了筹集谍报活动经费，他还偶尔亲自上街推销乐善堂的药物和书籍。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有一次在崇文门外摆地摊卖书，“这在日本乃最下等之商人所为”，但是，“大丈夫或时为乞丐、为奴仆、为小吏、为商贩，或为立于庙堂雄视宇内的英雄，或为仁人君子，皆随时势而浮沉，虽出没似无常，而一片至诚之念则贯穿万古也。”

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在他第一次侦察时，本想带一个中国人随行，“皆以此行危险，无人应者，余即决定单身前往。于是脱去整洁服装，

改着粗布衣服，萧然一野人也”。7月8日，他从烟台抱病出发，连日阴雨，全身尽湿。10日，抵达威海卫，当夜就发现湾内停有军舰10艘、水雷艇3艘、汽艇1艘，并夜登城楼，“眺望湾内形势及灯台点火”。次日，他再度登上东门侦察军港，发现在刘公岛前还有军舰13艘，随后冒雨返回烟台。

不出一周，日本所派的另一谍报人员从威海回来，报告说北洋舰队的主力即将立即奔赴朝鲜，宗方便决定“再游威海，侦察北洋舰队之动静”。这一次，天气晴朗，宗方的日记中甚至还有在途中“夜登山纳凉，月上夜静，四山寂寥，旅魂飞至天涯”的闲适记载，并写下了“此行非为烟霞故，拟为军国输寸诚”的诗句。

这一次，他再度详细清点了威海卫军港内的军舰数量，并侦察了西炮台，勘察了百尺崖等，为今后日本海军攻击威海卫搜集了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7月25日，他在返回烟台途中夜宿老元山的小客栈，“受臭虫、蚂蚁、白蛉、蚊子来袭，终宵不能安眠”，这时他并不知道，就在并不遥远的朝鲜丰岛海面，日本军舰已经发起了第一轮进攻，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死里逃生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8月1日晚，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冲到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上，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

4日，日本关闭了驻天津领事馆，由美国领事馆代为保护。所有日本外交人员和侨民全部撤离，只留下宗方一人，带着567元谍报经费，潜伏了下



浮士绘：黄海大海战，人类历史上首次铁甲舰队决战。

来。此时，中国的反间谍行动大为加强，宗方也感觉到了危险，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当时做了三种准备：一是将机密文件整理处置好，以防万一；二是为自己准备了新衣，一旦被中国抓获的话，将“盛装赴官府，有所从容辩解也”；三是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万一不能以事理争，六尺形骸将一笑赴虎狼，泰然安命，示彼等神州（指日本）男儿之面目”。

这段时间，他化名为宗玉山、宗鹏举、郑如霖等，继续亲自或派出其收买的华人，不断外出侦察，“屡次出入于生死之间”，得到了大量的动态情报。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宗方的所有情报均写信到上海中转，但是，中国方面在上海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乘上了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这次潜逃，或许是他生平最惊险的一次。在走出领事馆时，他的行踪就被发现，“虽知事已败露，进退两难，但毋宁进而失败，遂决心断然登上连升号”。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6名相熟之华人。

宗方见状危急，6人中有5人离得较远，只有蔡廷标与自己挨得最近，避无可避，便“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乍见到宗方，“吃惊无言”，宗方悠悠地说：“两国已经开战了。”

蔡则冷然回答说：“真的吗？我还没听说过呢。”这样的回答，其实已经在表态将不会告发宗方。

宗方说：“我幸好只是一名儒生，在国内（日本）并无官职，依旧可以放浪于山水之间。现在暂时先回上海，以避纷扰。”

蔡其实已经知道了通缉之事，他说道：“你很危险呀！你的生死就在这条船上了，你难道还不知道官府悬赏数百金通缉你吗？”

宗方从容道：“你可以不告发我吗？”后来宗方在日记中坦言，“此言系为考察蔡之心意以卜其向背而发”。

蔡说：“我当然不会，否则你我恐怕不再有相见之日了”。

在蔡的掩护下，沿途的多次盘查，宗方都侥幸过关。船进上海吴淞口时，中国方面再度上船盘查，并且明确说是捉拿 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而宗方就混在看热闹的旅客之中，有惊无险。宗方事后感慨“实似有天佑者，



浮士绘：甲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从广岛回到东京。

天不我弃，我岂能自弃乎？”他说自己“一颗首级前后经过八次厄难，安然无恙。区区廉价之二三百金，上天岂许以哲人之头交付凶手之刃下乎？”

到上海后，宗方于9月7日乘英国轮船安塞斯号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被直接接到了广岛大本营，并在那里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他在大本营中，修改完成了他的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述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至今读来，仍令我国人击节慨叹。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和台湾，为日军起草了大量中文文告，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为日军政战的有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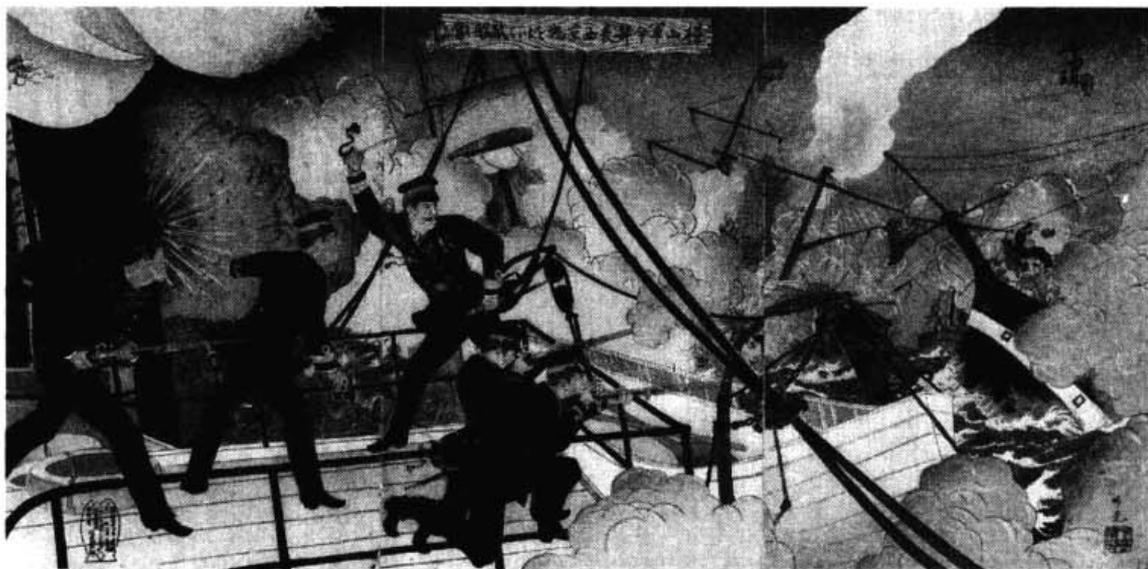
“文力征伐”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早在1890年，这位教授学者型间谍就呼吁“以发行报纸作为对中国的指导机关”。他写给佐佐友房的信中表示：清国“报纸之报道、评论颇具动摇朝野人心之势力，虑及日本今后对清国之政略，于上海、汉口等要地设二、三机关报纸，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希望设立，以为国家之事业，为后来之所计。总之，如不安插各种势力于各地，则举步而维艰。”

甲午战前，他就在日本到处活动，争取政界的支持和经济界的赞助，随后，还在乐善堂旧址设立了一家“东肥洋行”，专门寻找进入报界的机会。

1895年8月，他辞去了在台湾的官职，为准备对俄作战回到上海，加快了办报计划。他看中的目标就是英国字林洋行于1893年在汉口创办的《字林汉报》。该报与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在上海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是姊妹报，但《字林汉报》经营不利，亏损严重，英国人正有抛售的计划。

宗方小太郎便与《字林沪报》的经理、《字林汉报》的前任主笔姚文藻进行接触。姚文藻曾多年游历日本，回国后担任过《申报》主笔，与岸田吟香交好，是岸田在上海所办“玉兰吟社”的成员。双方的洽谈十分顺利，日



浮士绘：桦山资纪在黄海海战中。

本官方在幕后一直秘密支持，3000 日元经费全部以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中将高岛柄之助、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名义“捐助”，终于在 1896 年年初成功收购，表面上仍以宗方小太郎私人名义经营，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自此，日本在中国有了自己完全控制的“喉舌”。

日本驻汉口领事濂川浅之进曾在工作报告中透彻指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上下之感情颇恶，厌日人极甚，加之发刊于清国各地报纸竞相痛骂日本，甚至倡导联俄制倭之论，朝野官宪之意向，亦倾注于此，故于汉报纸上辨支那各报之妄言，冷却俄国崇拜之热，以期明唇亡齿寒之谊，融合朝野官民之感情。”

《汉报》的目的有三点：一是“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是“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核心还是“兴亚主义者”们所推崇的先改造中国、然后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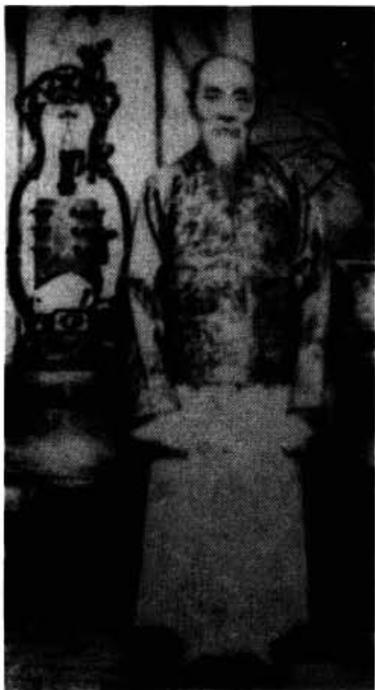
宗方经营《汉报》该报 4 年，按其自己的说法，“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梁启超也盛赞“在圣主幽囚，新政墮堕，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时候，“《汉报》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汉口”，

成为“日报之卓卓者”。

但在大清政府看来，这家报纸“误信康党之谣言，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张之洞信），终于1900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禁，中国官方出资3000两白银收归国有。

除了办报之外，宗方还积极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宗方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终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左图：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为宗方小太郎撰写墓志铭。右图：位于熊本市小峰的宗方小太郎墓。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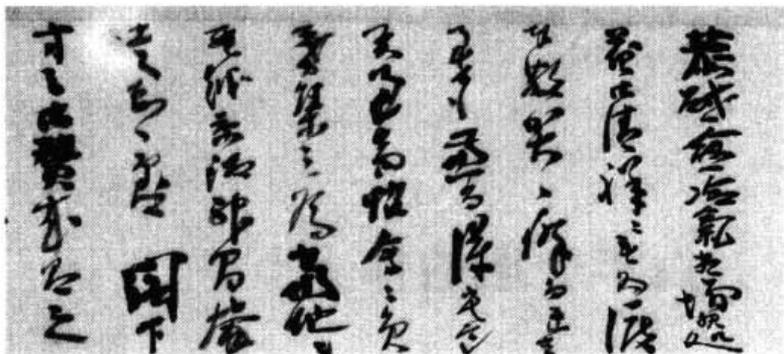
如果说虚构人物 007 是冷战时期西方间谍的象征，那么，历史人物荒尾精就是日本近代对华谍报的 007——不，确切地说，他就是那个指挥 007 间谍网的 M。

这个不折不扣的间谍头子，却是个典型的“亚洲主义者”，与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政界主流完全不同。他在 1892 年的时候就表示说：“支那（中国）是亚细亚大竞争的目标点，亚细亚大竞争的目标点亦即世界大竞争的中心……支那和我国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的关系”（《日清两国の关系》）。而在其 1895 年完成的《对清辨妄》中，他认为“中国人民足以与谋东洋大事”，“东洋的大事惟有日中两国齐心协力经营之一途。若舍此一途，茫茫大陆将被欧美列强宰割分食，能幸免者几希矣。”

在日本，荒尾精（1859—1896）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功勋卓著的间谍而被记入史册，除了在最危险的敌后身体力行、出生入死外，他更多地还是被看做一个思想家，一个“兴亚主义”的先驱。有关他的首部传记，1910 年在日本出版时，题目就是《巨人荒尾精》。他的同胞称他为“东方问题兴亚大策之中枢人物”、“东方志士中之泰山北斗”。根据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列传》记载，著名的军国主义者头山满甚至夸他为“每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西乡隆盛之后之一大人杰”。

荒尾精生于名古屋藩士之家，有一种说法说他出生在中国大连，但无人考证，暂且存疑。荒尾精幼年之时，正是明治维新初期，废藩置县，全家迁于东京，家道衰败，甚至无钱供他入学。16 岁那年，东京的一名警察菅井诚

美收留了他，为他提供学费等，他才得以接受汉学、英语、数学等教育。菅井诚美是鹿儿岛人，而鹿儿岛正是萨摩藩的重镇，鹿儿岛的军人西乡隆盛等，当时竭力鼓吹



荒尾精发给大隈重信的以中文书写的信函手迹

征韩论，并且对明治政府的一些新政进行了抵制，最终导致一场惨烈内战，史称“西南战争”。西南战争以反政府的萨摩藩彻底失败、西乡隆盛自杀而告终，但他们的征韩主张也因此深入人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就是由萨摩藩构成的，西南战争失败后，军内展开了清洗，海军的地位一直被压制着，这成为甲午战争初期日本海军比陆军更急切地想建立功业，甚至为此不择手段的主要动因。荒尾精在菅井诚美家，受到了鹿儿岛军扩张海军、建立海权、征服朝鲜的海外雄飞论的强烈熏陶。

1877年，西南战争失败，鹿儿岛军人受到排挤打击，年近20的荒尾精便决心弃学从军。他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日本日后要对付中国，就必须切实了解中国，而这一切都与军事有密切关联，因此，首先必须培养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想法下，荒尾精离开了本已入读的东京外国语学校，转入陆军教导团，就读于炮兵科。这在当时，可算是对文化要求相当高的技术兵种。

一年后（1878年），荒尾精从教导团毕业，被分配到大阪镇台担任军曹，随即又被选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当时日本培养军官，多从教导团的下士之中，选拔优秀者，送入士官学校。荒尾精从军，本是有备而来，吃苦耐劳，而且此前的学问底子十分扎实，因此如愿入选。在军校的两年时间，荒尾精与20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成一个小团体，经常在一起探讨“兴亚”大计，习武强身，闻名全校。他刻苦攻读，将应修的课程以及军事知识，掌握得十



荒尾精早年军装照

分透彻，顺利毕业并获得陆军少尉军衔。这时，他再度显露不同常人的思路。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都做着日后当上将军元帅之类的从军梦，但荒尾精志不在此，在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后，他就希望能到中国去一展他的“兴亚”抱负，于是，奔走托告，希望能辞去军职，渡海赴华。

当时的陆军大臣大山岩接见了，听他陈述兴亚志愿，大山岩问他：“目今青年有为之士，大都争往欧美留学，足下何以独欲赴固陋之极的中国呢？”

他说：“惟其因为大家都醉心欧美而置中国于不顾，所以我想中国去。”他解释自己到中国去，是要“略取中国，然后施仁政，以图复兴亚细亚”。

日本陆军因为荒尾精刚毕业，便不许他辞职，将他派往熊本去担任第十三联队的队副。根据日本史料，他在任内十分称职，得到士兵们的拥戴，在部队中很有点名望。但怀抱鸿鹄之志的荒尾精十分郁闷，感慨“东亚大局日非，何日宿志得伸”，“中国距日本仅一衣带水，然身似笼中之鸟，无法展翅高飞，徒然对四百余州（指中国）魂牵梦萦，呜呼！”“组织”上尽管感觉他不安心“本职工作”，但对他还是十分器重的。

荒尾精并未放弃努力。在熊本服役期间，他遇上了也在军中担任中文教官的御幡雅文。御幡雅文是日本外务省首批来华留学生，随后又曾在欧洲留学，见闻广博，对华语（今普通话）、上海及台湾方言颇有研究。他的门生中还有位钟崎三郎，也是甲午战争中著名的间谍。荒尾精便拜他为师，一有空闲就学习中文。因此，在熊本的两年，他“夙夜勤勉”，“未有一夜废其既定规矩”，不仅在军事知识上继续获益，而且中文进步很大，不仅能够进行日常对话，而且能写简短的句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日本陆军当局下令将他调往参谋本部中国课，

可以接触各种有关中国的机密文件和地图等。由此可见日本军政当局对量才用人的重视和高超手腕。当时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1844—1899），对这位下级军官十分器重，如荒尾精求见，即使川上正与高级将领会谈，也必离席接见；而如果反过来，川上正与荒尾精在谈话，其他高级将领要求见，往往需要等荒尾精谈完了才可接见。荒尾精与川上相差15岁，地位更是悬殊，但这种公道、私情却保持了一生。日后，当荒尾精在上海创建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时，川上不仅鼎力相助，为他争取国家拨款，而且和夫人一起将私宅抵押，将所得款项尽数捐给荒尾精。这样的忘年交和克己奉公，如同日本另一名将乃木希典将两个儿子都送上前线、悉数战死一样，即令其人为我中华大敌，其行为、其品性亦值得我辈深深景仰，当知日本当年的胜利并非侥幸获得。

在参谋本部工作期间，荒尾精不仅大量接触机密文件，对中国的认识日益深刻，而且得以结交各方人士，建立了日后为其大展身手“保驾护航”的人脉网络。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执掌熊本济济馆中学的著名思想家佐佐友房和周游世界的今野岩夫。今野岩夫曾身背干粮，冒着严寒，穿越北海道，孤身探险西伯利亚，历尽艰难，而后又从西伯利亚转入蒙古出印度而达波斯。在波斯身染疫病，几乎濒死，得波斯王资助后回国。随后又到中国西南边境，在中法战争期间，他甚至还加入了刘永福的黑旗军，多次参与血战，死里逃生。今野岩夫的故事令荒尾精入华的豪气大增。在参谋本部工作期间，荒尾精撰写了《宇内统一论》和《兴亚策》，系统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他的《兴亚策》，成为日中两国“兴亚主义”者的经典，他提出，日本如果与中国联合，依托中国的财力，可以建立120万以上的强大陆军和百艘军舰以上的强大海军，则“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挥于宇内，宣示亚洲之雄风于四海”。这样的论调，在宗方小太郎乃至梁启超等人那里，也时有共鸣。

在参谋本部的磨砺终于得到回报，1886年，在川上操六亲自安排下，已晋升为陆军中尉的荒尾精终于梦想成真，奉命潜入中国进行谍报工作。在上

海，他得到了另一个忘年交、颇富传奇色彩的岸田吟香（1833—1905）的大力支持。

岸田吟香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日本商人，他的乐善堂既是出版畅销书的书局，如铜版活字印刷的四书五经袖珍本，和汉英词典等，也是以经营独家配方的眼药水为主的药房。戴眼镜、穿马褂的岸田吟香温文尔雅，举止谦和，还经常为当地穷人搞些免费发放眼药水的慈善活动，口碑很好，连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其幕僚都曾找他治病，在中国官场内左右逢源。此人在日本乃是风云人物，陆军特务机关玄洋社的核心间谍之一，他自幼学习汉学、汉医，能诗善文，号称“神童”。但因文章惹祸，不得不离开江户，潦倒江湖，靠着帮一位美国传教士编辑《和英对译词典》而熟悉了西方事物，并创办了报纸。1872年，岸田担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被时人称为当时日本的四大笔杆子之一，并因随军采访而与军方关系日近。但他在事业顶峰时，突然下海，经销那位美国传教士赠送给他秘方的眼药水，一举而成巨富，随即迁居上海，择机待动，一边为日本政府提供对华贸易情报和建议，一边不计报酬地为日本军方搜集情报，并效仿春秋时代孟尝君故事，为日本浪人们提供栖身之地。



岸田吟香

荒尾精与岸田吟香会晤后，惺惺相惜。岸田吟香为荒尾精谋计道：“足下如欲调查中国大陆，最好化装成商人，较为便利。本人可助一臂之力，当在汉口设立一乐善堂支店，委君经营，足下可分头派人赴中国各地贩卖本堂药物等品，既可掩人耳目，又可将售得之款，供调查费用。”

不多久，荒尾精主持的乐善堂汉口支店便在岸田吟香资助下开张，从在华的浪人中召集了志同道合者，准备“改造中国”，汉口乐善堂从此成为盘踞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心机构。在岸田和荒尾精的精心组织下，乐善堂汉口支店建立了遍布中国全国的谍报网，为日本输送了大量情报。

随后，两人又克服种种艰难，在上海成立了另一间谍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新闻谍。这两个机构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立下了巨大的功勋。日清贸易研究所除提供大量军政情报外，也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清国商业总览》，“世间始明中国实情”，煌煌 2300 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

在坚定的“亚洲主义”思想指导下，荒尾精所主持的两个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宗旨并非简单地为了“征服”中国，而是要在征服中国后，再结合日中两国的力量，实现黄种人的崛起，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袭。这可以说是“大东亚共荣”思想的早期表现。正是因为有荒尾精等人的努力，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不仅没有掀起仇日情绪，反而将中日亲善关系从官方到民间都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并因此而刺激了“黄祸论”成为西方的政治主流。

1896 年，荒尾精前往刚被日本征服的殖民地台湾，染鼠疫而亡。至今，他的著作《宇内统一论》和《兴亚策》等仍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他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也从没停止，而日本民间至今仍然供奉着这位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得到同胞认可的“巨人”。

在熊本服役期间，荒尾精曾写有一首七律以自勉：“告君千古英雄士，遇得盘根错节来。冯翊功成登麟阁，班超名遂入云台。艰难经历皆如此，辛苦遭逢岂吝哉？请见前园梅一朵，坚冰凌得复能开。”



日本在京都树立了“荒尾精先生显彰碑”。图为 2004 年祭拜仪式。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甲午战争期间活跃在中国的日本间谍网，主要是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体系。这一耗资巨大的谍报系统，却几乎没有拿过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钱，不仅没有享受“机关”待遇，甚至连“事业单位”都算不上，纯粹是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而且只“烧钱”，不产出。

与此相仿，甲午战争时期的大多数日本间谍，只是在战争爆发后才被纳入军队系统，而此前，都不属于国家“公派”，同样没有“公务员”待遇，只提供赞助的企业领取微薄的生活津贴，是“间谍志愿者”。

在背后支撑这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是一家日本的民营企业，它通过卓有成效的在华商业经营，以商养谍，商谍结合，既节省了日本的军费开支，也拓宽了谍报渠道，提高了谍报效率。这家“精忠报国”的企业，名唤“乐善堂”，这位“无私爱国”的企业家，名叫岸田吟香。



乐善堂的广告

妓院里的“名记”

岸田吟香（1833—1905）是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声望甚至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并称。如果说福泽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岸田则是一个最成功的移植者和消化者。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官方的红人，年轻时曾因著文而惹恼了军方，不得不躲到江户的妓院做龟奴维生。

岸田为冈山县人，本名国华，自号“银次”，后以更为书卷气的谐音词“吟香”自号。岸田自幼便有神童之称，学习汉学，造诣不浅，这为他日后赖以发家的汉籍出版及中国事业打下坚实基础。22岁时他前往大阪，于汉学之外开始学习“兰学”（即西学，因首自荷兰传入，日本人通称兰学），与木户孝勇、西乡隆盛等一干后来的维新志士结交。

年轻人接触了如此多的新思想，自然就看不惯保守、颀顽的幕府官僚们，加上本就汉学深厚，落笔成文，于是开始抨击时政、指点江山。如此，自然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离经叛道的岸田遭到通缉，只有落荒而逃，隐姓埋名，最艰难的时候，只好到妓院里做仆人，伺候嫖客们。

但笔杆子还是有用途的，几经周折，经过好友介绍，岸田认识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 1851—1911）。赫本博士在日本先后生活33年，培养了不少一流人才，在该国朝野影响甚大。他有个孙女叫凯瑟琳，日后比爷爷的名气还大，曾四度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影星。赫本博士当时在横滨，边行医、边传教，还边编辑日本第一本英文词典《和英辞林集成》。为了编辑词典，他需要一位精通日



美国影星凯瑟琳·赫本，其祖父发明的眼药水成为支撑日本对华谍报的经济支柱。

文的专家，岸田是当然的人选。于是，岸田就住到赫本博士在横滨的住所内，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而且开始更系统地学习英文，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报业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一年他已经31岁。

1866年9月，赫本博士偕岸田同来上海，着手词典的印刷事务，直到次年5月印刷完毕。在繁华的东方第一都市上海生活了九个月，大大拓展了岸田的视野。

回到日本后，岸田重操笔耕旧业，办起自己的报纸《海外新闻》，每周出版，充分发挥其擅长英文的本领，摘编世界各地新闻，仿佛是日本的《参考消息》。之后，又出版《横滨新报》。期间也多次尝试下海经商，但都不是十分成功。1872年，岸田担任了《东京日日新闻》(Tokyo Nichinichi Shinbun)的主笔，这给了他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岸田笔力雄厚，纵谈时事，一时声誉鹊起，被称为四大“名记”之一。1874年，西乡从道率军侵略台湾，颇有文名的岸田获得了军方的谅解，得以成为日本第一位随军记者。他的战地报道深受欢迎，令《东京日日新闻》发行量大增。

就在岸田新闻事业渐趋顶峰时，他却突然弃笔下海，开始经商。原来，为酬谢他在词典编撰中的努力，赫本博士将自己研制的一种水溶性眼药配方送给了岸田，岸田将其命名为“精铸水”(Seikisui)，大为畅销。

1877年，“名记”岸田正式办起了公司，名唤乐善堂，地点就在东京的银座。除了眼药水这一独门看家产品外，他还经营别的药品，以及书生最爱的生意：卖书，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上海滩闻人

日本的生意稳定后，岸田便来到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开拓业务。在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上海分堂。精通中文的岸田撰写了《卫生宝函》，为他经营的药品大做宣传，其中国业务迅速开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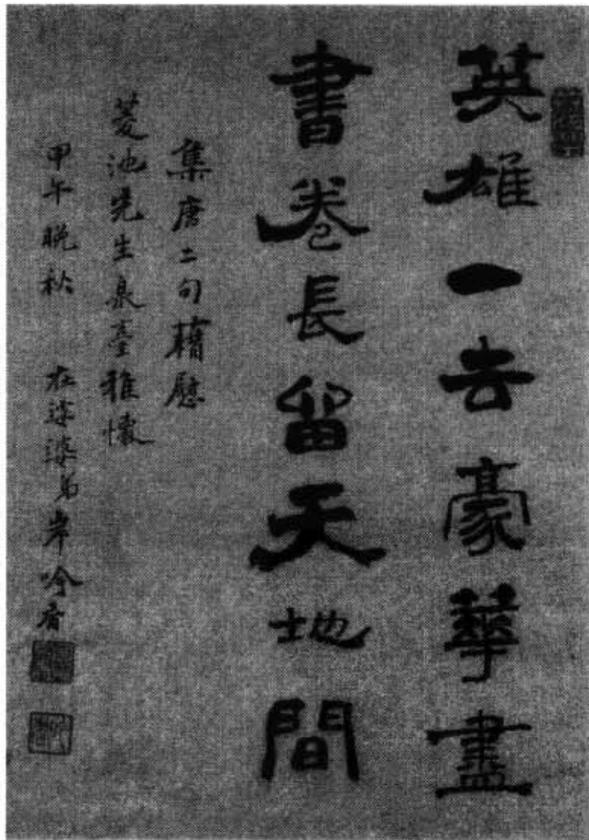
岸田心思灵敏，富于创造性，他发明了岸田式铜版活字，翻印中文典籍。当时中国的主流出版物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但这些著作多为木刻印刷，卷帙浩繁，不便携带，及至岸田用铜版活字，印刷小字袖珍本之后，因携带便利，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购买狂潮，给上海乐善堂带来滚滚财源。

岸田在中国的生意经，并不只局限在赚钱，而是名利双收。他的出版业务，不只在技术上创新，更是在普及文化方面下了大功夫，其出版的书籍，面向中下层阶级，用意很深。

根据中日两国所收藏《乐善堂精刻铜版缩印书目》及《乐善堂发兑铜板石印书籍地图画谱》统计，《四书五经》解说书、科举考试参考书、试题集及辞书、韵书、类书、尺牍和一般的学习参考书，共占其出版总数将近一半。

而且，乐善堂的出版物中，还有大量的外国历史地理书籍和地图，其中包括当时风靡一时的丁韪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富国策》，及合信 (Hobson, Benjamin) 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为了让更多的平民能买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乐善堂还将《海国图志》拆开，分成《筹海篇》、《英吉利国志》、《俄罗斯国志》、《欧北五国志》等小小的单行本，每本仅售几角钱，而全本《海国图志》定价 12 元。

岸田还积极介入中国的文化界，与相当多的文人过从甚密，是《申报》乐于报道的上海滩“明星”。



岸田吟香的书法手迹

《申报》(1888年3月23日)曾说：“东瀛岸田吟香先生风雅士也。兹以高楼对面玉兰大放瑶芷，娟娟相对，不禁诗兴勃发……招致海内名流，开筵小饮，拟设诗社，日凡两举，沪江为文人才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就这样，他成立了一个“玉兰吟社”，吸纳了不少沪上文化名流，《申报》公开报道过的就有著名的思想家王韬(天南邈叟)，以及前后担任过《申报》主笔的何桂笙(高昌寒食主)、黄式权(梦畹生秋山)、蔡尔康(缕馨仙史)、钱昕伯(雾里看花客)等。

乐善堂还经常向平民免费发放药品等，为岸田赢得了大善人的称号。

在中国牢牢扎根后，岸田便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上海滩闻人，一直深埋其心中的政治抱负便开始寻机崭露。

爱赔钱的老板

岸田的“报国”方式十分独特：一方面，他为日本国内撰写大量文章，介绍中国市场，鼓励日本政府和企业，到中国列强进行“商战”、厚植国力；另一方面，他亲自游历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报告，成为日本政界和军方的重要情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他效仿中国古人孟尝君的做法，收留了大量到中国前来寻找机会的日本浪人或学生，管吃管住还管出路。

当荒尾精奉命到中国建立谍报网时，首先拜见了岸田，并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岸田建议荒尾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到交通最为便利的汉口设立乐善堂分堂，经营药品和书籍，所得货款可以全部用于谍报工作。乐善堂的间谍如果有大行动，一般都是带着其经销的药品和书籍出发，边走边卖，一是作为很好的掩护，二是从贩卖中获取利润，减少谍报开支。他们的行动计划，往往包括在目的地考察经商办企业的可能，以便能扎根当地，这与古代的“屯垦”思路十分相似。

以商养谍，走谍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几乎是那时日谍的共识。乐善堂

的间谍们搜集各地情报，并不局限于军事政治方面，也大量涉及经济情报，其所编辑的资料最后多达数千万字，对日本在华的“商战”也帮助很大。那些年轻的间谍，也有很强的商战意识，如藤岛武彦，就曾经回到日本，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在大阪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中国的间谍活动；而石川伍一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时，就提出应到西藏经营牧场，为谍报工作筹集经费。

以商养谍的思路，后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乐善堂在甲午战争前干脆在上海成立了间谍学校，命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的两栖谍报人员，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立下了巨大功勋。荒尾精与岸田吟香对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学员们，就期望他们“为实业家之模范，为扫除积弊之创业家，为兴复亚洲之志士，为开创日本富强之俊杰”，将商战与谍战完全结合在一起。战后，乐善堂及其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不少间谍都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爱国企业家”岸田吟香则获得了“勋六等”和“瑞宝奖章”。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孳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其次为河南；再次为福建、广东。现湖南恰如立于治外之城，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实行，政府亦不能相强，俨然形成一国。

这一“高见”，是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写在《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一文中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的。宗方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必为湖南人”。

宗方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他更进一步比较道：“彼英国自数年前即促进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岂无故乎？”

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湖南对于西方势力影响的成功抵制，令日本人对这个相当神秘的省份充满了好奇。

汉口乐善堂于1886年成立之初，就将目光投向了湖南，在长沙设立了第一个“支部”。

那时，汉口乐善堂刚刚在英租界河街的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临街楼房内挂牌营业，应荒尾精的邀请，各地浪人纷纷前来。按照日本黑龙会所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此地成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梁山泊”。他们蓄辮发，着华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商人的名义为掩护，到处活动。而真正的

店员，只有7~8名日本人和5~6名中国人。

日本人做事是严谨的，尽管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身份及赞助，他们还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时时处处以“我党”这样充满政治含义的字眼自诩，而并非“我公司”或“我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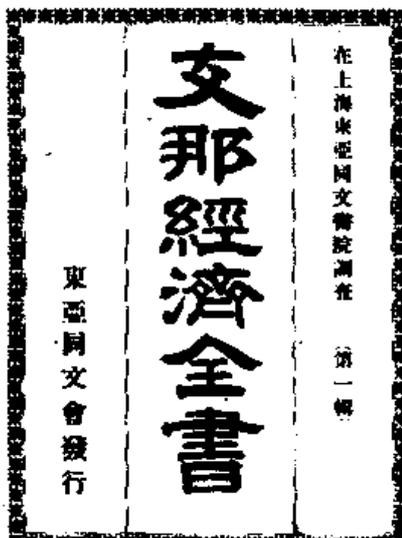
在他们集体拟定的一份名为《一般心得》的“党章党规”中，提出第一阶段任务就是“改造中国”。荒尾精在一封发给下属的指示中，将乐善堂“强烈之事业”上升到“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的高度，自我期许非常高，并特别要求“同志们”“自觉其责任之重大，百折不挠，小心胆大，巧装俗态，以避内外人之疑”。

在他们的“党章党规”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岂轻进缓漫所能致耶？一举一动，有关兴废之处不少，故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

“党章党规”要求“同志们”在平时与外人交往时，态度务须稳重，“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乐善堂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机构。荒尾精自任堂长，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内员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根据谍报整理的《支那经济全书》，长期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工具书。

谁是日本人的“统战”对象？

究竟什么样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是优秀的？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设在中国的最重要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进行了相当细致的阐述。

根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统战”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

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

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

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

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

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

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

“豪杰”分为八种：

一、企图颠覆政府者；

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

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

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

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

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

七、商业巨子；

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专门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凡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19岁的藤岛武彦在汉江之上被水匪抢劫时，还能想法儿收服水匪，并不惜耽误新疆考察大计，而前往营救被官府捕获的水匪头目，就是为了“团结”

豪杰们。

荒尾精曾经明确地要求：“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教等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

“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

“侠客”是那般奋不顾身、喜打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从这一中国人才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殚精竭虑，其间谍们“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工作十分扎实。他们因此而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以及“马贼”们，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相当有效地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号召，并在中国的共和革命中赢得革命党普遍的倚重和尊敬，都与其当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间谍大抓“支部建设”

乐善堂将外员们分立为不同的“支部”，这个词汇后来成为中国最为频繁使用的词。除最早的湖南支部外，还建立了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除上海主要负责为其他支部供应商品外，各地支部表面上均是一个杂货铺子，为谍报工作做掩护，间谍们就以送货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北京支部被荒尾精称为“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干的宗方小

太郎坐镇，重点是观察清廷中央的政治动向，宗方同时负责天津支部，开展针对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京、津两支部还负责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及蒙古的情报收集。

四川支部的建立，则是为了对抗俄国。

1888年春，俄国将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来，令日本人十分焦虑：这条铁路一旦建成，俄国将得以迅速地向中国的西北和东北用兵，本就已成“空心大树”的中国将很容易被北极熊拱翻，日本的一切计划就将落空。而在日本的扩张大计中，俄国始终是战略上的第一假想敌，而中国无非是阶段性的敌人，是为了对抗俄国而必须提前处置的手段而已。

根据堂规，这时正是乐善堂召开“外员”年会的时节。老牌谍报机构玄洋社伸出援手，其首领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商定，派出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一批青年间谍，支援汉口乐善堂。

乐善堂这一次年会，有20多人参与。会上形成的几项决议，对中日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会议明确提出，“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在甲午战争中，号召汉人起来发动“驱除鞑虏”的革命，成为日军重要的政战口号；

——“为防止俄国东侵，派遣同志去新疆和西藏，促使伊犁总督刘锦棠决起抗俄”。为此，他们确定了由“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浦敬一前往新疆，由年仅19岁的藤岛武彦配合。但第一次新疆行，因藤岛在汉江上与水匪的一段恩怨交往而耽误时间，未能成功；第二次两人虽然成功走到了兰州，但因盘缠几乎用尽，只好将藤岛先遣回汉口，浦敬一则从此失踪；

——会议决定除湖南支部外，在四川重庆府设立四川支部，负责云贵川以及藏区的情报收集。之所以选中重庆，完全是考虑其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枢纽地位，以及彪悍的民风，是日本人将来理想的“举事之地”。四川支部的石

川伍一等人，深入云贵滇藏，考察十分详尽，甚至绘制了精密的地图，成为日本军方的重要资料。这些间谍人员甚至提出，效仿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分割中国；

——在加强对北京宫廷的情报侦察，监视清廷中央动向之外，实地调查关外形势，派遣宗方小太郎到东北侦察，重点是金州、旅顺等北洋舰队的基地；

——在上海设立间谍学校，为“东亚经纶”准备商战与谍战的两栖人才，这就是日后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及东亚书院等机构的肇始。

上山下乡

一个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乐善堂各支部迅速开展。乐善堂的“外员”们纷纷进入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举凡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

这些年轻的日本间谍们，不畏艰苦，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关。各地间谍几乎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情，这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各种各样的情报都汇总到了汉口，1889年4月，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在这份谍报总结中，荒尾精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全面腐败，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中国对抗西方。他提出了应以商战养谍战，以商战扩充军备，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这是“对清国第一要着，今日万急之务也”。这一建议，在

日本朝野得到巨大的共鸣。

在这份提纲式的报告基础上，后来主持乐善堂的根本津一，将所有情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整理和编纂，形成了一套《清国通商总览》的煌煌巨著。全书分二编三册，2000多页，内容全面，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俨然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各界热捧，成为日本侵华的指南。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关于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情报汇总到了汉口。图为19世纪后期汉江边的码头。

《清国通商总览》也震撼了日本商界，大阪一位名叫冈崎荣次郎的富商，在感动之余欣然解囊，同意为刚在上海成立的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赞助设立一个实习基地，对内叫“日清商品陈列所”，对外则叫瀛华广懋馆，令年轻的间谍学子们有一个实践商战的平台。这个实习基地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费困难。

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乐善堂的年轻间谍们在中国行万里路，“写”万卷书，扎实地进行着调查研究，并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认识着这个国家的一切。这些，似乎也注定了随后到来的甲午战争及其之后中日两国的命运……

帝国的青春躁动

间谍学校闹学潮

1890年年底至1891年2月，上海一场罕见的学潮震动了日本。作为日本设在中国的第一家间谍培训机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因经费出现危机及对课程设置不满，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被骗来上海，冲突迅速演变成械斗，成为世界谍报史上罕见的间谍学潮。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是在1890年9月20日，此前一周，150名学生和50名教职员工才从横滨航海而来。结果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如此激烈的内讧。

正在日本苦苦筹措经费的荒尾精赶紧赶回上海，软硬兼施，将30多名“闹事者”劝退，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学校，却继续待在上海，还在报刊上公开抨击学校。这所日本间谍学校的“家务纠纷”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弄得荒尾精和日本当局十分尴尬。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一个字：钱。

在经营汉口乐善堂的过程中，荒尾精就强烈地认识到必须在中国建立一所专门培养商战和谍战人才的学校。1889年他回国述职，不仅在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复命书》中大声呼吁，而且到处拜见日本高官，寻求支持。

荒尾精曾为日本算了一本账：为了扩充军备，估计要花费10年时间和3000万元经费，日本当前的财政能力无法支撑这么沉重的开支，所以，唯一

的出路就是开源，积极向外进行商战，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争取打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让日本国旗飘扬在亚洲每个通商口岸，才能赚出这笔钱来。

而要进行这么庞大的计划，什么最宝贵？人才！因此，荒尾精将第一步着力点放在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但日本实在太穷了，又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无法负担荒尾精的办学计划。原先，农商部同意将北海道的林场出售，提供10万元给荒尾精办学，但后来农商部换了大臣，这一方案也就打了水漂。荒尾精只好到处化缘，

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帮助下，总理山县有朋同意从内阁秘密经费中给他拨了4万元，川上操六还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几千元，借给了荒尾精。

经费不足，荒尾精不得不把原计划的300人招生规模削减了一半，学制也定为三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中日问题等，毕业后在中国实习一年。经过他在日本全国巡回演说动员，多方物色，通过考试招到了150名学员。日本官方对此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川上操六亲自为学员们训话，而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接见了全体学员，这在日本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师生们集体来到上海后，住进了十分简陋的校舍，地点就在英租界的大马路泥城桥畔。150名学生被分成了3个班，有宗方小太郎及两名日本现役军人小山秋作、西村梅分别担任班主任（“干事”）。

为了经费问题，荒尾精随即返回日本奔走。而就在这时，政府原定划给学校的1万元费用，因议会内政治斗争激烈而被取消，这令师生们人心惶惶，终于酿成了学潮。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

刀尖上的“少年日本”

经多方努力平息了学潮后，校方便开始在间谍技能之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一首贯彻该校“兴亚”思想的校歌便应运而生：

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
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
若问吾辈何所思
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军事考察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赶到上海参加了首届毕业典礼。

这些高歌着“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间谍们，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当时支持学校教务的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了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当时有十多个学员已经蓄起了发辮，很容易装扮成中国人，其他未留发辮的，则干脆剃光扮做和尚，四处刺探军情。上海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日本人的反常行动，而向上司发出了第一次谍报警报。

战争爆发后，日清贸易研究所只好停办，学员们也随同日侨大规模撤离。荒尾精等看到这正是“报国”的好机会，主动向军方提出，希望征召学员们入伍。日军从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人员中，征召了91人，在广岛大本营进行了简单的集训，分配到各军中。除了十余人继续改装侦察后，大多数人都做了随军翻译，同时协助日军进行政战，这些年轻人成了日本军队的耳目和向导。

在被中国破获的多个间谍案中，被处决的间谍们多在青春韶华：

藤崎秀，22岁；
钟崎三郎，25岁；
藤岛武彦，25岁；
福原林平，26岁；
高见武夫，27岁；
石川伍一，28岁；
楠内有次郎，29岁；
山崎羔三郎，30岁……

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中国政府处决了从美国领事馆引渡的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引发中美之间巨大外交风波，甚至差点导致美国国会弹劾“对华软弱”的总统。而涉案日本间谍的年龄，也成为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野蛮残忍的理由之一，美国的报章在提到两人时，几乎绝口不用“间谍”一词，而多代之以“日本青年”、“日本学生”等字眼。

侥幸逃脱的其他日本间谍，如向野坚一也仅26岁、宗方小太郎30岁，而在华间谍网的领导者荒尾精年仅35岁，只有幕后的资助者岸田吟香61岁，属于“老人”。

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军队提供重要的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些青年间谍在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即令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并自省。正如藤岛武彦留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而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驱的青年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著名思想家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惟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都在中国

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做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其实，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正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青春躁动，带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梁启超在日本所起草的《少年中国说》，那些朗朗上口的激昂语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不仅是对心目中“少年中国”的期盼，更是对当时青春日本的描摹和钦羡。正是这种洋溢着青春气息，令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当年，弥漫大江南北的是亲日情绪，而非仇日情绪。

“请在神社给我留个位”

1896年7月2日，甲午战争的炮声早已停歇。

一位西服革履的日本人速水一孔走进了杭州的仁和县衙门，操着流利的中文，要与知县伍桂生商量一件大事：领回两年前被斩首处决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高见武夫的遗骸。

这两名化装为和尚的间谍，在杭州被处决后，由仁和县用棺入殓，封交地保浅土浮埋。甲午年年底，杭州同善堂又将他们移葬义冢，专门做了编号标记。伍桂生会同速水一孔，在善堂司事等的陪同下，亲自办理了两具棺木的移交手续。

随后，在中国官方的帮助下，日本人将这两具棺木辗转送回了他们的家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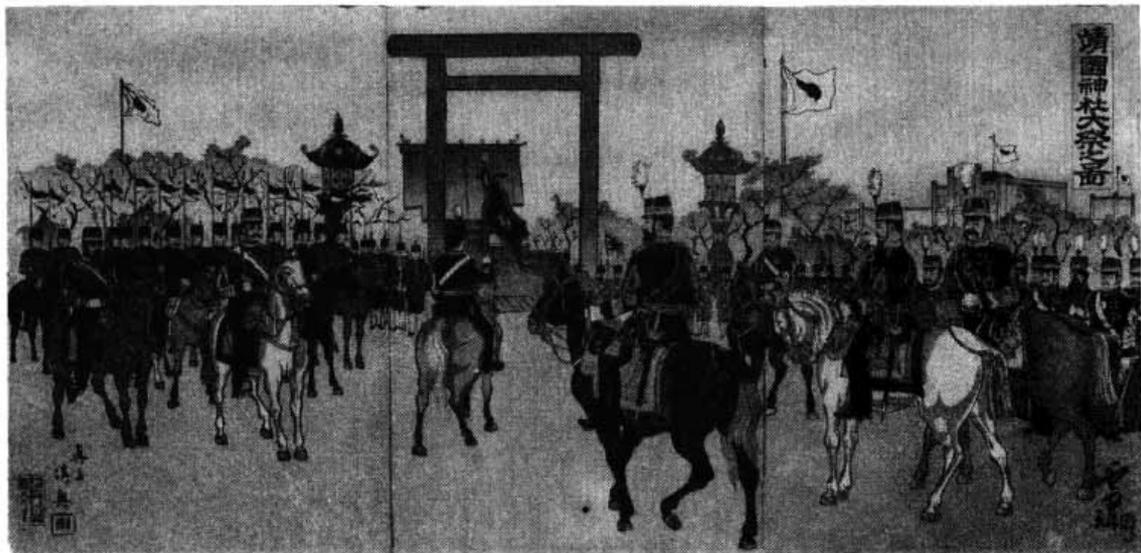
在甲午战争中被处决的日本间谍，陆续开始了魂归故里的旅程。只有在金州被处决的“三崎”，因辽东半岛根据《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将此当做了新领土，而就地安葬并树碑立传。日本人在收集“烈士”遗骸方面，表现出来相当的耐心细致，并为了这些事不断行文中国总理衙门（“外交部”），要求地方政府给予配合。

日本军方也正在认真核对阵亡将士的姓名，务求为他们每个人都在靖国神社等地方拥有一个灵位。“烈士”的事迹被有计划地整理出来，一些“烈士”甚至被神化：比如在南京被处决的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日本史料堂皇地记载道，他们被斩首后，那个刽子手就冤魂附体，不病而亡；而他们的冤魂还在刑场附近游荡，吓坏了当地百姓，众人只好将他们的尸骨重新挖出

来，盛装入殓隆重下葬，才消停下来，但那一带很久都无人再敢居住。

日本各地则纷纷为自己家乡的“英雄”，尤其是“烈士”树碑纪念，全国上下在胜利的狂欢中，又将表彰“英雄”演变成一场民众自发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清战争实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此类故事，其中有一个小村庄，有九人参战，都立功而归。村民们便立了块用汉字文言写就的凯旋碑，在大略回顾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过程后，说道：“若是役者旷古所未有，是固虽圣天子文武圣德，应天顺人之所致，元勋画策适机宜之效。抑亦谓之非从军诸子克履果毅，若貔若虎视死如归，忘家报国之功可乎哉？是役我村中从军者九人，皆力战立功，相继罢归。于是，同志胥谋，椎牛沥酒，以慰其劳，且将刻其事于碑，以告后昆。若夫诸子雄心奇迹，则载在史乘，人皆知之，余复何赘焉？”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甲午战争开战时被日本舰队捕获的北洋通讯船“操江号”，其被俘官兵也被日本释放回国，《申报》等却发表评论，严厉质问这些在日本受尽折磨的同胞，为什么不自杀成仁呢？！至于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数十万将士，除了少数一些将领，如邓世昌、左宝贵等之外，根本已



浮士绘：甲午战争结束后，靖国神社大祭场景。

无人记得，惶论官方公祭和树碑立传了。

日本人的报刊书籍，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将士们的“英勇事迹”，甚至不惜版面刊登阵亡将士的名单。而大清国的报刊，则在此前编造了大量“王师大捷”的假消息后，如今则亢奋地开始总结教训，批判一切，唯独没有将矛头指向媒体自身。

同样为国捐躯，大清子民们似乎死得轻于鸿毛。

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大清官兵们为保家卫国的慷慨言行，却留下了日本人的很多豪言壮语。在那些风华正茂而被捕被杀的日本间谍们遗物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烈士”绝笔书信和诗抄。

那两位在美国引发了政争狂潮的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都给日本的家人写了家书。楠内有次郎给他哥哥写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弟幸以聊通敌情之故，暂时隐身于该邦，以谋国家进取之道。然轻举妄动有悖忠孝大义之虞，为慎重起见，一时音问或缺，务望谅之。”而福原林平则给他父亲写道：“进入清国内地，参加大日本征服清国之旅，有神佛保佑，必可平安无事。”而一旦不幸，则将化为“不死之威灵守护国家千载”。

那位在被处决时，执意要面向日本所在的东方而死的钟崎三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小弟思之再三，此正以身报国之时，决心留下，直至日本军队来攻。无论遭遇何等危险，都要在敌国潜伏，以探听敌情。若能逢凶化吉，当有鱼雁报闻。倘无音信之时，亦即再无会期之日也。”

与钟崎同时赴死的山崎羔三郎，则早在1888年考察云贵时，就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表达了必死的信念：“弟所从事的事业至艰至难，系图亘古未有之大事，故须承受千辛万苦。然开其端绪极难，进退稍有不慎，必将付诸东流。诚为此焦心至极，静时千思万虑，弟心中已决……此番南行，云烟万里，涉湖南之水，越贵州之山，过云南之野，穿广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游獠獠苗蛮之巢，彷徨于瘴疠毒雾之间，决心务必达到目的。

虽前途渺茫，难保无虞，若得神明加护，上天保佑，来年中将重返上海。”

日本的文献中，收集了大量的类似书信。其中，有一封后方的父亲写给前线儿子的信，纯用汉字写成。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大势后，父亲开导儿子说：“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最后，这位父亲教诲儿子要团结战友：“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輿望。”这虽是100多年前我们敌人的书信，至今诵读至此仍令人不禁肃然。

那些活跃在中国的间谍，虽然年轻，汉语口语不好，经常要假冒是福建人或广东人，但大多有着相当不错的汉语写作修养，甚至喜欢也擅长写汉诗。

那位与中国农家结下很深交情的向野坚一，就能和老先生笔谈四书五经。他在祭奠“三崎”时，写了一首《吊三崎山》：

欲得虎儿探虎穴，千辛万苦复何辞。
秋风今日扫君墓，落泪荒山欲夕时。

作为甲午间谍第一案的主犯石川伍一，他有一首《偶感》，相当飘逸：

穷达有时富贵天，暂寻禅机清风眠。
忽看花落无人管，如水流光又一年。

当然，他们的大多数诗篇都是押韵的决心书而已。至于像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这样的学者型人物，更能写一手相当雅驯的汉诗。宗方在北京时写下一首《寄燕京诸君》：

落花时节辞歌浦，放浪今尚滞天涯。
十年落拓君休笑，胸里常蓄一片奇。
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
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
君不见东洋今日太多事，邦家前途累如卵。
先则制人后被制，毕竟此言不我欺。
谁取禹城献君王，谁扫边尘续四陲？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人，身上充满了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危机意识，而这正是推动着日本间谍们不畏艰险的原动力。

在有关间谍的日本史料中，谈到每个间谍被处决时，几乎都是慷慨豪迈的。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真实，而从中国的有关档案文件看，他们中的不少人的确是熬过了残酷的刑求，并且在处决时表现相当平静甚至视死如归。每当我看到这些材料时，常常掩卷长叹，怅然若失：这样的“英雄”，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甚至似乎只是“他们的”呢？

“我们的”英雄其实也不缺，只是我们过快地把他们忘记了。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队的将领就有数百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

“大清全民都腐败”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勢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給，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纽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



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



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图为当年日军的宣传画：抓获携款潜逃的清军军官。

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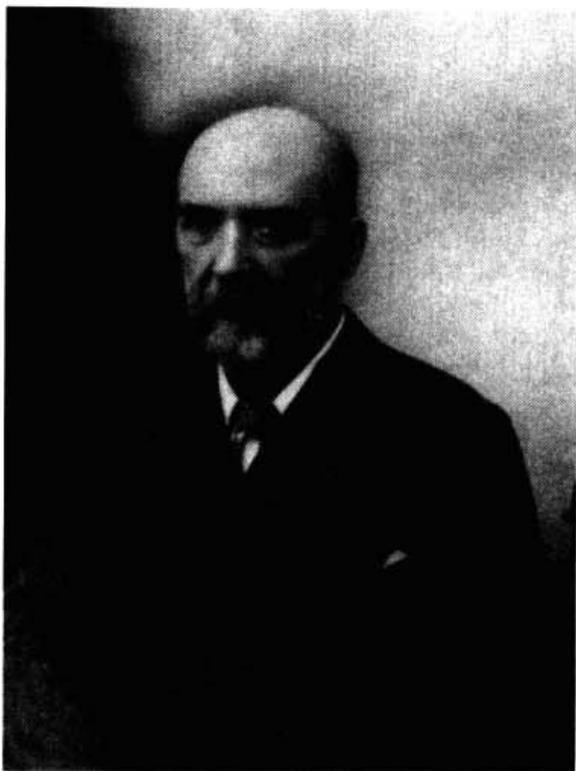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劻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上图）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日军“恢复中华”？

一个来自敌国的民营间谍机构，却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汉口乐善堂的这一决议，在今人看来似乎相当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的“兴亚主义”正是日本的主流，朝野都相信，进攻中国并非只是为了日本自身，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免遭欧洲的欺凌，为了黄种人能与白种人的种族竞争中不致灭亡。

其实，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而自己以中华自居。



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中国不承认。1879年日方在熊本镇台两个中队援护下，接收首里城，强行废藩置县。

1871年，中日两国在琉球事件后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予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取，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撤大围，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唆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

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僭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殒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怨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竿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裨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助。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鞑虏”的政策工具，无非根据

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 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诬言》中，指出：因为清朝政府的颓废，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



浮士绘：李鸿章因日军的攻势而头疼

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坚信，清朝政府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 Peril）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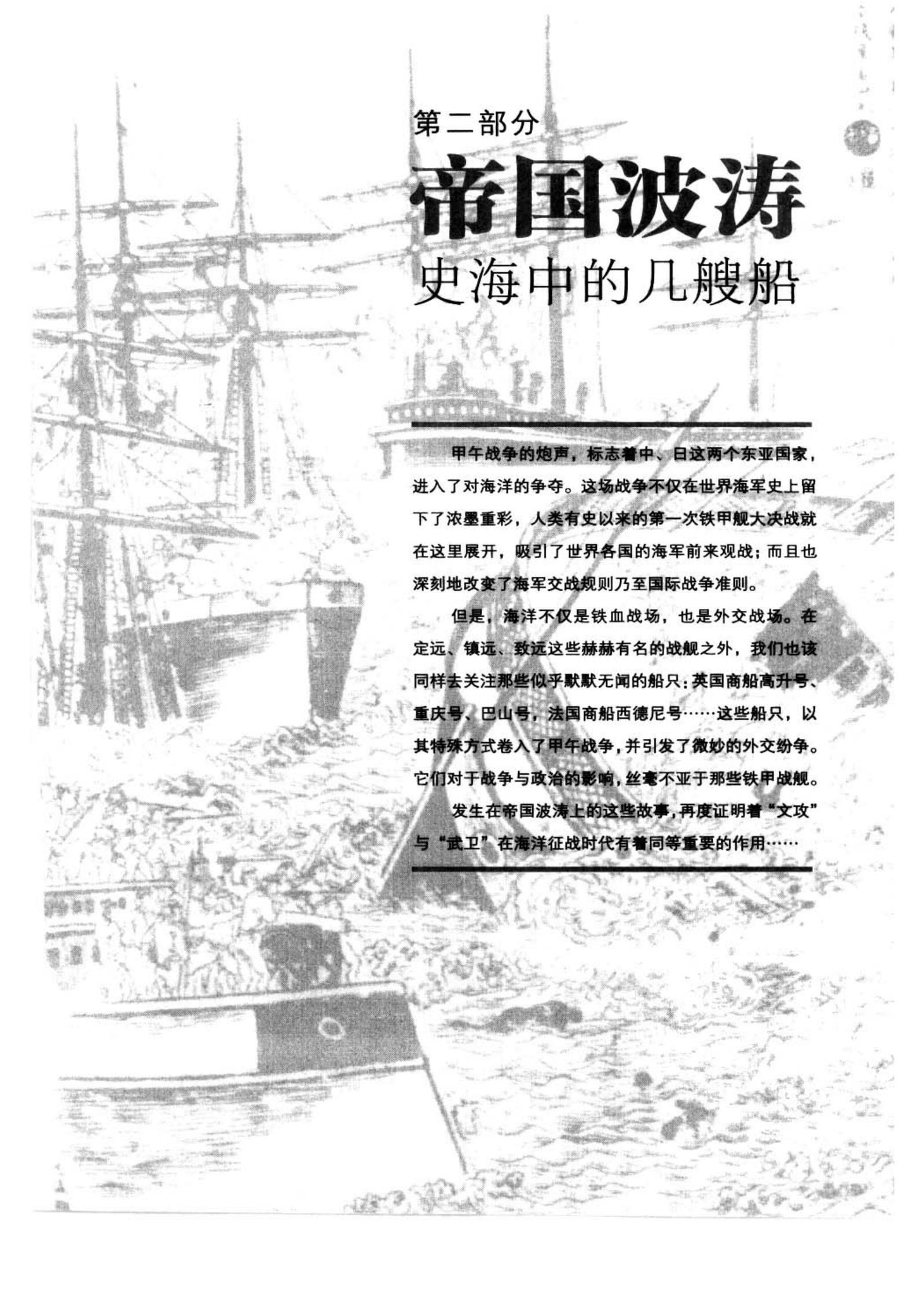
《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法国漫画家 Georges Bigot(1860—1927)所作《欧洲的噩梦》：左图为欧洲人在睡梦中，黄种人从中国如潮水般涌来；左下图为在日本人的带领下，黄种人（包括毒蛇）冲到了欧洲人的睡榻旁，只有俄国人惊醒过来准备反抗（指日俄战争）。

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



第二部分

帝国波涛

史海中的几艘船

甲午战争的炮声，标志着中、日这两个东亚国家，进入了对海洋的争夺。这场战争不仅在世界海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铁甲舰大决战就在这里展开，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海军前来观战；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海军交战规则乃至国际战争准则。

但是，海洋不仅是铁血战场，也是外交战场。在定远、镇远、致远这些赫赫有名的战舰之外，我们也该同样去关注那些似乎默默无闻的船只：英国商船高升号、重庆号、巴山号，法国商船西德尼号……这些船只，以其特殊方式卷入了甲午战争，并引发了微妙的外交纷争。它们对于战争与政治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铁甲战舰。

发生在帝国波涛上的这些故事，再度证明着“文攻”与“武卫”在海洋征战时代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高升号：黄海上的三国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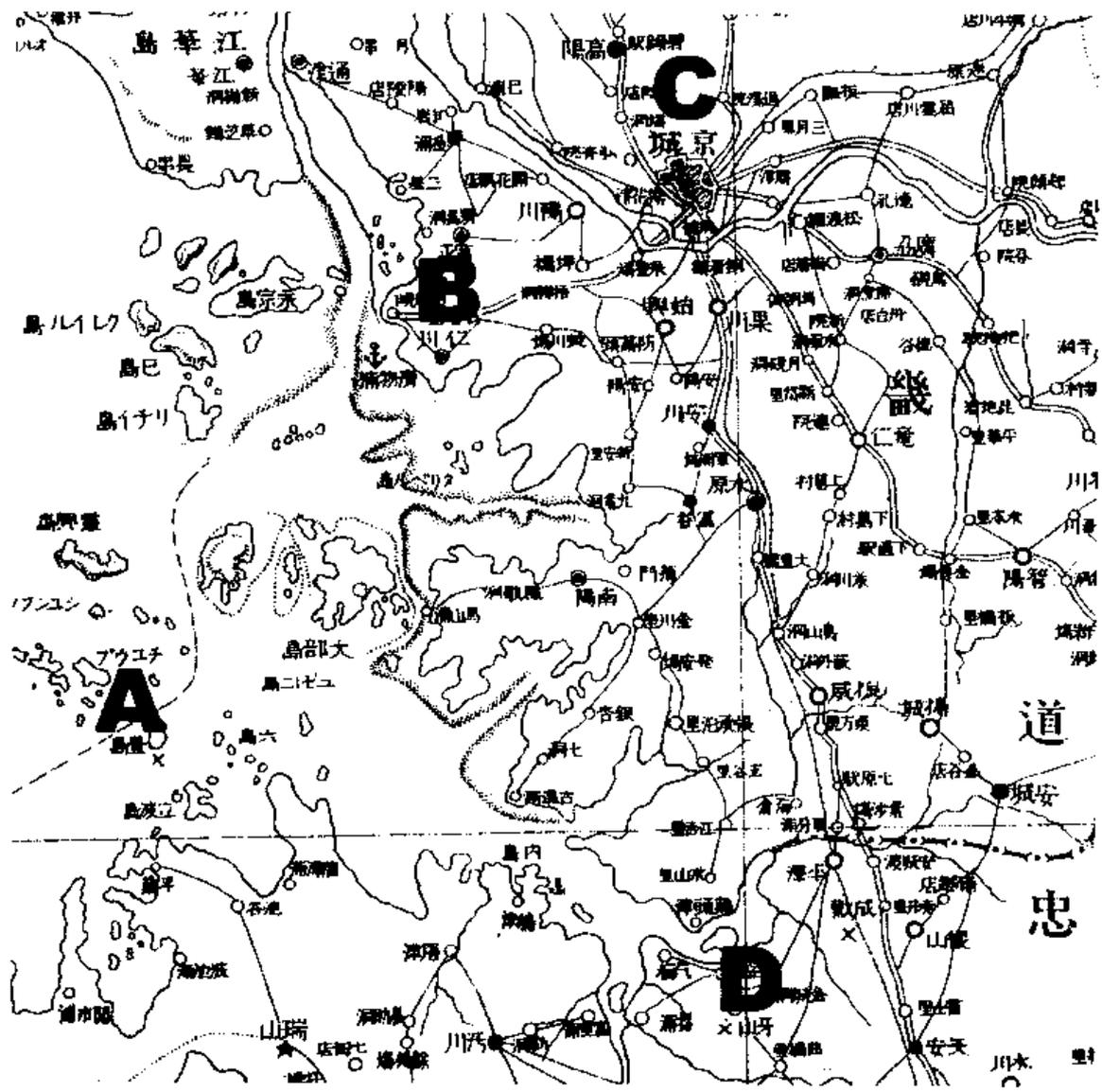
小个子把天捅破了

小个子的东乡平八郎知道，他只要一挥手，就能立马把头顶的天捅出一个大窟窿来。

此时，他指挥的巡洋舰浪速号（Naniwa），已经升起了即将攻击的红旗，所有的右舷炮和鱼雷发射管都对准了不远的目标。而那个被日本人舰炮牢牢锁定的猎物高升号（Kowshing），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和恐慌，桅杆



清军援军在码头集结，准备登船赴朝。载有清军近千人并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高升号商轮属于增援部队的第二波。西方画师根据历史记录所绘。



1895年日本军用地图(局部): A为丰岛, B为仁川, C为汉城, D为牙山。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军舰浪速号与满载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对峙了足足四个小时。

上依然骄傲地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

已经好久了,除了交战国和冒失的海盗之外,还没有任何船只敢在西太平洋拦截大英帝国的船只——即使是像高升号这样的毫无武装的商船。任何加诸于英国国旗的炮火,都有可能遭到日不落帝国强大海军的残酷报复。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犹豫的原因。

在那面大英帝国国旗下,由英国船员驾驶的高升号却装载了近千名全副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淮军和大量的军饷。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用步枪对抗军舰是徒劳的,但这些李鸿章的嫡系子弟兵,照样骄傲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投降

命令，并将吓得试图弃船的英国船员们牢牢地看管了起来。

这是1894年7月25日，一个即将引爆历史的日子。尽管黄海平静得波澜不惊，甚至没有一点风。从日本方向升起来的太阳已经爬到了最高点，在这片属于朝鲜的天空中，照耀着来自大清帝国的这条英国商船。

对峙已经在这个名叫丰岛的黄海要冲持续了四个小时，日本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陷入了僵局。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了两轮：日本人要求俘获这条船，英国人先是表示抗议，然后表示服从，但被满船的中国人愤怒地否决了；英国人和中国人随后要求返回出发的大沽港口，理由是出发的时候，中日并未宣战。

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好机会。

都说小个子胆大，东乡就是其中之一，他日后能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同列日本军神，靠的就是令世界军事界瞠目结舌的大胆。日后在日俄战争中令俄国人胆战心惊的旅顺港偷袭战，也是他的杰作。

作为日本的首批“海归”派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留学八年。返回日本后，他在日本海军内逐渐升职，并曾率领军舰至上海、福州和基隆等地观察中法战争情况。在1891年北洋舰队对日访问中，一个未经证实却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说东乡平八郎到北洋军舰上参观，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

浪速舰与高升号相持不下，这时，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军舰的烟柱，敌友难辨。

东乡下令开火，天终于被捅破了！



东乡平八郎

中国陆军遭遇最大海难

继元朝军队远征日本失败后，中国军队对外作战史上最大的海难开始在黄海上演。

浪速舰上早已上膛的鱼雷被发射出膛，右舷炮也迅疾开始轰鸣，毫无抵抗能力的高升号立时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一发炮弹命中船中央的煤库，煤屑和各种碎片随着烟雾一起纷飞，四处弥漫。英国籍的轮机长高登(William Gordon)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几发炮弹击中了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不少人被活活烫死。

英国船长高惠悌(Thomas Ryder Galsworthy)赶紧跑到机轮间，拿得最后一个救生圈，就由船边直接跳下，跳下时，听见“可怕的爆发声”，当他浮出水面时，天空中漆黑一片，全是被炸上天的炉灰煤粉。

正在当班的英国大副田浚林(Lewis Henry Tamplin)跑离驾驶台，抓住一条备用的救生带从船的前头跳海，带下一根铁链，有许多船员从这条铁链拥挤而下。

西班牙舵手欧利爱脱(Pedro Oriate)看见日本人开火了，就伏在船桅下以避子弹。当他觉得船慢慢地沉下去的时候，便立刻爬到船最前的桅上。另一名西班牙舵手伊万杰利斯特(Lucas Evangelista)则抱着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跳入水中。

清军前营哨长张玉林一直在船舱里，所在的舱房被炮弹命中后，只好跑出来，但又不会游泳，当船下沉时，他抓到船上的绳索，也爬到了船桅上。

SINKING OF THE KOW SHING

DENOUNCED IN ENGLAND AS A
BARBARIC BUTCHERY.

Only 41 Survivors of the Fury of the Japanese—Reports that Struggling Men Were Shot in the Water—The Transport Said to Have Been Under the British Flag—A Demand for Surrender Rejected—No Officers Left Alive—Indignation in London.

PEKIN, July 30.—The following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recent engage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fleets has been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1894年7月31日《纽约时报》对高升号的报道



汉纳根



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

年仅 24 岁的士兵牟庆新，也从舱中逃出，船将沉下去的时候，他抓到一个漂浮的梯子，借着它爬到船桅上。

宁波人厨师王荣舟看见船旁有一索，由索而上，至水手卧处，取一蓝色凳当救生漂浮物，复跃入水，泅至岛上……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道：“轮船已经沉没，清兵全部葬身鱼腹，海面上只留下长时间凄惨的喊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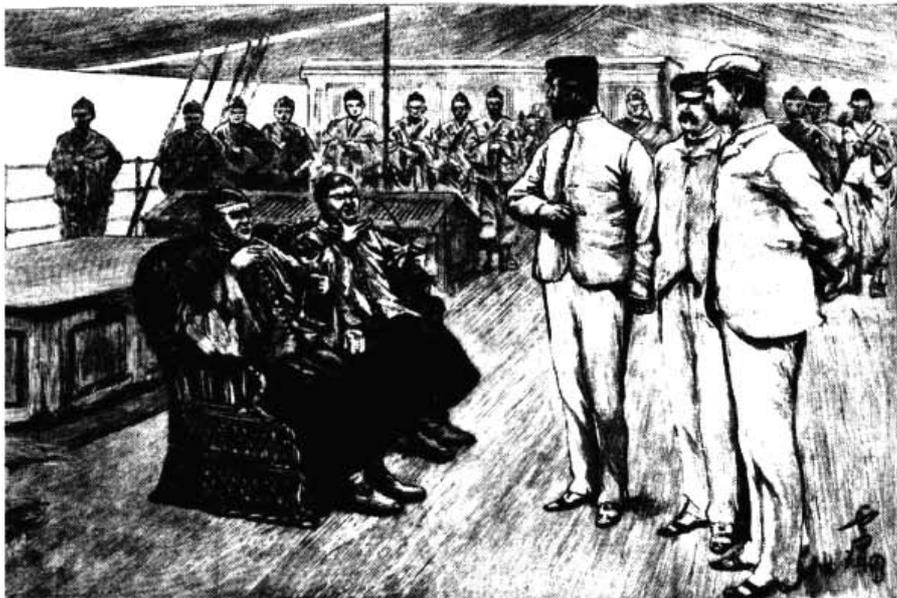
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最引起日本、中国和英国三国关注的，就是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汉纳根是日耳曼贵族，出身于德国赫森军人世家。1879 年，24 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父亲的好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牵线，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将他聘请来华，先在天津充任准军教练。天津武备学

堂成立后，又出任学堂的教官。后来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就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二人由此结下情谊。不久，他因不满清军战术陈旧且不思变革，遂离开军队，转而“从事于测算之役”，改行当工程师了。

来华不久，汉纳根被德璀琳招为女婿。德璀琳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汉纳根在李鸿章眼中地位日重。1880 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并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处炮台。

汉纳根事后解释他搭乘高升号的理由是：“我以私事重至中华，并非受中国官方敦聘。行抵上海，听说中日两国即将失和，到了天津，局势更为紧张，



高升号上的中国将官（坐者）告知船长（右立者）、大副（中立者）和汉纳根（左立者）宁死不降。当时西方画师根据相关证词所绘。

但我仍不愿意卷入。不久我有事要去朝鲜，并顺道搭乘高升号。高升号本来就是商船，我作为乘客，十分正常。只是搭乘高升号的中国军官中有不少是我的旧友，所以就为他们与船长之间担任翻译，义不容辞。”

但以一介平民身份，能得以搭载如此重要的运兵轮船，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在7月23日盛宣怀等人致清军在朝鲜的统帅叶志超的函中，便盛赞汉纳根在华十五年，既熟悉西方的陆军韬略，又熟悉北洋情形。盛宣怀说，汉纳根“忠勇性成，自愿赴韩勘度地势，侦探敌情，是以派令附坐高升轮船先赴牙口（注：指中日两军在朝鲜对峙的牙山），并同队伍上岸，必宜神速”。又说汉纳根“见机敏捷，已切嘱其随时设法照料，与吴、骆两营官斟酌而行”，要求叶志超将军事计划与汉纳根一起商量。

在日军开始攻击后，汉纳根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此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方，甚至担任了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了世界上首场铁甲舰大战——大东沟海战。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甲午风云》而被广为流传。

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

勇敢地还击。”而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William H. Wilkinson）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俘虏。”

虽然有学者质疑这样的无谓抵抗，但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逃生无路的清军们射击敌人军舰，亦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只是自发的本能的个体行为，不可能是有组织的抵抗。何况，这样的抵抗毫无作用。

谁杀了落水清军？

部分船员和清军落水后，这一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中国绝大多数甲午战争著作中，都相沿使用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的宁死不降，而“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的说法，并加以大量的渲染。一如日本的不少著作中异口同声认为是沉船上的清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及同胞开枪射击一样。

获救者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落点的不同，而充满了相互矛盾。

高升号上的26岁的司炉工董阿新是广东丰顺人，已有12年的船上经验。攻击开始的时候，他刚从机舱里出来，在船首甲板上洗脸吃饭。船沉后，他攀绳下水，先是登上了高升号的一条救生艇，艇上有40多人。日军向他们和在水中游的人射击，“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救生艇上的人当场就被打死了8人，舵也被毁坏，救生艇沉没。后他又上了高升号的舢板飞古额号，此舢板有两三回翻覆，直到次日被法国军舰发现获救。另一获救者王桂芬说高升号一共放下去三条救生艇，都满载了人，但被日本人打沉了两只。

士兵牟庆新指证浪速舰在高升沉下去后，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落水的清军哨长张玉林则看见日本军舰的每一根桅上都有一人在发射机关枪，对高升号及水里的人放枪，扫射达一小时之久，“骆营官被炮打死，吴营官

下水死”。他在获救后的调查中甚至形象地模仿了炮柄怎样转和机关枪的声音。

英国船长的证词则指控，是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屠杀落水者。无论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后来在英国领事馆组织的海事法庭上，高惠悌都坚定地指责“清军的暴行”。

他在被浪速舰救起后，就说：“船将沉没之前，我跳入水中，清军向溺水之我开枪，我潜于水中屡避弹丸。”“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一



中国画师所绘高升号被日军悍然击沉的惨况，题为“形同海盜”，刊于上海《点石斋画报》。

弹落在水里，离我耳朵很近，随后即弹如雨下，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

这样的指控，在英国被很多人怀疑是船长因困于日本人之手，而受到了压力。但在被日本当局释放后，他在英国驻长崎总领事奎因（John J. Quin）面前宣誓作证时，还是坚持：“从浪速舰上用枪是打不到我的，因为中间有高升号隔着”，是“高升号上的许多士兵在用步枪向我瞄准开火。”而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中，他说：“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朝水里的人开火，我记得他们在高升号沉没后便完全停止了射击。”但在法庭上，他的口气终于更为客观了，承认：“我在跳下船之前还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受伤，但见到他们有许多人在水里被打死了。”

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而汉纳根的证词，则指控不仅是日军要对屠杀落水者负责，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也要对此负责。

他说：“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兵士，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我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汉纳根在接受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取证时，说：“日本军舰卸下坚固的小艇，艇上士兵向高升猛烈射击，落水的清军也向高升射击。”照此说法，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还在互相射击。

汉纳根的大部分证词得到其他幸存者的支持。

大副田泼林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法庭时说：“……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曾朝水里的他们（作者注：指汉纳根和船长等）开枪，也曾朝我开枪。……但日本人没有试图去救捞中国人。救我上来的小船的日本军官告诉我，他奉命只救欧洲人。他们向坐满了中国人、有些人还抓着救生索的小船开枪扫射。”

他回忆说，跳海后，“四周被子弹打得水花飞溅。此时我离船约70或80码远，我回头望去，中国士兵正在甲板和舷梯上向我射击。我用救生带护住头部，随波逐流地游过船身。避开了船，我继续向岛上游去。但当我看到我前面的中国人时，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上岛跟在船上一样危险，于是我又转回来，脱光衣服向浪速游去。此时该舰离我们的船相当远了，就我的记忆，这时已不再射击。”

在日本官方对他取证时，他说：“从中国人对跳入水中的欧洲人开枪的次数来看，在欧洲人到达陆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杀。我在水中游泳离开高升号时，船中的中国人向我开枪。这从浪速、高升二船对于我的相对位置来看，是显然的。从位置来看，浪速舰的子弹只会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从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开枪。”“没游多远，我发现这艘日舰放下两艘小艇，其中一条向我划过来，将我救起。我告诉了日本军官我最后见到船长和汉纳根的方向，他命令另一艘小船划向我指的方向，并没有设法去救溺水的中国人。有两条救生艇摆脱了沉船，上面满载着中国人。我所在的小艇打了两阵枪，欲将它们击沉。”也就是说，田泼林坚定地认为，不仅沉船上的中国士兵对落水同胞进行了射击，全副武装的日军小艇更是对挣扎求生的救生艇发起了冷血攻击。

当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水面屠杀。

舵手欧利爱脱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水里被人开枪打死，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游水逃到岛上去，并强调说没看见日本人在水面杀人。

高升号的司炉工李安，扒在桅杆上，“此时潮水又涨，风浪又大，日本人也把他们的舢板下在水里巡察，也不杀水里的中国人，也不救水里的中国人。”

事后，在高升号事件引发的中、日、英三国大角力中，各方对这些劫后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中日两国的媒体更是如此。

如，《申报》报道1894年9月8日报道：“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此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然义魄忠魂，历久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

9月26日，《申报》另一篇报道说：“德国伊尔达斯炮船，在洋面捞获浮水衣一袭，知高升轮船之物，遂交回怡和洋行。细看衣内，被枪弹所击，密若蜂房，由此思之当高升轮船被击后，诸人虽免水逃生，倭人仍用枪轰击不遗余力。此事英廷若不有以惩创，恐倭人不独藐视中国，即英国亦将为所鄙视矣。”

日本报纸则渲染中国军队射击落水的欧洲船员的“野蛮与残忍”，8月7日的《国民新闻》就说：“英人船长以下均跳入水中，中国人见之，射击舰长等人。”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创始人伏雷德·简在《日本帝国海军》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所惯于引用的日本人射杀落水者的说法，基本都根基于汉纳根的证词，但“当汉纳根溺水逃生时，他的位置很难看清当时的情况”。因此，简推测，高升号上的中国人是向浪速号派出的小艇开枪，以阻止他们营救落水的欧洲人，而浪速号则继续开枪压制高升号的火力。基于简这样的假设，得出的推论是：中日两军都没有故意射击落水者，而是相互战斗中殃及池鱼。

这段史实，其实并不复杂，根据各方公布的幸存者证词，客观公正地看，日本人和清军扫射落水者都完全有可能。

对清军来说，扫射落水者的最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汉纳根所说的“自己不能活也不让同胞活”的阴暗心理，而是要发泄对弃船跳水的欧洲船员的不满，这和清军阻止欧洲船员乘坐日军小艇离开是同一想法。在当时情境下，如此愤怒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

汉纳根事后曾指责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回想高升如果最初不遵从日船命

令而逃走，隐避于岛屿之间，全船生命当可保全。可惜船长等对本国国旗忠爱之心过于纯厚而终于招此厄运。”当时日舰正在追杀撤退的北洋军舰济远舰，高升号完全有逃脱的可能，但因为船长对英国国旗的过度自信而没有实施。而当日本人要求俘获高升号，并且要求欧洲船员弃船时，作为在航行途中对乘客生命和财产负全责的船长，也从未为乘客们的安全争取任何保障，而是自己居然“欲下小艇”。即使仅仅从安抚全副武装的乘客们的角度看，这一举动也十分不明智，遭致清军刀枪相向，乃至沉船后清军向跳海的船员们射击，揆之情理，也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日本人扫射落水者，存在着几种可能：一是为了压制清军对落水欧洲



法国军舰利安门号拯救在高升号事件中落水的中国士兵。图为1894年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对此进行的专门报道。

洲船员的射击火力，而殃及落水者；二是为了尽可能地杀伤清军有生力量，毕竟高升号运载的是清军精锐，多杀一个，就能多给在朝日军减轻一分压力，这和下令击沉高升号是同一考虑。

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中，都只部分引用汉纳根证词中所言日军杀戮落水者，而刻意回避了汉纳根对清军向落水者开枪的描述。

高升号惨案的伤亡是惊人的：

船上共计950名清军，幸存者一部分攀爬上了高升号残骸的桅杆，后被法国军

舰利安门（Lion）救起 42 人；另一部分或溺水或乘救生艇，漂流到了羊岛上，后被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Iltis）救回 112 名，英国军舰播布斯号送回 87 人；另有漂流获救 2 人，漂流后又被浪速舰俘获者 3 人，共只有 246 人逃生；74 名船员中，共 12 人得救，其中浪速舰救起 3 人，法国军舰利安门救起 3 人。

浪速舰在开火后，放下了几条小艇，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三人。这样有选择的救援行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乡对击沉英国商船还是心中无底，多救些欧洲船员上来，便于事后的转圜；二是日本人已经实行“脱亚入欧”多年，在心理上努力将欧洲人看做“同胞”；三是当时军情莫测，日舰担心北洋主力赶到，急于脱身。三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梯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东乡给予了他们优待，替换了干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等。到了日军基地及被送到日本本土后，日本官方对三人都给予了优待，这对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影响很大。

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 704 人，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 人）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这些多为李鸿章经年训练的精锐淮军，中国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这样的伤亡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军在牙山的力量失衡，而且，根据德国海军的观察，清军因此“士气大为沮丧，而以极不可靠的制海权为满足，整个朝鲜海归于日本自由航行”。

在朝鲜的战斗打响的同时，围绕着高升号惨案，一场长达十年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 - 东京 - 伦敦间展开……

清廷希望拉英国抗日

满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噩耗在第二天（1894 年 7 月 26 日）传到了驻节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极其强烈地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宝士德事后评价道，李鸿章“他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他们打了你们的总领事，击沉了你们的船，一点也不把你们公使的调停放在眼里！’”

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了紫禁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双方对本次重要会议各自做了记录，但在某些关键细节上有所出入，反映了不同的关切点。



庆亲王奕劻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载，当奕劻追问：“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

而在欧格讷写给伦敦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虽然我不如亲王消息灵通，但我仍有重要理由怀疑中国能否成功地抵抗日本突然和强有力的侵略。”

这份由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对于中日冲突已经爆发、且悬挂英国旗帜的商船被日本军舰悍然击沉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强国的

政策取向，应作出基本判断。英国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而最关键的是，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

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清廷对英国动向的判断和掌握。

日本政府痛斥海军

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

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证实，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最害怕的是英国因此与中国结盟。

西乡从道被伊藤博文训斥后，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随后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日本在接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后，一方面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回复英军，请英方经由外交机关交涉；另一方面也试图约束海军军官们今后应审慎从事，但在舰队内部传达时，受到了东乡平八郎等的强烈抵制和不满。

从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蹇蹇录》记载，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痛斥海军贸然击沉高升号，担心英国与中国结盟。

西乡从道曾问陆奥宗光：“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牒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陆奥宗光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障碍。”

陆奥回忆道：“最使我国官民大吃一惊的，是我国军舰浪速号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消息……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有英国国旗的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有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7月28日，他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说：“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并提出停止增兵，在前线与清军脱离接触，以免欧洲列强干预。

英国军方要求对日报复

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Edmund Fremantle）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尽管当时出于全球战略（主要是对抗俄国南下）的考虑，英国已经决定扶持日本，但因为长期的“传统友谊”，英国军方和民间都还是将中国作为远东的首要合作对象，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斐里曼特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利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斐里曼特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驻伦敦公使青木周藏奉命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斐利曼特的干预不仅侵害了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应有权利，更与英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青木要求英国政府下令撤回斐利曼特的这一要求。

三国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从事件发生到8月2号日本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日本走了两步重要的棋：

首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没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据西方历史学家研究所得，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

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英国在获救者集结的朝鲜仁川以及获救者被送回中国的第一站烟台，收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Lord Kimberley）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回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就在英国草拟意见的时候，日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英国国际法专家为日本声辩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泰晤士报》

31111b. 20040

1089



The London Gazette

EXTRAORDINARY.

Published by Authority.

TUESDAY, AUGUST 7, 1894.

By the QUEEN.
A PROCLAMATION.
VICTORIA, R.
WHEREAS We are happily at peace with all Sovereign Powers, and States;
And whereas a state of war subsists between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and others (including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 territories, or dominions);
And whereas We are on terms of friendship and amicable intercourse with each of those States, and with their subjects and others (including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 territories, or dominions);
And whereas great numbers of Our loyal subjects reside and carry on commerce, and possess property and establishments, and enjoy various rights and privileg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each of the aforesaid States, protected by the faith of Treaties between Us and each of the aforesaid States;

"This Act shall extend to all the Colonies of Her Majesty, including the aforesaid territorial waters."

"Royal Edictment."

"If any person, without the licence of Her Majesty, being a British subject, writes or withdraws Her Majesty's frontiers, or agrees to accept any commission or engagement, in the military or naval service of any foreign State at war with any foreign State at peace with Her Majesty, and in this Act referred to as a friendly State, or, whether a British subject or not, which Her Majesty's dominions, takes any other person to accept or agree to accept any commission or engagement in the military or naval service of any such foreign State as aforesaid—

"H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gainst this Act, and shall be punishable by fine and imprisonment, or either of such punishment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before which the offender is convicted; and imprisonment, if needed, may

英国政府公报 The London Gazette.
1894年8月7日。女王宣布在中日战争
中中立。



日本征服中国漫画，载于日本东
阳堂发行的《日清战争图绘》（1894
年12月20日）。

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韦斯特莱克、胡兰德之外，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这几位专家的论调出来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几位专家“卑怯”、“不爱惜自己荣誉”、“违背职业道德”、“寡廉鲜耻”。但他们的论调对舆论明

显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英国的海事审判。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8月14日，陆奥向驻英公使青木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之训令》，表示高升号本身“非法征募”，违反了女王的中立声明，要求青木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当日下午，青木即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指令臣民严守中立。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的枪杆子毕竟是听政府指挥的。在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陆奥在发给日本驻英、俄、美等公使的电文中说：“英国海军司令报告说，他考虑到船的被击沉是有理由的。并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提出要求。”

罗丰禄的抗争

1894年11月英国作出最后裁定后，到次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1896年4月27日，索赔谈判正式开始。此时，在英国政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其主席、后成为国会议员的克斯威克（William Keswick）就是怡和公司的合伙人，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以外交手段推动其在华的商业目的，而为高升号索赔之事首当其冲。

此时，中国公使龚照璠因为在伦敦公然绑架孙中山，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内。李鸿章亲信罗丰禄以二品顶戴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公使）。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罗丰禄，是中国第一批留英学生，文

武兼修，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和大英帝国周旋。

深谙洋务的罗丰禄，在高升号事件处理中，一出手就给英国一记猛拳：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索赔要求必须在损坏事实发生后的5天内提出，而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在事件发生后近两年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主张期限。

根据英国的史料记载，当时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利斯伯利（Lord Salisbury）的高级助手桑德森（Thomas Sanderson）就为此沮丧不已，因为这正是英国的索赔要求在法律要件上的软肋。

1898年8月22日，罗丰禄向沙利斯伯利提交了一份照会，驳斥了英国学者以及司法部的全部观点。他指出：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的。其次，多日在海上航行的高升号，不可能得知在它遭遇日舰之前的数小时，中日军舰之间发生了冲突，既然高升号从未收到任何交战方的正式宣战通知，强加在高升号头上的所谓中立的义务就不存在。他指出，日本军舰唯一能做的合法行为，就是让高升号返回出发港口——实际上，从各方当事人的证词看，当时高升号船长也是如此与日本军舰交涉的，但被日军拒绝。

罗丰禄说，日本和英国的说法中，高升号的唯一“罪名”，就是它反抗了日军的强制行为，但在未得到“任何交战方通知”的情况下，高升号当然可以反抗，而英国政府却说日本人因此有权将其击沉，这是十分荒谬的。

这位中国公使，对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英国向中国索赔的合法性，都予以了坚决的否认。

1899年4月，中国公使和英国外交部继续舌战，但英国拒绝接受中国的观点。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



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深谙洋务，在高升号事件处理中，一出手就给英国一记猛拳。

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正如英国学者胡兰德分析的，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如果当时中日还未处于战争状态，则日本必须为其非法搜查和破坏高升号承担全责。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

中英两国陷入仲裁困境

中英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鉴于此，1899年3月18日，英国外交部提出以仲裁方式解决，罗丰禄于7月18日向总理衙门请示，北京于12月10日表示同意仲裁。

英国给中国提供了三种仲裁选择：一是海牙国际法庭，二是英国法院，三是选一位有声望和权威的第三国仲裁员。中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请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考特（Joseph Hodges Choate）作为仲裁者。

在双方共同拟订提交仲裁的文书草案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坚持认为日本并非参与仲裁的当事人，其与中英之间所需要仲裁解决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将日本的责任写进草案；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的责任问题恰恰是中英分歧的焦点和寻求仲裁的原因，需要的话，应当将日本也追加为仲裁当事人。



罗丰禄说，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的。图为朝鲜前线的清军。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观点被英国粗暴地驳回了。1901年1月18日，英国政府就仲裁事宜在《泰晤士报》刊登公告，表明仲裁的目的只是证明中国是否有错，以确保中国对英国予以赔偿。在英国官方看来，仲裁只是判定中国赔偿的时间和数额而已。双方继续僵持到了1902年4月，英国政府提出和中国做笔交易：如果中国能在草案中放弃对日本的所有指控，则英国同意放弃对中国的所有指控。

但此时，双方却突然取消了仲裁安排。

中国息事宁人赔钱了事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事件，随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与此军国大事相比，高升号的善后事宜显得有点渺小了。

1902年5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与包括新任驻英公使张德彝、庆亲王奕劻等在内的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根据萨道义的记载，中国官员说，大家何必为了高升号这样的小事纠缠不休呢？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可以给予高升号船东“慈善性”的补偿。

几经周折，讨价还价，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正好10年差四个月。

导致中国政府愿意赔钱了事的原因，除了庚子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外，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年租赁高升号的合约中明确约定，一旦中日有战事，该船必须立即返回上海，合同立即终止，否则，中国政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一个月以内以19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该船。奇怪的是，无论是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明确地以此特别条款向中国主张权利。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事件，最后却以民事事件收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说的，“英国政府始而动用公法继而诉诸私法的行为，就好像日本人从未打

沉过高升号一样”。

高升号事件影响深远

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中发生最早，牵涉面最广，耗时最长，也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多边角逐。随着高升号的沉没，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展开，旧的大东亚秩序土崩瓦解。新东亚在硝烟、火光和血腥中诞生，并从此与世界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事实证明，日本军方在高升号事件中的“鲁莽行为”，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成功即向西方表明：日本比中国更有实力成为新的远东代理人，这当然也更有助于日本废除其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高升号事件之前，日本一直试图与英国重新签订条约，力图废止不平等条约。这是明治政府前30年奋斗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十分担心军方在



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日亲近，甚至结成了同盟。图为日人所绘日英同盟宣传画。

朝鲜的任何鲁莽行动可能将英国逼到敌对面去，前功尽弃。在明治天皇的亲自协调下，直到英国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次日，日本才决定开战。但此时条约虽已签订，却未换文，因此，日本政府因高升号事件而对军方恼怒亦在情理之中。但英国政府以自己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新的伙伴的诚意。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日亲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

高升号事件也促成了国际法的重大修改。1907年，受日本再次偷袭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刺激，各国迫切希望规范战争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召开。会议上，英国动议提出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即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对它们才发生效力。但由“国际法研究院”提出的在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的建议，却没有在公约中体现，这最终还是留下了可被利用的破绽。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偷袭飞机到达珍珠港上空时才递交宣战书，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001年，韩国宣布打捞高升号，大量文物“出土”。

高升号上价值8800万美元的600吨银锭，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打捞人员在探捞时，同时发现7具遇难中国士兵遗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人、包括中国那些激昂“抗日”的愤青们的重视，惶论任何形式的祭奠与缅怀。

此时，距离那个悲剧时刻，已经过去了97年，而隆隆的炮声似乎早已被人忘怀……

操江号：故国不堪回首？

1894年8月15日，上海出版的《字林沪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禽兽之行》，对日本人“凌虐”被俘的北洋操江号官兵一事进行了报道。

操江号是北洋舰队的通讯船，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中被俘，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另一艘北洋雇佣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Kowshing），却因船上的清军拒绝投降，而被日本海军击沉，近千人遇难。

在斥责日本人“禽兽之行”的同时，《字林沪报》同时愤怒地指责这些被俘官兵：“尚何所望而不即自裁甘受此侮辱哉？！”

操江号是一艘木壳木肋的老式军舰，原属南洋水师，后借调到北洋用于通讯和运输，配置官兵82人，船龄已超过20年，虽然配备有5门火炮，但也只能勉强对付海盗而已，根本不可能作为对抗军舰的武器。

平日里，操江只是作为北洋的通讯船使用，而就在甲午开战前山雨欲来的危机时刻，李鸿章居然派遣这样一艘“老爷船”，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只身装载文件、武器和巨额饷银由威海卫开往朝鲜牙山。

日本在事后为高升号事件所做的种种“公关”活动中，将操江号说成是为高升护航的北洋军舰，以期减少全副武装的战舰击沉既无军舰护航，又无自身武装的商船的血腥味。其实，操江与高升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运输任务，高升从大沽开往牙山，而操江则是从威海开出。操江与高升在丰岛附近才相遇，即遭遇日本舰队。所以，操江既没有护航高升的任务，也没有护航的时间，更没有护航的能力。

操江舰舰长王永发为浙江镇海人，已年过半百，早年曾在英国军舰上当

水手，继升为水手长，后来转入清军水师，积功擢参将，委带操江号。日本的资料特意指出，在英舰炮击日本下关时，王永发正在该舰服务，以期表明他是“入侵日本的帮凶”。

操江号在丰岛附近洋面发现日本舰队时，日舰已经截停了高升号。王永发见状不妙，立即转舵回行，这一举动是明智的，一方面操江根本无力对抗军舰，另一方面操江悬挂的是黄龙旗和北洋军旗，不可能像高升号那样指望以中立国英国国旗自保。

此前以寡敌众的北洋主力军舰济远舰，正负伤逃离战场，日本军舰吉野紧紧追赶，两舰都先后与正往回行驶的操江号交会，但吉野没有理会操江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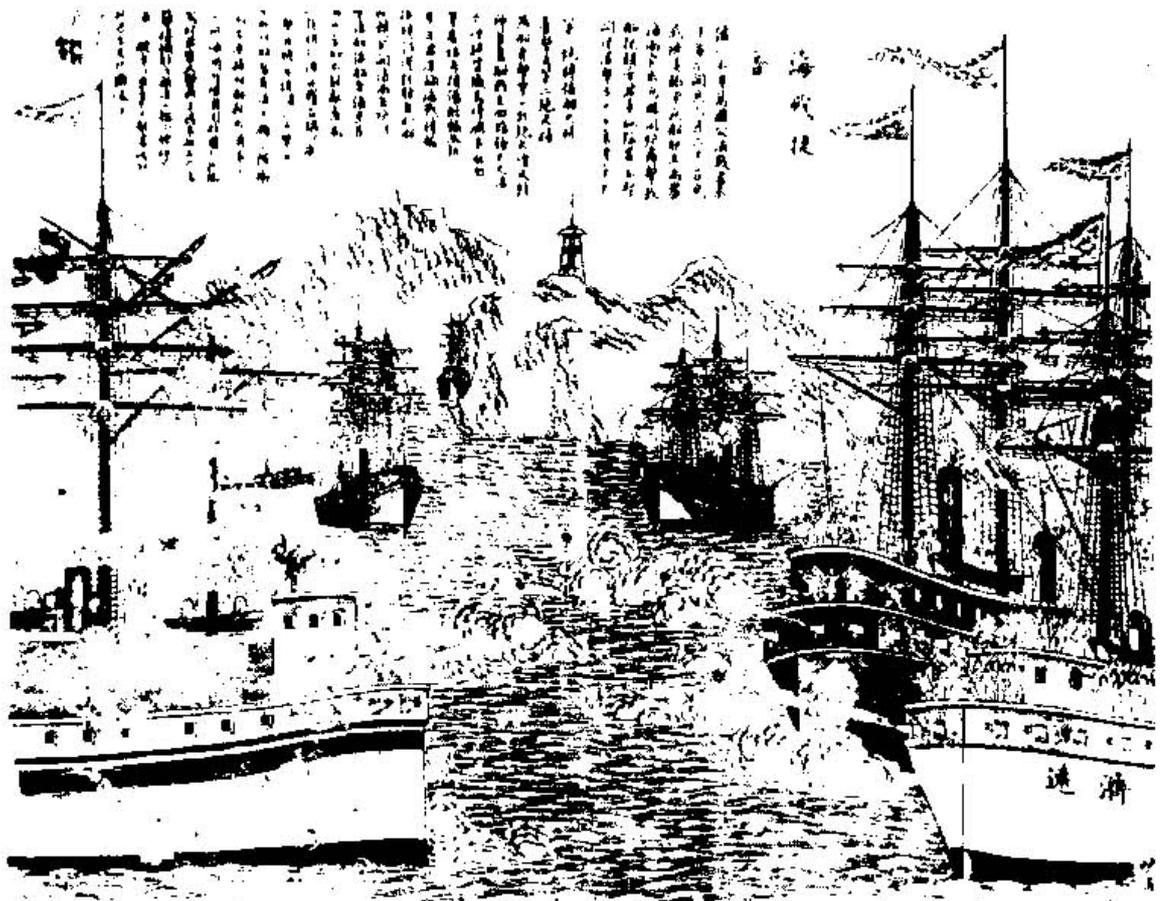
下午1:50时，奉命追击操江号的另一艘日本军舰秋津洲号，追上了它的猎物。秋津洲舰逼近操江号，发炮示警，命令操江“停驶抛锚”。操江不应，继续西驶。秋津洲舰再追近，发射一发12公分口径炮弹再度示警。王永发见状慌乱，甚至准备自尽，被随船前往朝鲜保护电信设备的天津电报局技师、丹麦人弥伦斯（Muhlenstedt）劝住。

操江遂悬挂白旗和日本国旗，表示投降。日本的官方战史《日清战争实记》中对操江“竟软弱地挥白旗，表示投降”表示惊讶。

在弥伦斯的建议下，王永发将所带重要文书及密电本当即投炉中焚毁，以免泄露军情。还准备将船上所装20万两饷银投到海中，以免资敌，但仓促间未及施行。

约在下午2:10时，秋津洲放下一只舢板，装有日本海军官兵及管轮等共28人，俱持枪械，登上操江。到船后，即将操江船上所有人员拘禁于后舱，由日兵持枪看守。

日军遍船搜求文书，但无所得。于是，将王永发拘上秋津洲，其他人员仍关在操江后舱。随后，秋津洲起锚南驶，操江随行。途中与旗舰吉野相遇，立即以信号报告：“敌舰降服，其舰长在我舰。”又报告说：“据操江舰长称，清舰在大同江，扬威在仁川，镇海在牙山。”于是，坪井航三下令将操江带至群山湾与本队相会合。



上图：丰岛大捷。这是《点石斋画报》的另一则假新闻。下图：浮士绘，丰岛海战。

1894年7月25日清晨，“济远”和“广乙”两艘中国军舰在完成护送清军在朝鲜牙山登陆后，离牙山返航，在朝鲜丰岛海面，遇上日本联合舰队“吉野”、“浪速”及“秋津”三舰，“吉野”首先开炮，打响甲午战争第一炮。中国军舰随后还击，两军展开激烈炮战。“广乙”最后受重伤，纵火自焚；“济远”舰悬白旗投降。

在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发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的报告中说：“（操江号）曳至我根据地。舰长以下船员移往军舰八重山，船体归我舰队使用”，这是日本海军史上缴获的第一艘中国军舰。

7月28日早晨6时，操江船上83人与高升号被救的3名欧洲船员一道，由八重山舰押送到佐世保港。在八重山舰上，高升号英国船长高惠悌(Thomas Ryder Galsworthy)操江舰长王永发与日本军官们对坐吸烟，高惠悌突然向王永发发难，指责中国人极其野蛮、狰狞，“若今日尔之军舰俘获他国人，必残酷相待。反之，日本对于俘虏，如此周到处理，乃文明各国之正当措置云。”

高惠悌此前在高升号上，居然准备听从日军命令，率欧洲船员放弃该船逃离，被船上清军强力制止。在日舰队开炮轰击高升号时，他跳水逃亡，清军纷纷从船上向他射击。日本海军的报告记录了高惠悌对王永发的责难，形容其“语气激烈，旁人闻之，有不堪入目之状”。

操江号被俘官兵是日“午后二点钟上岸，上岸之时极备凌辱”。弥伦斯回忆道：“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



操江号被俘官兵在日本备受侮辱

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8月15日的《字林沪报》说，日本人将操江号被俘官兵的“发辫尽行剪去，下诸狱中，不堪凌虐”。9月26日的《申报》则报道说，被俘官兵被“倭奴看管甚严，不能轻出一步，每日派役提出十余人，逼视自带大帽联行街市以示辱侮中国之意”。

操江随后被日军改作训练用舰，此消息后来传回中国，被舆论大大地嘲笑了一番。1894年8月3日的《字林沪报》指出，操江为江南制造局所造的第二艘船只，“阅时既久，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置勿用，倭人不加详察，遽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则在10月8日说：“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对于日本为宣战而告祭太庙等，《申报》在8月23日刊登《欺及先人》一稿，嘲讽日本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以此祭告先人实则“言词夸诞欺及先人”。《申报》发此稿时，正是叶志超并败平壤却谎报奏捷之时，因此报道继续嘲讽日本道：“乃未及轻旬，即有平壤败绩之信”，日本人的祖宗如果“泉下有知，当深恨子孙之国祚将倾，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为者？”

国人心中的“敝帚”操江号，却在日本人手中得到充分利用，其从日本舰队退役后，长期在神



平壤街头的清军俘虏

户港充任检疫船，一直被使用至1965年后方拆解；阅尽东亚沧桑，成为北洋舰队中“寿命”最长的舰船之一。

指斥操江号被俘官兵为何不自杀殉国的《字林沪报》，属于《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旗下。《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自称其编辑方针是“公正而不中立”，得到英国租界当局的支持与赞助，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和工部局的喉舌。它在全国各大城市派有记者和通讯员，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象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最早为《北华捷报》周刊，由英国商人奚安门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创办，主要刊载中国沿海城市的商情、一周新闻及司法、领事公报。1856年起，增出《航运日报》和《航运与商业日报》副刊。至1864年，《航运与商业日报》扩大业务，改名《字林西报》，独立发行。而《北华捷报》作为《字林西报》所属周刊，继续刊行。《字林西报》曾先后出版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1872）和《字林沪报》（1882—1900）。该报一直到1951年3月31日因报道不实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告后方停刊。

操江号被俘，并没有引起像高升号那样的巨大风波，丹麦政府向日本提出释放弥伦斯的要求。8月5日，弥伦斯被日本政府释放，其余82名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师爷3人及士兵71人，皆关押到1895年8月始遣返回国，其中1人死在日本佐世保监狱中。

史料没有记载这些被国人认为“可耻”俘虏们，回到国内后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但可以想见的是，与在日本所遭受的凌辱相比，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

重庆号：中国“刁民”抗日

中国炮台向英国商船致敬

隆隆的礼炮声划过初冬寂静的早晨，惊得鸥鸟纷纷窜起，大沽炮台上旗号鲜明，守军正得令向缓缓进港的一艘轮船鸣放 21 响礼炮。黄龙旗迎风猎猎，随同它一齐升起在炮台旗杆上的，还有大英帝国的米字旗。

正在怡然接受中国最高军礼的，是一艘高悬英国国旗及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商船重庆号（Chung King）。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英国海军红雀舰舰长伯克罗夫特（Bearcroft）参加了仪式，认为十分精彩，对中国方面的卖力表现大加赞赏。

这是 1894 年 11 月 14 日，中国被迫以最高军礼为形式，向英国国旗道歉，原因是中国的“刁民”为了抗日，而“攻击”了这艘英国船，将船上的日本外交官及其家属绑到岸上，痛加殴打。

英国人和日本人似乎并不相信中国的“刁民”会有如此觉悟，毕竟冲上重庆号的，是身着清军军服的军官。两年之后，到了 1896 年 9 月份，清廷才将重庆号事件肇事者缉拿归案。

为首者果然并非现役军官，而只是一名军官的弟弟，姓贾名长瑞，直隶雄县（今河北）人，年仅 21 岁，尚未成家，其兄贾长和在北塘练军步队左营充当正兵，随同部队增援朝鲜，却登上了那条致命的高升号，在朝鲜海面

被日本军舰击沉而罹难。

哥哥牺牲的消息传来，81岁的祖母和46岁的母亲终日在家哭泣，并总认为贾长和仍在人世，贾长瑞便奉母命到处打听，并到部队营地将其兄所遗鞋帽腰刀等取回。1894年8月1日这天，贾长瑞走到塘沽，听得街上人声鼎沸，说有东洋轮船装了许多东洋人来了，都是奸细。他就随着大家到矿务局码头。天黑下雨，看不清船只，也没见船上挂旗，更不知道是英国船。码头围观众人都在痛斥东洋人把高升号打沉，害了我们许多性命。大家说该拿东洋人报仇，而且抓住奸细送官有赏。贾长瑞本就报仇心切，就把他取回的哥哥的顶帽带上，冒称六品顶戴，挎上腰刀，和大家一拥而上，捆了十几个日本人下来，痛打一顿。正想送官，不料官兵打着大灯笼赶来，呵斥大家说不要胡闹，否则也捉拿惩处，而且拿马棍乱打，大家一轰而散，贾长瑞便也跟着跑了。

清廷得知贾长瑞出现在塘沽附近，立刻命令驻扎大沽的保定练军进行秘密缉拿，将其人抓获押送到天津，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组织审讯。贾长瑞对一切供认不讳，但坚称自己只是报仇心切，非为图财。

盛宣怀随即行文军方查访，贾长瑞之兄贾长和果然是练军步队左营六品军官正兵，死于高升号事件。而且，当日的确塘沽传言轮船上多是日本奸细，因此导致众怒，闯上船去要为同胞报仇。

盛宣怀对贾长瑞充满同情，但考虑到贾长瑞冒充顶戴首先闯上重庆号，情节严重，虽然“深堪惋惜”，但也只好从重处罚，重枷枷号一个月，押赴塘沽码头事发现场示众，并在枷满后永远监禁，“以敦中英睦谊”。

“日本人像猪一般被捆起来了”

1894年8月1日，是个雨天。绵绵的雨，却浇不灭天津百姓心头的怒火。一周前，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近千名中国军人

罹难，而这些军队，原驻在天津附近，与天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升号事件后，中日两国随即宣战。日本公使小村选择在这个雨天下旗离京，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也选择同日离津。但荒川已次却并未按照外交惯例通知中国政府，就携眷从塘沽登上英商中国航运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轮船重庆号，第一批走上撤退回国之路。

雨还在下着，旅客们登船后，重庆号依然停泊在塘沽矿务局的码头。凌晨0：30左右，船员与乘客均在休息，约30～40名中国士兵突然全副武装闯到船上。带队军官宣布奉总督李鸿章之命令逮捕所有日本乘客。随后，清军持枪搜查每一间舱房。他们将日本领事夫人的两名女佣拖出来，用绳子捆住手脚。同时也捆绑了一名叫阿原的日本留学生。据外电报道，清军将捆绑后的人从6英尺高的舷梯上直接抛到码头上，从下甲板他们又抓出8名日本妇女，有的人被扯着头发拖到码头上。

搭乘该船的法国驻华使馆武官裴理博上尉，听到动静后，就守在自己的门前。他发现中国军人正在砸各舱室的门，就亮明身份，阻止中国士兵进入他的舱房搜查。中国军官很配合，告诉他：“噢，我们不想打扰法国人和英国人，我们为日本人而来，我们要杀死他们。”根据这名法国武官的报告，当中国士兵将日本妇女强拖出舱时，日本人拉住西方人请求保护，但士兵用枪托狠砸她们的手臂，再将她们手脚紧紧捆上，绳子都勒进了皮肉，“像猪一样被扔上了栈桥。”

船长休斯报告说，这些日本人被绑着躺在码头上足足2个小时，随后，另一名清军军官来到，检查一番后下令松绑。凌晨4点左右，这些人被中国士兵带到另一个与海关住处相邻的煤棚中。随后，中国士兵开列了一张日本乘客的个人行李单，命令船员将这些行李集中到前舱。

5时左右，日本人被中国士兵押送回船。船长休斯说，所有日本女人的戒指和发夹都被抢走，日本领事夫人丢失了250元，其他也有些日本人及欧洲人有财物损失。

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显然很能理解当时的处境，他在一份报告中说：

“现驻扎大沽的部队是不久前从北塘开来的，他们是高升号上牺牲者的战友，他们发誓要为高升号和操江号的死难者报仇。我无法断定此时的日本人能否安全脱身。……目前的事态仍使人们忧虑。大沽的驻军情绪激动，几近失控。在天津，暴怒的人们指控法国政府帮助日本人，已开始威胁法国人驻地。有必要在英国租界增加巡捕以防止动乱。毫无疑问，急需派遣外国军舰来此。”

意外发现日谍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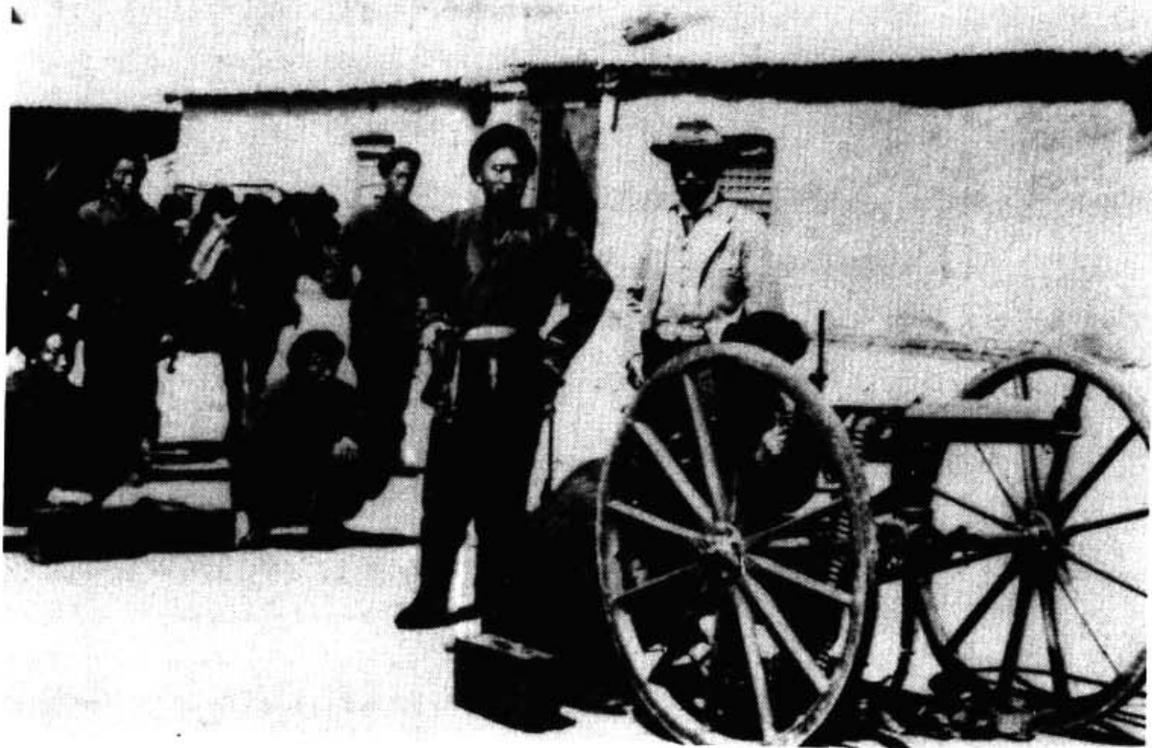
其实，从日后各方资料来看，这次搜查，应当是清军官方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这不仅体现在时机的把握上，不早不晚，恰好在日本外交官撤离的当天，而且，这次搜查居然查到了日本间谍的密信。

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在8月4日的日记中记录，重庆号事件中，“中国兵枪上刺刀，闯入轮船，拘引日本的妇女数名及领事之子至兵营，备加凌虐，捆绑殴打无所不至，且劫去日本人所携带之银钱数百日元之多”。他还透露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内容：“堤大尉致井上少佐之密函亦被抢去。”这封密函，就是化名“堤虎吉”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发给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中国政府根据此信，一举破获涉及高升号事件的石川间谍案等。很难相信，这样一次相当有针对性的行动，是一群“刁民”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所为。

李鸿章生气了：这点小事也麻烦我？

英国人对自己的商船被清军搜查十分恼怒。天亮后，重庆号的船长就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当晚8时，宝士德紧急求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乎他的预料，李鸿章并不把这当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噢，登船的不是军人，他们是一群无赖，



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洋教练在天津观看军事演习

为高升事件所激，听说船上有日本人，便进行了攻击。”他称已经命令手下展开调查。

宝士德自然觉得李鸿章在忽悠他，他坚持认为这些人的确是军人，且有军官带队。宝士德表示，肇事者的身份以后可以慢慢调查，但此事严重侮辱了英国国旗，消息传到英国后，一定会产生恶劣影响，因此最好是中国政府在发布此事件消息时同时发布道歉声明。李鸿章说：“袭击乃无知苦力所为，他们对国旗毫无所知。我已经下令要将所有嫌疑人都予以惩处。”

宝士德认为李鸿章实际上并没接受英国的抗议，便争辩说，那些相信在英国国旗下能得到保护的乘客，被中国人拖下船去，因此中国最好能给予书面道歉，对英国国旗表达一些敬意，这样效果好，而且对总督大人亦毫无损害。

李鸿章不耐烦了，道：“我已经说过我感到抱歉，这还不够吗？我将根据中国法律惩处罪犯，我本人和我的国家并未侮辱英国国旗。登船袭击日本人的是一群为高升号事件所激的无知臣民，他们将受到中国法律的惩处。”

宝士德再三解释，甚至对李鸿章轻视此事表示遗憾，警告说事态可能会比较严重的。李鸿章始终不为所动。宝士德事后回忆说：“在整个会晤期间，我发现与他争论毫无用处。他用时而怀疑、时而生气的目光看着我，像背书似地再三重复同一个句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根据中国法律’那句话。”

最后，李鸿章喃喃地自语：“区区小事，何需劳神！”宝士德认为多谈也无益，便起身告辞。

李鸿章将他送出门时，说：“此事与高升一案不同，高升事件是日本军官侮辱英国国旗，同时有日军统帅在场。此事则仅是一小撮无赖瞒过衙门登船滋事。”其实，这正是李鸿章“不耐烦”的真意：日本军舰公然击沉英国商船，英国也没怎么进行激烈的反击；如今，连身份都未能证实的中国人只不过在英国商船上殴打了日本人而已，英国人起什么劲呀？

宝士德于次日（8月3日）即向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发去报告。

英国公使希望冷处理

欧格讷在接获报告后，立即向伦敦转报，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不必要求补偿，但我建议及早向总理衙门表明此举给中国造成的损害。”

在这场中日战争中，以这位中国通为代表，英国在远东的外交官们，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同情中国。欧格讷本人对英国政府在高升号事件中袒护日本，十分恼怒。在他发给伦敦外交部的电报中，直率地指出，英国就高升号事件向中国索赔最终“将损害英国的利益。高升号的沉没是战争留下的最大创伤，被认为是一次背叛行为。英国迟迟不想限制日本，使自己背上了‘亲日’的重大嫌疑。一旦发现英国又想在中国身上捞取补偿，将会极大地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并造成极坏的影响。由于拒绝支持逼迫日本让步，将会中断友好关系，使接管重组海军的希望化为泡影，并将失去一大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他说：“若要求中国为自己遭受的莫大损害作出赔偿，将会引起强烈的愤懑。我无意从法律的角度判断是非，因孰是孰非无关紧要。问题是索赔会影响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人们普遍相信，日本是肇事者，中国和英国是受害者，英国应（对日本）予以报复”。

在这样的外交思想下，欧格讷希望将重庆号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给本已复杂的中英关系火上浇油。

盛宣怀大义凛然

正当直接当事人英国人都想冷处理时，美国人却在重庆号事件中横插一杠。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在对方国家里保护侨民利益。重庆号事件后，日本人显然向美国人鸣冤叫屈了。8月13日，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向李鸿章提交了一份文件，转达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要求：中国应对日本领事夫人在重庆号事件中的损失进行加倍赔偿。根据他们的报告，日本领事夫人在事件中丢失了250元。

这样的枝节问题，本就是无法考证的，何况李鸿章始终拿高升号的榜样做对比。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于次日（8月14日）受命答复李德，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雄辩的反驳。盛宣怀首先指出，日本渝盟肇衅，该国驻津领事在宣战之后不向中国政府声明即自行离开，不在保护之列，所失物件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雄辩的反驳

中国本不应赔偿。但考虑到重庆号系英国旗号，“匪徒不应冒充官兵擅行登船搜查。是以北洋大臣一闻此事，即饬地方文武访拿为首之人，照例惩办，务将船上搭客所失物件追还。将来获犯，如果原物毁弃无存，亦必追赔原价。”所以，美国要求的将日本领事失去各物，由中国按倍价赔补，“北洋大臣无不可以允准”。

盛宣怀而后话锋一转：“但高升轮船亦系悬挂英旗，日本于未经宣战之先，用炮击沉，伤毙中国千余人，并失去银物等项，按照公法理应分别恤偿。查高升沉没在重庆失物以先，总须日本将高升伤毙人命遗失财物恤偿之后，中国方能将重庆失物一案按照实价赔补。”这是将高升号与重庆号两事件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伤亡如此惨重的高升号尚且没有任何赔偿，重庆号事件相比之下又算什么呢？这封函其实道出了李鸿章面对列强那种势利、伪善嘴脸时的无奈和愤懑。

这封函对于美国人的要求，佯为接受、实为拒绝。史料没有记载美国方面的反应，其实，美国人已经足够对日本人有个交代了，没必要对中国言之在理的东西刨根问底。

中英双方随后达成了一项妥协，即由中国方面象征性地向英国国旗道歉致敬。这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中国以最高军礼向英国商船致敬。

英国出兵中国？

就在中国政府向重庆号以军礼致敬道歉之前4天，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1894年11月10日刊登了一则震撼性的新闻，内容是英国公使欧格讷奉命向中国提交最后通牒，如果7日内中国不就重庆号事件做出适当补偿，英国舰队将进行报复。根据该报的报道，不仅英国索要的赔偿数额远超出最初要求，也不仅大沽炮台要鸣礼炮21响向重庆号道歉，英国方面还要求立即罢免盛宣怀，并派6000名印度士兵

来华保护通商口岸的英国侨民。

这则耸人听闻的忽悠报道，是《字林西报》的又一“杰作”。《字林西报》的报道令欧格讷十分恼怒，吊诡的是，他并不责怪英国编辑人员的疏忽，反而认为这样的“恶意曲解”一定是盛宣怀在背后捣鬼，施“苦肉计”，目的是以“外侮牺牲品的形象赢得仇外者的同情”，以“逃避其长期所犯的经济罪行”。

盛宣怀被人认为用假消息引导舆论，此后还有一次“大手笔”。庚子年义和团作乱，各国在华军队纷纷戒备，据说促成素来持重的慈禧太后一怒而向八国宣战的，就是她收到了一份各国的联合声明，要求她放弃权力。而据说这份子虚乌有的声明，就是主管电报的盛宣怀在李鸿章授意下编造的，在当时局势紧张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以激化多为保守派的朝中掌权者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为李鸿章甲午之后被赶下台报仇，并重回中枢。当然，这一故事仅见于英人“发现”的《景善日记》，严肃的史家对其真实性充满怀疑。

英国人顾全中国面子？

在中国以军礼方式向重庆号道歉致敬后，法国的裴理博上尉却依然不依不饶，要求惩罚他所指控的重庆号肇事者。

高升号遇难后，法国军舰利安门号曾前往救援，而裴理博上尉当时就在利安门号上。作为唯一一位亲身经历了高升号和重庆号事件的人，他指控“重庆号暴行”的现场指挥者，就是高升号上的获救清军军官徐仁和。

中国官方经过调查，否认了裴理博上尉的指控，理由一是徐仁和当晚一晚上都在指挥炮手们进行夜间涨潮时的射击训练，没有“作案时间”；二是裴理博说重庆号事件的指挥官头佩白色顶珠，而徐仁和佩的应是蓝色顶珠；三是当晚有雨，辨认困难，裴理博认错人了。自然，这样的官方辩解，外人自然也无法求证。

宝士德就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他在提交给欧格讷的报告中，认为那

些闯上重庆号的士兵们“肯定是奉命行事，而且很可能是误解了上级部门的命令”。但他欧格纳一样，不希望此事进一步伤害中英关系，他担心英国如果进一步施加压力“只会导致无辜者受到惩罚，使其成为那些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人的替罪羊”。要求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向英国国旗致敬，就是“对中国官员脸面的猛击，他们觉得很丢面子，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那些真正负有责任的人”，这就够了。

欧格纳赞同宝士德的意见，并认为“中国当局已经公开采取了明显的补救措施，此事可到此结束”。

一场本可能掀起外交巨浪的重庆号事件，在高升号事件引发了中日英外交大角力的巨大阴影下，因英国人明智地装了回糊涂，而悄然结束。这艘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的商船，继续航行在津沪航线上，见证着甲午战争的每一幕。而那被判了终身监禁的抗日“刁民”贾长瑞，从此消逝在史海之中，没有他的任何资料。我宁愿相信，在官方把板子高高举起的表面文章做完之后，这位敢向日本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烈军属”，会被官方悄悄释放，只有这样，大清那本就腐败而低效的国际知名的司法体系，才会展现出它在特殊情况下的可爱一面……

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脊梁

曾经，从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到喋喋不休的挑剔书生再到平头百姓，都以为船坚炮利是挽救国家利权、实现伟大复兴的至要。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就是支撑这条巨龙的两条脊梁。在日本人打败了北洋舰队后不久，一直在南方作壁上观的南洋舰队，也遭遇了一次沉重打击。

这一打击不是来自于军事，而是来自于外交。一艘英国商船，公然违反中立，为日本走私军火，在台湾洋面被南洋舰队查获后，不仅蛮横地对抗检查，最终居然又以中国的赔款道歉而结束。这一次，大清那仅剩的一点点尊严，被彻底毁尽，从此不再能挺起脊梁。

这就是国际法历史上又一经典案例巴山号（Pathan）事件。巴山号事件与高升号事件一样，成为牵涉中英日三国海权的重要事件。

南洋舰队截获走私船

1894年9月20日下午3点，福建白犬山左近洋面。一艘没有旗号的神秘商船正向北快速航行，在它的船舷上书写着船名Pathan（巴山号）。忽然，从它的后方高速出现了一艘大清军舰，这就是南洋舰队的主力舰南琛号。

南琛舰是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曾参加过当年4月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大检阅。其与南瑞舰均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军舰设计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德国人更注重军舰的装甲防护，航速只有区区13节，但都是全钢体结构，排水量达到了近两千吨，在装甲防护上相当出色。

南琛舰在中法战争中曾重创法军尼埃利舰队，后在辛亥革命中率先响应，成为民国海军的主力。著名的民国海军将领汤芑铭就曾担任该舰的帮带（副舰长）。该舰直到民国5年（1916年）被拆解，卖得45万元用作永丰、通济等舰的修理费用。

随同南琛舰巡航的，还有一条“斯美号”商用快船，船身长二百五十尺，纯系钢制，航速高达16节，光绪十二年（1876年）由台湾巡抚刘铭传集商股设招商局于新加坡购买，同时还有一艘姊妹船名为“驾时”，两船往来上海、香港，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后台湾航运业衰败，两船便专为官用。

南琛舰是奉台湾巡抚邵友濂之命，前来此一海域设伏，拦截为日本偷运军火的一艘英国商船。一周前，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向李鸿章报告说：“有英国船满载药弹，本日出口赴倭，就近设法截拿。”此事还惊动了光绪皇帝，他发布圣旨：“英船济倭，飭令严密巡查。”

中国军舰要拦截的英国商船，正是这艘巴山号。巴山号注册于莫卧儿轮船公司（印度）名下，船东为古莱特利公司（Messrs, Gellatly, Hankey, Sewell and Co.），租给纽约的巴伯公司（Messrs, Barber and Co.），航运线路从纽约前往亚丁、新加坡、香港、上海及日本的航运线路。

巴山号被发现后，南琛舰以旗语命令其停船，但巴山不停，南琛舰于是放空炮2响，巴山号挂出了英国国旗，依然不停。南琛舰再放2响空炮，该船始停。

南琛舰由三副带队，乘舢板登上了巴山号，并取回货单、船牌（执照），将货单送到随行的斯美号上，由斯美号的外籍船长马理士检查。

马理士发现，巴山号有走私军火的重大嫌疑；货单上有运往日本的手枪、枪弹等，而且，遍查斯美号上所备的上海新闻公告，巴山号的航讯并没有公布，十分神秘。

南琛舰随即先将巴山号带到东沙岛附近抛锚停泊，抛锚后，南琛舰管带袁九皋再命帮带、三副等去巴山号，查验军火。

中国官兵再度登上了巴山号，但巴山号船长及大副等人矢口否认装载了

任何军火。官兵们向英国人出示了货单，英国人却并不回答，而是讨价还价：“如果我们交出这些枪弹，是否就能放了我们？”显然，英国人的态度十分可疑，基本可以肯定，这条船上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帮带宣布对巴山号予以扣留，命令其一同开往台湾，进行调查。

船长拒绝道：“煤不够烧，不能驶往台湾。”

帮带说：“你们船上的煤既然能保证开往上海和日本，这里到台湾只有300多里，怎么到台湾反而不够烧呢？”

船长等无话可说，只好接受去台湾。

洋人把持的海关态度摇摆

次日（9月21日，阴历八月廿二）晨4:40时，三船一同出发，斯美号在前先行，南琛舰押着巴山号在后。下午4点，船到基隆，停于口外，报告邵友濂。

邵友濂得讯后，立即电告淡水海关税务司、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请其命令基隆海关的洋关员前往调查，最好马士本人亦能亲临。当时，大清海关掌握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为首的“洋干部”手中，但这些洋干部依然是大清帝国的雇员，他们给大清帝国建设了第一个现代化、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来自海关的收入，已经成为财政的最主要来源。

马士不光是大清的“公务员”，还是位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及《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等均为西方汉学经典。尤其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马士有颇多建树，如他首先提出侨汇在中国财政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一举解决困扰经济学界多年的晚清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马士是美国人，这在当时为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中比较少见。他从哈佛大学一毕业即考入中国海关，其时年仅19岁。随后担任天津税务司、德

籍英国人德瑾琳的秘书，中法战争期间亲赴台湾交换战俘立下功劳，获颁清廷的“三等第二宝星”勋章，深受李鸿章欣赏。

1892年开始，他以副税务司衔署淡水关税务司，见证并参与了甲午战争在台湾的全过程，并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的抗日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甲午战后，台湾官民抵抗割让，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奉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尽管与唐关系不错，但马士拒绝将大清的黄龙旗换成台湾民主国的虎旗，坚持到办理完交割手续。因此，中国不少研究者责其“媚日”，其实他恰恰是在严格遵守职业操守，履行中国政府办理割让手续的命令。马士前后写给赫德的书信，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清廷官员和在台外国人的最后撤离，还多亏了马士的斡旋。当时，日军已在基隆登陆，淡水成为撤退通道，拥挤在该地区的清军士兵，因不满于欠饷，炮击并封锁航道，将撤退西方人和中国官员的最后一艘英国商船雅打号（Arthur）困住。随船内渡的海关银号人员，将所携带3万两现银交出，清军仍不放行。马士只好出面谈判，确定再加5000元“买路费”。他大胆决策，打破历来由海关银号而非税务司征税的惯例，靠向过往船只征税凑齐了该款。同时，为了确保清军炮台不“违约开炮”，他要求以该笔“买路费”换取所有大炮的撞针，终于掩护雅打号离台。但淡水炮台的大炮却因此而完全失去作用。1907年，在上海担任造册处税务司的马士，接待了来访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H.Taft），两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两年后塔夫脱获选总统，力邀马士出任驻华公使，被其以健康理由婉拒。

马士收到邵友濂电报后，立即命令基隆海关办理此案，并建议邵友濂尽快通知英国领事，以免引起外交纷争。随后，海关进行了现场勘测，发现巴山号是满载之船，除了旧铁5000多担外，另有货物10000多件。发往日本的货才数百件，且因该船计划先到上海再到日本，因此发往日本的货都在舱底，如果要查，必须把上面发往上海的所有货物清卸干净。基隆码头太小，又没有足够的驳船和栈房，因此查验十分困难。该船的确舱深货重，口外风浪又大，搜查难以得手，查了3天了都没能检查完一个舱。

马士建议邵友濂，应命船长写下保证，限两个月内在上海将货单上列明的军火交出，否则就罚银 1000 元。同时，派遣斯美官轮押送，并在巴山号上派驻官兵，一直押送到上海。到沪后把货卸完，再将运往日本的货物逐件检查。马士认为，不必在台湾长久扣留巴山号，以免英国人提出索赔要求。而至于船上的铁路物料，因日本铁路为国有，此不算商家货物，可在船到上海后请律师查核后予以没收。

同日，英国领事也会见了巴山船长，船长要求向中国方面转告：该船到上海已经延误，如不电告其船主，担心保险费会额外增加到 40000 英镑。该领事据此向中国施压，甚至表示担心船长会因情急而自尽。

英国领事发出了“最后通牒”

9 月 26 日，邵友濂接到总理衙门明确指示，彻底查清巴山号走私军火的问题。但这时，傲慢的英国船长居然下令将舱门封闭，拒绝检查。这在对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在面对一国的武装力量强制检查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亦可见堂堂大清帝国海军的尊严。

邵友濂强硬应对，要求英国领事将船长、大副等人带离该船，巴山号在清军押送下，开入港口。马士对此表示同意：“该船既有违禁之物，即应按照西方惯例派员审断，领事和税司一同观审。”但英国驻台湾领事坚决反对，不予配合，认为既然英国公使已经下令取保赴沪，则中国政府就不该继续在台湾进行检查。

9 月 28 日，总税务司赫德致电台湾，明确表示如查有违禁物，即应扣押船只，并要求将所有证词全部送交北京。同为英国人的赫德，似乎对自己的同胞并没有袒护之意。其实，英国政府也正在为商人们惹出这一麻烦而头疼不已，此前一天，英国公使欧格讷向伦敦报告：“如确有违禁品，应允许其被查收。”他要求英国领事转告台湾地方政府，如果起获军火，则由中国没收，

其余货物也必须取保,然后驶往上海。而此时,江海关却来份莫名其妙的电报:“该船无错,应速放行。”真不知这远在上海的江海关又是如何确定该船无错呢?

次日,总税务司再次致电台湾,此次指示更为强硬:只要查出有军火,无论多寡,应照中立条款进行惩罚,即中国没收船货,犯案的西方人则交由英国领事惩处。在对待人员处分问题上,英国外交部门表示了不同意见,要求取保后先将船开往上海。

双方再度陷入僵局。最后,英国人还是说服了北京。总税务司9月30日电令,先将“能看见的军火”扣留,然后派人押送船只到上海再查,并称总理衙门已经同意。但这次,总税务司的命令遭到了邵友濂的反对,他说自己接到总理衙门的命令是“必须将能起之军火起出”,因此必须先行彻底搜查。

10月2日,邵友濂再度开舱搜查,英国领事却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次日中午12点释放巴山号,并将所有执照、货单、货物一并发还,“免碍大局”,甚至发出了“不能再作合好之国办理”的威胁。邵友濂赶紧报告总理衙门,接到明确指示“枪弹扣留、船只释放”,已经同意欧格讷提出的船只开往上海的请求。

邵友濂认为,巴山号运送违禁品是铁证,“英使设或偏听一面之词,前来饶舌,尚祈鼎力与之折辩。是为至禱!”请总理衙门要顶住压力。但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下,邵友濂只能遵命,停止搜查,将已经搜出的手枪两箱、子弹一箱扣留,其余起出之货,予以发还。马士甚至表示不必派人押送上海。

10月5日,巴山号在海关两名杆子手(Tidewaiter,检查员)押送下离开台湾。

上海贪官也爱国

上海方面,江南苏松太道刘麟祥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行文英国总领

事韩能，要求其派员一同查验。他还担心税司洋员不可靠，请浙江聂台派人协助。

刘麟祥此人，亦是李鸿章亲信，曾长期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是个著名的贪官。担任总办期间直接控制采购权，“遂成大弊二端，一则局中需要最多之物料，率由总办先以廉价购入，而令别人出面以重价售诸局中；一则凡欲售物于局中者，必先由其仆隶或司员引进，乃得与总办会晤，皆先议私费，而后及正价，凡仆隶司员皆有所沾润，而皆取偿于物价之中”。但在巴山号事件中，贪官刘麟祥却能坚守国家利权。

10月7日晚，巴山号抵达上海，因吃水过深，暂泊吴淞口，以驳船装卸，过驳到招商局虹口码头。海关为“一昭慎重”，命令过驳时将其所有舱柜加贴封条，送达码头后统一开验。

10月9日，韩能照会刘麟祥，转达巴山号代理公司天祥行意见，要求中国赔偿非法扣船造成的损失，而领事馆亦将“力助”。刘麟祥在答复中断然予以拒绝，“本道不能认巴山轮船为中国违例扣留，中国亦不能担任该船东及船货因扣留查验以致现在或将来已受或将受亏损等情”。

10月10日上午7点，海关与苏松太道等官员到达现场，监督查验。巴山号上舱运送到上海的货清卸完毕，发往日本的货物已经露了出来，但此时，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却另生枝节。

贺璧理于1867年就进入中国海关，任职达40年之久，是晚清有名的“业余外交家”之一，后来曾协助美国在对华战略上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辛丑条约》谈判中也竭力斡旋削减中国的赔款。

贺璧理宣称，发往日本的货物只要查验在美国装船时填写的货单就可以了，因为该船在7月28日离开纽约时，中日尚未宣战，即使有军火，货单上也不会隐瞒。只查验货单，就可以加快进度，以免耽误时间长了导致索赔数量增加。其实，既然如此，从台湾到上海又何必兴师动众地要查验货物呢，货单早在南琛舰截停之时就已验看，正是因为有可疑之处才开始搜查。而且，尚未宣战并不意味着不会填写假货单，对日本人来说早已明白中日必有一战，

为慎重起见亦完全可能提前准备。

刘麟祥表示必须细细盘查。贺璧理辩解道：总税务司也下令细查，但并没有说是否“须将每包每件逐一开看”，所以要再请示。他还推断道：如果船上真有军火，那必然会直接运往日本，岂能先来中国，不合常理。随后，他给刘麟祥出了个难题：如果地方官坚持开验，必须提交正式的文件。

皮球又被踢回了北京，结果，贺璧理的建议被总税务司采纳。赫德下令：只需英国领事馆出具保函，说明巴山号实无日本军火，就可以停验放行。但令赫德也想不到的是，英国领事馆连保函都不愿意出具，韩能答复税务司说：中国扣押该船本在情理之外，是继续扣押还是立即放行，和领事馆毫无关系，领事馆不应出具什么文书，但中国政府应就该船被扣的损失进行赔偿。

索赔的要求提出来后，英国人终于将这滩水搅得更浑了。贺璧理对领事馆的要求不予答复，表示说此事归上海地方官处理。英国总领事馆于是直接投诉到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再把球踢给总税务司，请总税务司拿出处理意见。而就在这扯皮之际，10月26日，巴山号在没有进行必要搜查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开往日本。可以肯定，这就是江海关的“放水”行为。

大英帝国敲诈勒索

船离开后，英国人就更无所顾忌了。11月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正式照会苏松太道刘麟祥，要求中国对巴山号“违例扣留”之事进行赔偿，并提出两个办法备选：一是给银3万两了事；二是将各项受损提请仲裁。

刘麟祥回函反问这是根据什么公法。英国领事馆辩解道：巴山号无端被扣，在基隆港又致搁浅，而且被扣14天内货物被搜查翻乱，损失惨重，到上海后被迫进坞修理。所查出仅3小箱枪弹，“所值无多，何以指为军火？”至于刘麟祥所问法律依据，英国反问既然是“中国首先干犯”，则中国应当首先提供法律依据。双方对“举证”责任大起纠纷，刘麟祥再度回函，坚持

谁主张谁举证，“应由索偿人指证”“中国究违何例”。

12月17日，韩能给刘麟祥发出了一个雷人的照会，说那些被查获的手枪“专作玩具”，数量这么少，不能算是“军火”。同时，他还“教导”中国说：即使要扣押巴山号，也应该将其带往下一个目的地上海而非基隆。刘麟祥回信很干脆，认为这些都是“空言无本，牵引失当”，“所有一切责中国不能认受”。

总理衙门在发给欧格讷的照会中，全面批驳了英国的要求：一、根据西方报纸报道，巴山号早已由英国出售给日本，并且支付了全价；二、中立船只应当提供没有任何济敌行为的证据；三、该船长居然拒绝提供货单、航海日记等；四、在货单之外查出了没有申报的炮弹；五、该船长见搜出炮弹后居然私下封闭舱门，不准查验。

总理衙门质问，这些情况，根据国际公法，中国究竟是否可以强行搜查？！而国际公法规定，只要查出有违禁品，可以将违禁品连同船一起没收。中国之所以没有追查到底，考虑的就是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毕竟该船还没有更换旗号，悬挂着大英帝国的旗帜，总理衙门希望英国“明达万国事理，必能持平不偏，不使中国于让权后更受亏损也”。理直而词卑，无奈至极。

皇家法院讲“法理”

1895年元旦这天，总理衙门将邵友濂8月份关于巴山号事件的所有来电，转给英国公使馆翻译朱迹典，同时请赫德出面调停。

赫德告诉欧格讷，此事毕竟是巴山号有可疑情况，而且中国方面事后也没有彻底搜查便予释放，希望就此了结。但欧格讷却倒打一耙，认为应当按照国际公法执行，中国对可疑船只当然可以盘查，但巴山号上只有“手枪两箱，按章不得作为军火”，其被释放之故，在于查无军火，而不是中国的宽容，所以必须赔偿。

英国政府向皇家法院提出了咨询，皇家法官答复说：虽然巴山号携带了

违禁品，但因为“该船系被带往一不合理地偏离该船航线的港口，而且既没有起诉也没有打算到任何捕获法庭起诉便被扣留，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所以，“英国政府有理由支持船主一方提出一合理的赔偿要求”。

对于总理衙门照会中的5条理由，英国公使馆逐条反驳道：一、以报纸所称巴山号已经售予日本为扣押理由，是不充分的，何况报纸的消息来源又是什么呢？二、关于中立船只应当提供没有任何济敌行为的证据，这是错误的，而应当是交战国发现中立船只具有济敌行为的证据后，才能扣押缉拿；三、货单、航海日记等在海上被拦截时就已经提供了；四、在货单之外查出了没有申报的炮弹，其实这些炮弹已经在货单上了，而且其价值很小；五、该船长见搜出炮弹后居然私下封闭舱门，不准查验，这是因为该船被扣的十多天里，兵丁很多，任意搜查，船长无奈才封闭舱门。

根据英国外交部指令，3月9日，英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了5000英镑的索赔要求。

台湾巡抚痛彻批驳

收到英国的正式索赔要求后，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对此前的交涉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

他认为，巴山号在台湾时，英国公使就请求将所查获枪弹扣留后取保前往上海，这就证明了稽查巴山号是完全合理的。中立国船只装载违禁品，无论多寡，交战国都有搜查的权力。唐景崧激愤地质问：“若谓仅弹枪三箱，所值无多，何以指为军火？试问枪与弹不算军火，何物谓之军火？既可少载，岂不可以多载？当日南琛在洋面既见巴山军火，确凿有据，焉能不带至基隆听候查验？该船既无违禁之件，何以先不进口？何以一经查至下舱，即封闭不服查验？所称延误，乃其自取。至先后起验之货，不及一舱，何至受损？且受损者究系何物？当未放行之先，何以不指明请验？兹于放行之后，凭空

称物受损，何足为凭？又该船进基隆口时众目所睹，绝无搁浅之事，该船船主（指船长）亦无搁浅之说，其因何入坞修理，与中国无涉。总之，此案考之公法，中国既有应查之权，即无违例之处，更无认偿之理也。”

唐景崧此人，史评并非很好，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还被台民们推举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却在关键时刻抛却这个“民主国”跑回了大陆。但其在巴山号事件中，如“上海贪官”刘麟祥一样，的确为国家利权竭力相争，可见，历史人物和历史一样，都是复杂多面的，不可一概而论。



台湾巡抚唐景崧

3月13日，总理衙门回复英国公使，指出英国方面没有就去年12月8日中国政府的照会给予任何答复，建议还是由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与上海道就近商谈“和平议结”巴山事件。

刘麟祥在3月22日向总理衙门报告说：“历来中外交涉，领事本以偏袒为能事，以期见好于商人。故遇事必多方辩难，迨知理屈，又以护前不肯自休。再与坚持，即上渎公使，以致每有寻常之事，亦复重烦钧署。值此中国多事之际，不免更起要求。”他对总理衙门的两次照会表示支持，并表示既然交由自己与英国领事馆谈判，会更认真地研究国际公法，“设法因应，从容理论”。

刘麟祥质问韩能：为何索赔数额由3万两增加为5000英镑（约5万两），韩能说因为中国方面没有答应3万两要求，所以已经作废，而且这5000英镑还只是船东损失，不包括货主的损失在内。刘麟祥愤怒地斥责其“得步进步，情见乎词”。中国政府所聘用的英国律师，经再三分析，也认为错在巴山号，

断无赔偿之理，于是，刘麟祥一边继续援引公法与英国领事周旋，一边电请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璠与英国外交部协商。

刘麟祥的强硬，令欧格纳十分不满。他于4月27日照会总理衙门，以为总理衙门3月13日的照会乃是“知会”刘麟祥办理赔偿，而不是“授权”给他继续辩驳，刘麟祥“不承认中国有赔偿之责”，因此请总理衙门命令其“迅速与总领事议结，切勿再事耽延”。

总理衙门“一了百了”

8月1日，总理衙门再度向赫德求援。此时，英国方面的索赔额又“涨价”了，高达6500英镑。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璠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商定，4000英镑则可结案。英国司法部门还提出，这是意外事件，货商不能向中国索赔，总算也对中国让了一步。总理衙门表示，希望“一了百了”，请赫德帮助参谋。赫德提醒说，如果船东能索赔，货商也一定能同样索赔，而且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已经为美商提出了货物的索赔要求。

总理衙门决意尽快了结此事，遂电告南洋大臣张之洞，将4000英镑的赔偿款通过汇丰银行汇给龚照璠，8月10日龚照璠即请该轮船公司收领。但随后，美国、德国均就本国货商损失向中国提出索赔要求，并为达目的实行了多方威胁……

盖尔人号：美国军火专家日本落网

两名美国“军火专家”，号称不用枪炮，就能从几英里外击沉舰船，这样的故事，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894年的秋天，被日本军事攻势头弄得焦头烂额的大清政府，不仅相信了，而且由驻美公使馆聘用了这两名“专家”，由外交官亲自陪同，秘密护送来中国。

这两名“专家”，一位名叫乔治·卡美伦，原为英国海军上尉、水雷制造者，现已加入美国籍；另一位名叫约翰·维尔德，据说在电力运用方面有一种特殊发明，可用于军事用途。

日本人的情报十分精确。10月25日，也就是中国驻美公使馆派人秘密护送两位美国专家登上英国邮轮盖尔人号（Gaelic）由旧金山启航后9天，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致电东京，通报了相关情报。虽然栗野认为这两位美国“专家”无非是趁火打劫的骗子而已，但他还是要求东京在盖尔人号经停日本港口时，搜查并逮捕这两名美国人。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日本外交官们的特意安排，此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墨西哥总领事岛村久，亦搭乘同一艘船，岛村在途中也向日本外务省作了情报汇报。

日本政府得到情报后，进行了分析，首先肯定了这两名美国人只是骗子，并不是真正的军火专家，不可能对日本构成真正的威胁，中国政府居然会异想天开地雇用这种投机骗子，“实在令人可怜又复可笑”。但毕竟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本自然不能放任这种“明目张胆的敌对行为”，日本政府决定逮捕这三人。对于那名担任交通员身份的中国外交官，日本人认为逮捕他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他是敌国人员，并且正在从事敌对活动。但对那两位美国人，

及那艘英国邮船，就相对比较棘手。英国和美国在日本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如果采用普通行政方式捕人或者扣船，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法律和外交纠纷。经过仔细研究国际法，日本政府决心采用军事处分办法进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电正在广岛的总理伊藤博文：“大本营认为两名美国战时违禁人，实际上是类似变戏法的技术人员，即使放他们进入敌国，实际上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如有加以拘捕必要，不如以采取军事处分为宜”。

盖尔人号隶属于英国欧亚轮船公司，在旧金山和香港之间经营客货运输，途中经停日本港口。该船于10月16日从旧金山出发后，11月2日到达横滨，计划停泊数日。

11月4日，停留在横滨港口的盖尔人号，突然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舰包围，其左舷由一艘满载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的运输舰监视，后方则是两艘鱼雷艇。次日凌晨6:30，一大队日本海军士兵、警察、海关官员及翻译，在海军中佐竹井率领下，登上盖尔人号，声称搜查战时违禁品，并要求底舱全部卸货检查。

盖尔人号船长皮尔尼（Pearne）提出抗议，他声称船上没有任何违禁品，而且根据条约规定，类似的搜查应有英国领事馆人员及轮船公司派驻该港口的代理人陪同。但在日本军警的武力胁迫下，盖尔人号被迫接受搜查。日本人将船翻了个遍，却一无所获。

当日下午，日本海军通知盖尔人号可以起锚续航，但威胁说不许将此事写入航海日志，否则有可能再次进行类似搜查。

原来，就在此前的一天（11月3日），警惕心很强的中国外交官，已经领着两位美国“专家”，悄悄地转乘另一艘法国邮船西德尼号（Sydney）离开横滨了。日本大本营是在11月4日凌晨下令内务大臣野村对盖尔人号采取抓捕行动的，时间相差不到一天，目标就从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溜走了。

日本人在盖尔人号上扑了个空，立即赶到西德尼号的下一站神户采取行动，依然采取军事检查的方式。停泊在神户港的军舰筑波舰接到命令，立即扣押了刚进入该港的西德尼号，经过一番搜查，两名美国人连同中国外交官

均被逮捕，并且还抄获了中国政府与美国“专家”之间的协议，“铁证如山”。三人被押解上岸予以拘禁。

西德尼号船长被这番如临大敌的军事检查震惊了，面对日本人的讯问，船长声称毫不知情，以为这三人只是普通乘客而已，所以在横滨同意了他们上船。日本军方也不多加纠缠，做完笔录后，即将西德尼号放行。

为了逮捕这两名美国骗子，日本军方已经连续对英国和法国船只采取了严厉的行动，此时，立即对两名美国人进行了审讯。毕竟这两位并非真正的军火专家，几番过场后，日本人要求美国人写下保证书，宣誓保证“在中日两国恢复和平以前，决不到中国旅行，并且今后决不和中国政府订立任何合同”。11月11日，日本人将他们释放。而那位暴露的中国外交官，则被送往广岛战俘营关押。

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部门立即采取了行动。11月8日，驻东京的英国公使楚恩迟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要求日本政府说明武装搜查盖尔人号的理由，并指出：盖尔人号的目的地是英国控制下的中立港口香港，日本政府无权对此船进行搜查，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粗暴行为。

在英国的压力下，日本将竹井中佐的报告提交给了英国驻横滨领事特鲁普 (Troup)，特鲁普将竹井中佐的报告和皮尔尼船长的报告详加对照，发现在搜查细节的陈述上，双方有相当大的出入。特鲁普认为，对友好国家船只进行武装搜查，而且该航运公司在港口内就驻有代理人，这样的情况与在公海上行使搜查权是完全不同的，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日本外务省与海军当局商议之后，向英国公使提出下述复照：“盖尔人号从旧金山载一中国人及同行之二外国人驶入横滨，此三人有以日本为敌对目的而前往中国的嫌疑，该船又有载运属于他们所有的武器弹药等嫌疑，故日本海军对于该船加以检查；据来照声称，因盖尔人号从横滨启航后，向中立国港口航行，认为日本政府无权检查，此为帝国政府所不能接受。况该船所装货物，在上海卸载的也不少，故不能以该船目的地为中立地香港一事，影响帝国政府作为交战国所应享有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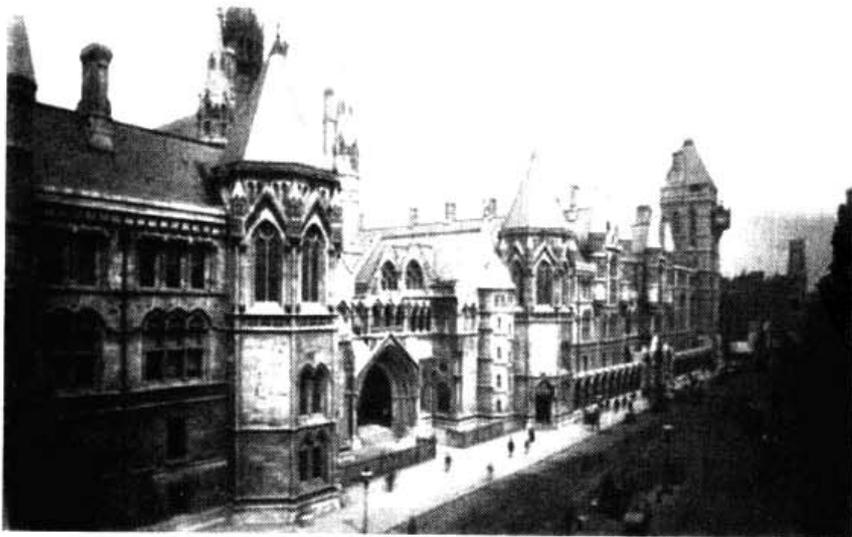
针对特鲁普发现的竹井中佐和皮尔尼船长在事实陈述方面的出入，陆奥宗光一方面表示将转给海军部处理，另一方面也表示相信：“任何交战国一方的任何一名海军军官，都可以奉命进行这种交战国一方在敌对状态下被迫采取的搜查。”

英国外交部循例将事件提交给了皇家法院，咨询法律建议，同时，还向大法官提交了驻上海皇家律师兼大英帝国对日法庭代理法官务谨顺（William Willkinson）的10条法律意见，务谨顺曾长期担任驻远东的外交官，对中日朝三国政治十分了解。务谨顺认为：根据条约，英国船只享有在日本水域不接受日本当局检查或搜查的豁免权，其不应因战争状态而取消；盖尔人号是从一个中立港到另一个中立港，所以即使此三人真是效力中国军方，日本也无权扣留该船或从船上抓人。他同时强调，这一事件的关键难点是：英国人是否承认日本人在其领海享有比公海更多的权利，是否承认日本可以享有欧洲国家在交战时的各项权利。

外交部向皇家法院强调，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最终允许日本人在日本水域可以搜查英国船只，则“很难不给中国人以同样的待遇，不过这当然要有附加条件，以便通过特殊誓约保证，决不可对这些受到怀疑的交战者

有任何违背文明国家所公认的国际法惯例或人道主义惯例之举”。

皇家法院并没有认同外交部门和务谨顺的意见，大法官在回函中认为：日本当局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尽



坐落于伦敦河滨马路的英国皇家法院，主要负责审理重大民商案件。

管其炫耀武力可能超出当时的实际必要；英国的条约权利不能阻止日本人在战时为查明其是否违反中立义务而登上英国船只。中立国船只在两个中立港之间开行，但中途停靠日本港口，日本就有权检查和扣押船上涉嫌违反中立的人和货物。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日本当局采取的行动提出抗议。”对于外交部函中的其他问题，皇家法院没有任何回答。

得不到皇家法院的支持，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对此事的任何抗议，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再度轻易脱身。

在与英国为此事大打笔墨战的同时，日本又和法国就此发生了纠纷。

法国人比英国人还早地提出了抗议。11月5日，法国驻东京公使阿尔曼到外务省要求和陆奥宗光会面，当时陆奥宗光正好往广岛旅行，因而只好与日本外务次官林董会见。

林董事后回忆说，阿尔曼当时满面怒容，与他握手时，说此次握手或许是最后一次了。阿尔曼对日本军队搜查西德尼号大加责难，要求日本政府做出合理的解释。林董推脱说：“这一事件是军方按照军队程序处理的，详细情况尚未得知，但现在是在战时，日本为调查违禁情况而搜查中立国船只，实在不得已，而且也是交战国的权利。”阿尔曼得不到圆满答复，只好表示，将立即把此事件报告给巴黎。

为了争取主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立即电令驻法公使曾祢荒助，要求其择机预先照会法国政府，说明：“日本政府所拘留的人员，是在军事上具有敌



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个交战国与多个中立国发生的多起国际纠纷，其结果凡是涉及中国的，不管有理无理，中国最后都是道歉、赔偿了事，而涉及日本的，则多是不了了之。作为亲历者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日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正是西方人愿意亲近胜利者的“势利”表现。

人身份的人，日本政府为自卫起见，行使交战国的权利，是不得已的。第一，中国所雇用的美国人的技术，系军事上的特别技术；第二，日本海军拘捕上述三人，其所乘船只是从一个交战国的海港（日本神户）向另一个交战国海港（中国上海）航行的途中；第三，拘捕上述三人是在交战国的港内执行的”，因此，“无疑的日本政府的措施是符合国际公法的”。

法国政府在征求了法律专家的意见后，“认为日本政府此次的处置是正当的”。这样，西德尼号所属的法国邮船公司此前通过法国领事提出的索赔要求，也就取消了。

两位美国公民被逮捕，美国政府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解释。日本站在国际法角度，对美国做了细致的解释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向日本驻美栗野公使表示：“日本政府的处置宽大公正，美国毫无异议。”

一场涉及英、法、美的国际纠纷，被日本化解了。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个交战国与多个中立国发生了类似事件，其结果凡是涉及中国的，不管有理无理，中国最后都是道歉、赔偿了事，而涉及日本的，则多是不了了之。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正是西方人愿意亲近胜利者的“势利”表现……



第三部分

帝国宿命

中日战争背后的博弈

小日本战胜了大中华，这不仅令中国人大为震撼，也令全世界大跌眼镜。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反省，研究与学习日本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是，作为战败者，我们却始终局限在自言自语的情境中，乃至沉溺于自怨自艾的情结中，很少能冷静地从对方的史料、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日本战胜中国的理由。

甲午战争中，无论是政治、军事、外交还是舆论宣传，日本都做了精心的准备，都有着值得当时乃至今日中国人反省、借鉴之处。

遗憾的是，随着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越积越多，在中国人的涉日史观中，情绪与感性占据上风，百余年前“以日为师”的风尚，早已不复存在，“师倭长技以制倭”更是乏人问津，而我们的“厌日”、“仇日”及“反日”情绪，却在对日本的日益无知中，盲目地滋生……

RIPP.
-1895-

舆论动员：大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的“中



甲午战争时日军将自己打扮成吊民水火的解放者。图为1894年日本发行的《风俗画报》，描绘日军“仁义之师”的严整军仪，宣传日军从废墟中救出中国孩子。

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铜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

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至二战结束的一甲子间，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

外宣工作：“日本料理”西式营销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十分注重对外宣传，武士刀为核心的“日本料理”被成功地包装上了西式的“文明”、“进步”外衣，向全球营销。

战争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本随即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指责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情况“概不负责”。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作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Tokyo Times)的美国编辑豪斯(Edward Howard House)为其捉刀。58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她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关，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

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s）。美国媒体开始夸耀是自己将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坚称日本接受和复制的正是美国的体制和理念，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Eastern Yankee），尽管日本实际上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更大影响。

当时德国社民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主席贝蓓尔（August Bebel）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 Howland）最近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并认为这一观感至今还影响到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塑造中，除了运用“文明”、“进步”等普世价值观自我包装和拔高外，在技巧上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主动接纳、积极利用的姿态，身段相当柔软，手腕相当娴熟。

起初，日本官方尤其军方并没有适应新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当西方媒体纷纷申请随军采访时，日本军方秉承传统习惯，断然予以拒绝。同时，日本当局试图加强新闻控制，甚至对美国海军官兵经由日本发回美国本土的所有信件，实行检查乃至涂改，这令美国人相当不满。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894年8月），日本一线外交官换人，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Kurino Shinchiro）出任驻美公使，他推动日本“外宣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效率大增。

在栗野慎一郎及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前任日本外相）等的推动下，西方记者立即得到了随军采访的许可。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从日本出发的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像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

为了争取西方媒体，栗野慎一郎还亲自撰稿，并组织日本外交人员以及学者，积极向美国报刊投稿。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的日本外交使团，成为新闻策划中心。青木周藏也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大量的媒体公关。

日本的宣传攻势，首重为其国家政策辩护。他们向欧美读者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给欧美民众造成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机乃至战争的根源。日本学者向美国人解释说，日本正在努力唤醒千百万昏睡的中国人的灵魂。

其次，日本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日本影响下，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清军调动时，甚至想当然地形容“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中国的军力被大大夸大，美国《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由此，日本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在这样的形象反差下，当日本在军事上获得胜利时，西方人的惊诧和敬佩便更为强烈。

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秘书塞西尔（Cecil Spring-Rice）认为栗野慎一郎的确十分精通“美国式的诡计”，娴熟地利用美国媒体。在日本的推动下，



浮士绘：日军重视对外宣传，图为日军在牛庄为卫生兵救死扶伤摄影。

加上甲午战争本身涉及到远东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吸引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这是第一次来自东方的消息经常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各报刊从中日双方的民族特性、历史演变及军事能力，进行了全面报道，中国“副皇”李鸿章和日本将军们的名字和漫画形象，在西方一时家喻户晓。

日本人紧紧抓住西方社会的特点，十分重视对欧美民众而不仅仅是官方的公关。1900年，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一百六十一封德国民众的贺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成为“平民公关”的成功范例。

中日两国在欧美的侨民，也自然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对象。尤其侨民人数众多的美国，报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两国侨民成为国家形象的第一代言人。

当中国政府对海外侨民的力量不闻不问时，日本驻外使馆对当地日侨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美国各主要城市的日侨组织了爱国联合会，传阅战争公报，并为战争募捐。年轻学生没有经济能力，就组织起来进行军训，“用美国步枪武装自己”，随时准备回国参战。这些自信的日本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感，“急切地想与见到的每一个美国人探讨东亚政治”，他们的“爱国激情”赢得了



日本告诉中国：“来吧，让他们看看我们也和那些发达的基督徒一样。”刊于1894年8月美国《芝加哥导报》

美国民众和媒体的赞叹。在美国的部分城市，美国本地人甚至与日本侨民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商人和中国货。

海外华人则对祖国的战争表现了相当的冷漠。《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感慨道，在美华人照常营营役役，每天拜佛图发财，并没有人关心遥远祖国的战争。《亚特兰大宪政报》曾采访了一个名叫山姆·辛(Sam Sing)的华人，当被问到这场战争对海外华人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影响呀，我们一样忙于洗衣赚钱，不会去参战。中国皇帝要我们去参战，我们才不去呢。”

两国侨民形成的鲜明对比，刺激了美国媒体，他们普遍将中国人视作讨厌的“东方黑鬼和犹太人”。美国学者甚至修正了当时最时髦的人种学，这种学说原来宣称中日都是低劣的蒙古人种(Mongol Race)，日本只是这一劣等人种中最优秀的成分而已，新理论则认为日本的全面西化已经令他们进化成了东方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日本的历史、文化等，也开始在西方成为普通人关注的话题。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遭遇了两次公关危机。

第一次是在战争前夕，日本军舰在朝鲜海面打沉了运送清军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导致千名中国军人和欧洲船员死亡。当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高升号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高升号事件引发西方社会哗然，死伤惨重的英国更是群情激奋，军方要求对日本采取军事报复。德国在伦敦的观察员注意到，“此事件给英国报纸提供了大量责难日本的材料。该国报纸不断建议政府，要求日本对向英国国旗施加的横暴行为，给以赔偿”。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则紧急致电日本大本营，报告说伦敦的“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我国之说”，这对日本精心营造的国家形象是重大打击。

被海军的鲁莽行动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实施了一连串的紧急公关行动。在舆论对己相当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是没有回避，立即向英国表示，如确系日舰违反公法，则日本政府将给予赔偿，先将英国官方稳住，避免事态恶化；二是全面收集情况，包括各种不利消息都在第一时间传回大本营，以及时掌握真实动态，没有出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三是迅速进行官方调查，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剪裁，形成了对自己极为有利的调查报告；四是舍得投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下工夫，试图引导和改变英国舆论。日本的外交文件真实地记录了青木周藏要求追加“特别经费”用于“友好媒体”公关的请示。英国的多名国际法学界泰斗，先后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防守反击策略十分有效。9月份大东沟海战后，日本就明显感觉到了“英国人民在牙山战役前对我国所怀的感情，现在已是如何的大为改观”。《泰晤士报》说：“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者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个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彼此利害大体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丝毫怀有嫉妒之意。”《帕尔美尔报》说：“往日英国教导日本，现在应该是日本教导英国的时候了。”对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感慨道：“见到炮火相接，胜败之局已定，骤然褒扬战胜者，贬责战败者，实在是人情的弱点。”

日本人遭遇的第二次公关危机，是旅顺大屠杀带来的。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们，尤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克里曼（James Creelman）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震撼世界，一时，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

面对西方舆论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开始全面公关。他们首先将这些屠



1895年旅顺大屠杀现场照片，由英国记者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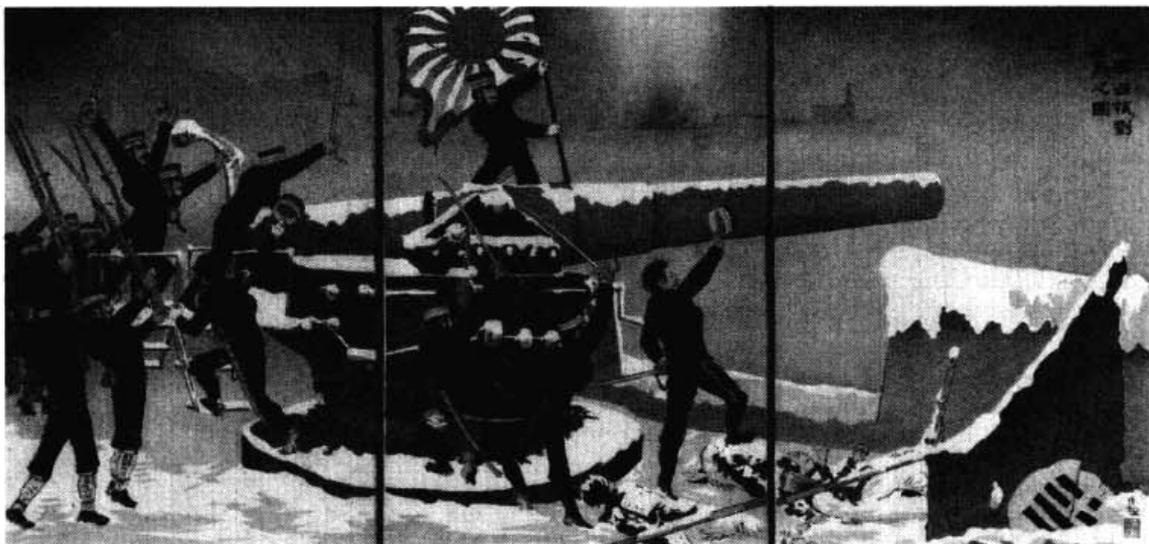
杀行为解释成是对中国军队的残忍行为的正常反应。西方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残忍地杀害并遭到肢解。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Frank G. Carpenter）为日本辩护道：“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本军有区别吗？”美军上校格里高里（E. F. Gregory）也在报端撰文，认为“无论如何，战争毕竟是战争”，在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以及俄土战争中，都有过同样血腥的事件，怎么就非揪住日本人不放呢？日本的辩护者们认为，旅顺大屠杀只是一次过激了的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那些“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大屠杀后的旅顺，日军在挨户搜查（日本油画）。

西方媒体普遍对旅顺大屠杀所持的宽容，正是得益于日本对媒体的开放态度。假做真时真亦假，日本充满自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令其比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容易实行媒体公关，这或许可算是日本从开放中尝到的一个甜头。

但克里曼对旅顺大屠杀所进行的长篇揭露，影响极大，日本人愤怒指控他的报道夸大其辞，担心其会影响美国及欧洲国家政府的态度，但并没有记录表明日军对他随后的采访采取了任何限制。美国政府特别要求驻日本公使谭恩（Edwin Dun）对克里曼的报道进行核实，调查范围遍及目击惨案的在旅顺的西方人和随军的西方军事观察员，虽然这些人都证明日军暴行属实，但



浮士绘：日军占领威海卫刘公岛

美国政府并不赞同克里曼报道的“新闻导向”，其调查结论依然认为报道过于极端。

美国政府的态度激励了日本当局，他们开始也更积极的形象重塑。在经过血战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日本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式的宣传。他们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的灵柩离开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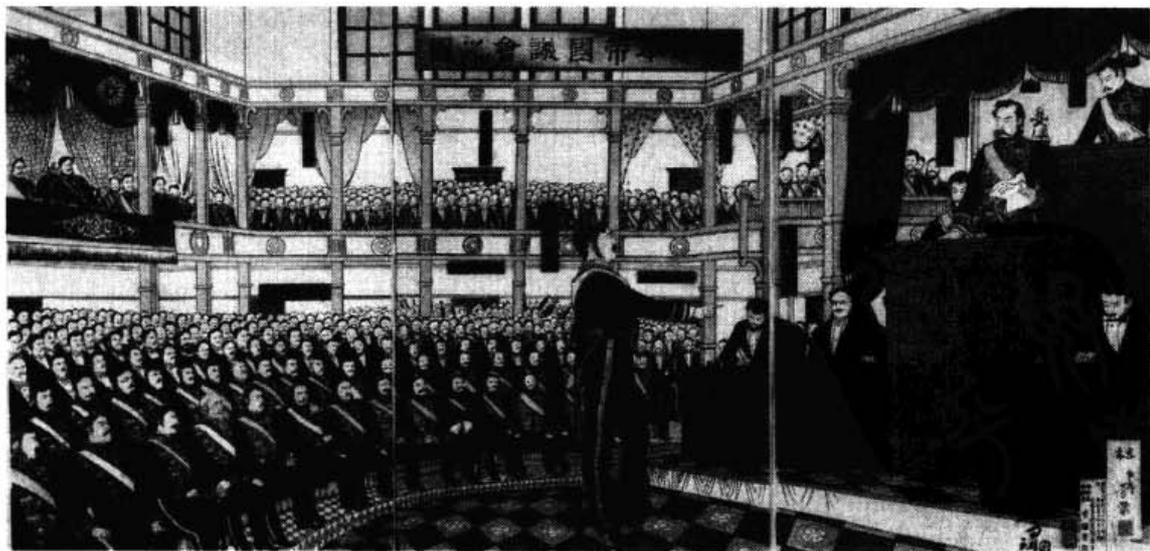
所有这些，都在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并通过公开的报道和秘密的情报渠道向全世界传播，大大扭转了旅顺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形象。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 (Holland) 就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这支“文明之师”中的很多成员正是参与了旅顺大屠杀的同一批人。

第四权力：媒体也是战斗力

日本人对西方媒体规则的圆熟运用，根基于其国内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并独立的媒体机制。明治维新后，西方的媒体观念和运作方式被引进日本，媒体获得了相对独立、不被政府（此处指狭义的行政机关）随意干涉的地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The Fourth Estate）。

甲午战争后不久（1899年），松本君平出版了其影响日本和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之作《欧美新闻事业》，鲜明地提出：在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这三大构成国家之种族外，新闻记者是第四种族，并将此“第四种族”抬高到了无冕之王的高度。他说：“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彼若预言，则可以征国民之命运；彼若裁判，则



浮士绘：日本实行立宪后，媒体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图为1890年日本召开国会。

可以断国民之疑狱；彼若为立法家，可以制订律令；彼若为哲学家，可以教育国民；彼若为大圣人，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彼若为救世主，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其势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

媒体的相对独立，对行政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制衡。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反对党，曾比政府更激进地鼓吹向朝鲜进军，甚至准备弹劾“软弱”的政府。不堪“干扰”的政府干脆解散了议会，但反对派却利用媒体，更猛烈攻击政府的“因循误事”。日本的《国民新闻》甚至扬言，如果政府屈服于清国，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地反动，而且也将使国民的舆论沸腾起来”，其言论尺度已近于煽动。

甲午战中，日本的媒体积极参与战争报道，《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邮便报知新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和《中央新闻》等，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官方对媒体的开明姿态，获得了媒体的主动配合，美化战争、美化日军，成为日本媒体的自觉行动，有效地凝



浮士绘：成欢战役，图的右下方描绘的是日本战地记者正在采访和写生。

聚了日本的民心士气。

反观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媒体的运用均相当漠视和迟钝。

在高升号事件中，中国驻英国公使龚照璠即提醒李鸿章，事件的解释多出自日本人之口，这是危险的，中国应加强在海外的舆论宣传。但清廷的作风相当僵硬，自以为正义在手，坐等英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看着日本人将原本亲华的英国舆论彻底扭转。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史料记载，为了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搞好关系，中国公使杨儒总是想方设法接近葛礼山的夫人和孩子，从私情入手；而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则天天去办公室拜访，互相交换信息，从公谊下工夫。

德国学者认为，中国对西方媒体完全持排斥的态度，不允许任何一名记者随军，军事顾问是仅有的随军西方人员。而日本则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个能宣扬自己的机会，这导致两国的国家形象出现了巨大落差。

中国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也没有为任何一家中文媒体签发采访证，媒体的对外宣传、对内动员功能被弃置，导致中文媒体的报道甚至比西方媒体更滞后、更不可靠，甚至出现错误报道。钳制媒体的后果是不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导致了对政府更为反感的情绪蔓延。

而当时各口岸的中文报业，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多在租界内办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经办的，清政府要控制“新闻导向”是相当困难的，其报道的自由空间远高于日本同行。但中文报纸依然自觉过滤新闻，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一片声地喝彩，成为国际丑闻。

即使面对战败耻辱，中文报纸仍有本事找到嘲讽日本的“新闻眼”。北洋旧舰操江号被日军俘获后重新使用，《申报》、《字林沪报》等先后发文，嘲讽日本将“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的破船当作宝贝，还为如此小事奉告先祖，“言词夸诞欺及先人”，先人“泉下有知，当深恨子孙之国祚将倾，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为者？”对日本的无谓嘲讽充斥中文报章，而在日本报纸上常见的扎实的社会调查报告，在中文报纸上却难觅踪迹。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受此任命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弹，中国人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

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时，“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

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动乱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敷衍、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图为清末载泽夫人身着洋装与身着旗装的外国使节夫人合影。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 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二十二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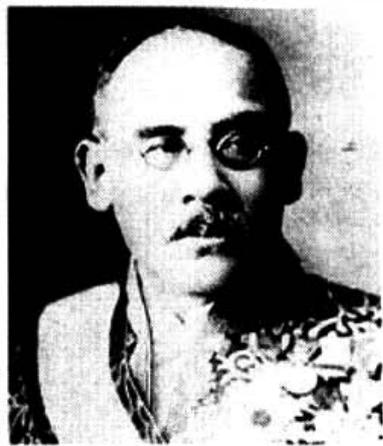
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右)、青木周藏(左)等人。

青木周藏(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到18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

加藤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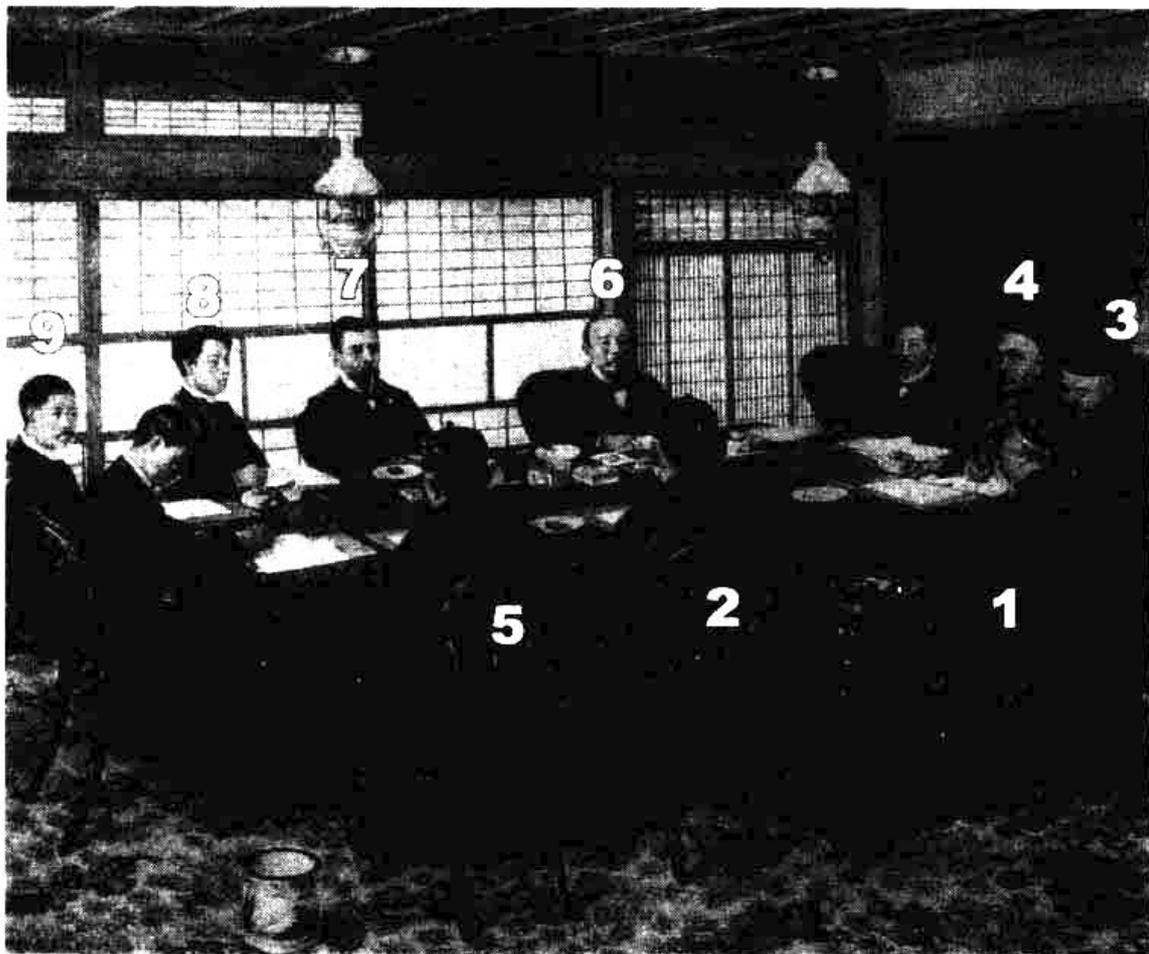
(第24代)



加

万延元年1月3日生
大正15年1月28日死去(66歳)
出生地:爱知

图为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



中日马关谈判。中国代表李鸿章(1)、参赞李经方(2)、罗丰禄(3)、伍廷芳(4)、马建忠(5)。桌对面右起伊藤(6)、陆奥(7)、内阁书记官伊东己代治(8)、外相秘书田中敬义(9)。

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 1860—1926年),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 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 1865—1936年),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



昔日留英同学，如今伊藤博文（右）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廷芳（左）还屈居幕僚。

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遑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日本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嗇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当“鬼使”遭遇“神差”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璠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璠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清政府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清政府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璠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清朝政府背了黑锅。

龚照璠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璠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激发的英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璠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璠，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

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



总理衙门大臣成林、文祥、宝鋆合影

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辞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和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狴，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

反清复明的解放者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第十编）日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第九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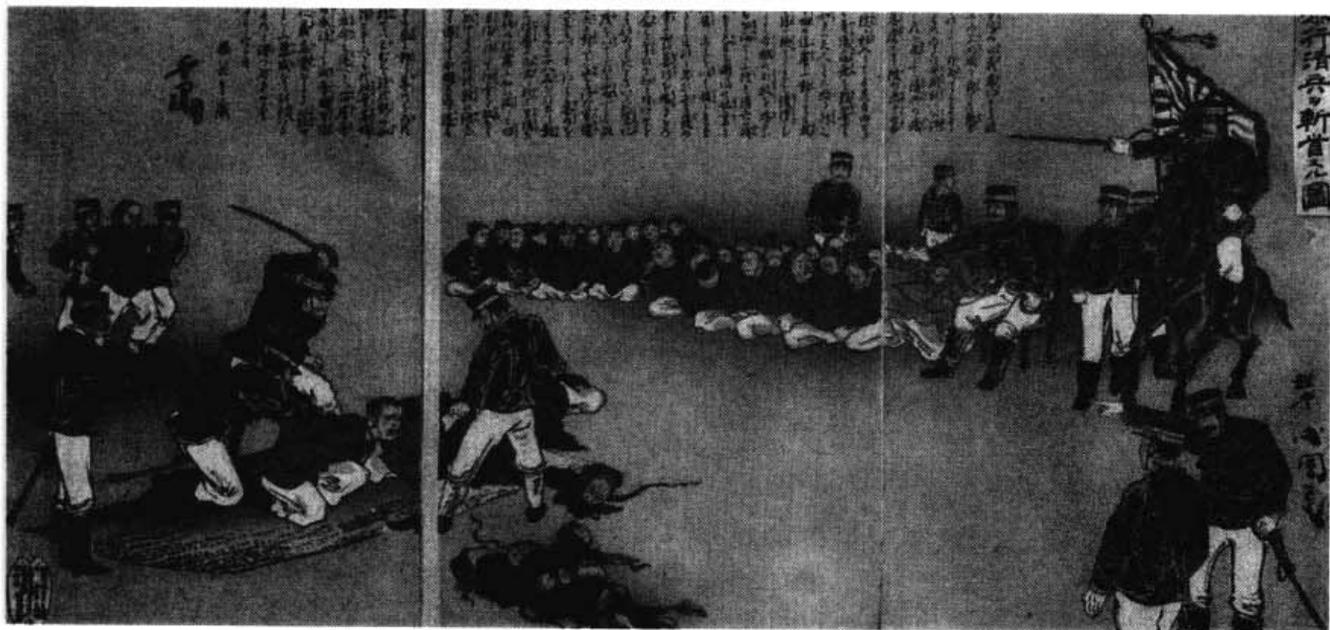
日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详见本书相关章节）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日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

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日清战争实记》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同样的事例也曾发生于二战期间，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日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的光复大军，足见日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的深入人心，也足见日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日本将自己打扮成文明的传播者和亚洲的解放者，图为浮世绘渲染日军处决所谓在朝鲜犯下暴行的清军。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动。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纵观世界史，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

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清政府更能代表“中华”的日本，在它的军刀挥向东亚大陆的同时，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国上下的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潮流，多种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后世学者在研究二战中日本在华操纵当地人建立所谓“自治”的伪政权方面，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无数的当地要人愿意与之合作以致“遍地汉奸”。这一系列今日看来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放到当年真实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令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之处。

有国才有家，大梦谁先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重要摆脱“落后就要挨打”处境的国家诉求。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开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之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

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大清国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



100多年前，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大声呼吁：“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

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

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

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遑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国家在体制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 and 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终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

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族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反满”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的“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股脑儿归结到作为“鞑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鞑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

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一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鞑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 (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

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秘。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清廷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颀硕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大清帝国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清廷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

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



长州五杰：远藤谨助（左上）井上馨（左下）井上胜（中）伊藤博文（右上）山尾庸三（右下）

的军事行动。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本式“汉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300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袭，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的分道扬镳。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自宫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禁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辍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嬴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

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 and 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

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题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

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海龟”大对决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在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每天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反观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却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以翁同龢为代表的“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将相不和”从来就不是坏事。更为惊心的是，中日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日本与北洋的战争，战力尚在的南洋舰队袖手旁观，更别说执行清议所夸夸其谈的挥军直捣日本



本土，演一则围魏救赵的好戏了，西方报道就曾略带尖刻地指出甲午战争其实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

日本的决策层年富力强，伊藤博文时年54岁，而中国决策层相对老迈，李鸿章当时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翁。这简直就是旭日帝国挑战老大帝国的生动写照。

日本尽管有内争，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好，闹归闹，朝野还是一心对外，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各阶层空前统一，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等造成的隔阂，迅速被弥和。而中国方面，清议扰扰，说风凉话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乘机诬陷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的，令李鸿章愤怒异常。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都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上图为伊藤博文的中国书法作品。

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政府首脑，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身，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当李鸿章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情感牌”来和伊藤套近乎时，伊藤一边用“中堂之论，甚惬我心”顺势化解，一边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扔还给李鸿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倒也坦率：“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后，士大夫果然被震惊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将责任悉数归咎到李鸿章“卖国”，拒签马关条约、请诛李鸿章的呼声响彻朝野。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

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随后，知识分子再度沦为政争工具和牺牲品，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逃亡海外的所谓改革者，迅速地将悲情变为敛财乃至大交桃花运（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财两得”）的道具；而无论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认定了“枪杆子”强过“笔杆子”，握笔的手开始纷纷拿枪，其杀伤力竟是武夫们自叹不如的。

甲午战争也同样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的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判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无论是地位还是功勋，伊藤都逊色许多，但有一事却占足上风：他“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势禁形格，李鸿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样是梁启超所记，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见，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矍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不知当日李中堂与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许中堂大人也希望有惊雷掠过而落箸吧？！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在朝鲜剑拔弩张，危机一触即发。日本不顾中国提出的共同撤军的要求，反而不断增兵。英、俄等国多方调停未果，就在战争打响前几天，一心要维护东亚安定的英国抛出了个惊人提议：沿仁川、汉城一线分割朝鲜，由中日两国分别占领。

其实，这一提议是由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首先谈起的。1894年7月14日，青木周藏晋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 (Kimberley)，商谈英日商约修改之事。双方论及朝鲜局势，青木建议，由于中日两国不可能达成从朝鲜撤军的协议，最好的方案就是两国继续共同占领，分头驻扎，即双方军队撤出汉城和仁川，以此为界，日军占领朝鲜南部，中国占领朝鲜北部。如此，不但可以避免双方冲突，还可以逐步实现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

从事后的各方走向看，青木周藏此一建议，并非日本官方政策，有可能是这位老辣的外交官对汲汲于调停的英国的忽悠，也有可能是他确有此想法，先作一试探。

但金伯利一听，大为激赏，遂作为英国新的调停目标，电告驻中国公使欧格纳，要求其与总理衙门协商，以此作为防止冲突、争取谈判时间的应急措施，同时也电告了驻日本代办巴健特。

7月16日，金伯利亲自将此提议告知中国驻伦敦公使龚照璠，并要求龚照璠先报告给李鸿章，然后再与总理衙门商议。

欧格纳与总理衙门的协商是在7月18日。当日，欧格纳拜会总理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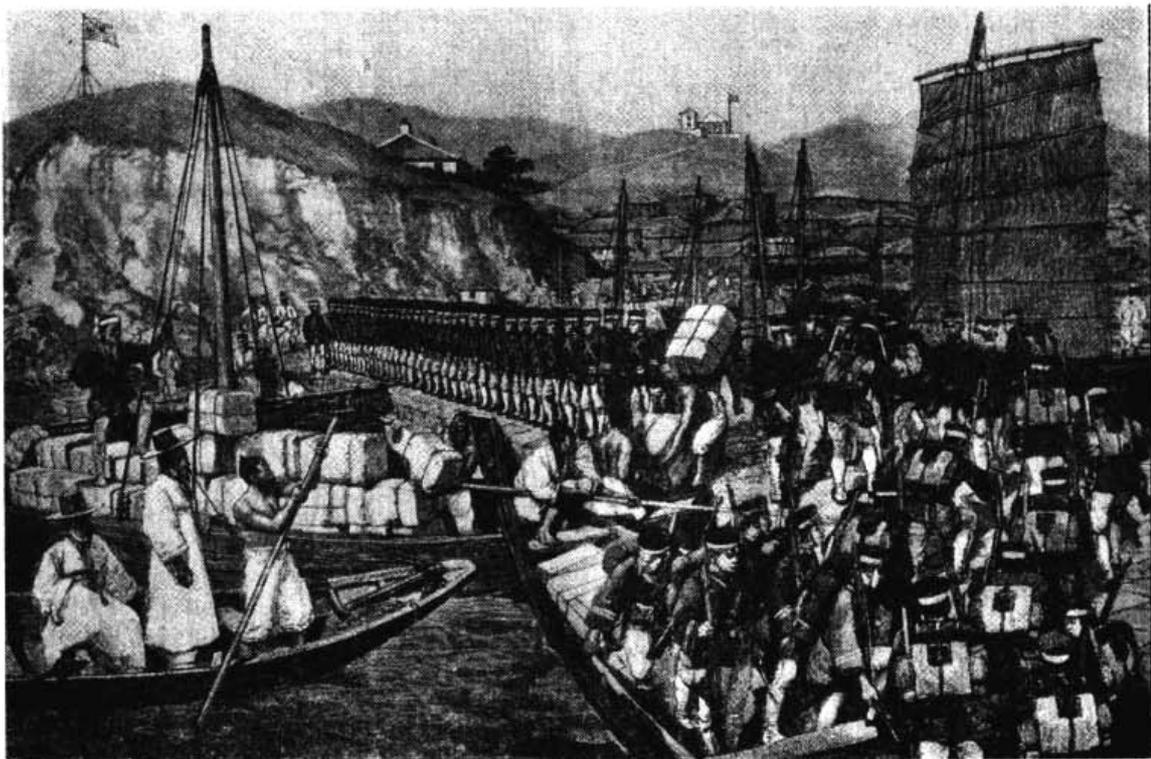
大臣奕劻等，共同讨论朝鲜局势。会议期间，英国使馆给欧格讷送来刚收到的伦敦电报，电报中告知说英国政府已经向龚照璠提议，中日双方以汉城为界分头驻扎，“彼此不至见面”，然后从容谈判。欧格讷看后，遂将此建议告知奕劻等。中国方面此时尚未得到李鸿章及龚照璠的报告，便表示：“此说尚公道，俟我们公商后再覆。但不知日本肯听否？且俟龚大臣电来再说。”

次日，李鸿章所转龚照璠的电报送达总理衙门。李鸿章认为，中日分占朝鲜以汉城为界不妥，因中国军队主要集结在朝鲜南部的牙山（此处是东学党叛乱的前线），如此划界，容易引起冲突，不如请英国要求日本撤出仁川，将其作为“通商公共地”。

总理衙门商量后，决定接受分占朝鲜的建议，7月20日电令李鸿章通知龚照璠将此决定转告英国政府。总理衙门认为，将朝鲜分割为南北两半，中国控制北朝鲜，与此前军机处提出的将驻朝军队往北收缩是相符合的。但是，



清廷总理衙门决定接受分占朝鲜的建议



1894年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

前线将领叶志超提出，军情危急，如果从海路移防平壤没有安全保障，而从陆路移防，则必须经过日本防线，且日军兵力远甚于清军，他提出继续留驻牙山待援。李鸿章也建议向牙山增兵，一是保障牙山清军安全，二是在紧急时候还能与北面的大军夹击日军。这一部署，显然与中国占领北朝鲜相矛盾，总理衙门要求李鸿章“妥善统筹”，处理好“牙山孤军在日军重兵之后，究竟如何进退自如”的事宜。

龚照璠接获国内指示后，几乎天天到英国外交部打听进展，但日本对分占朝鲜之事却无答复，直到7月25日丰岛战火燃起，龚照璠还在每日发李鸿章的电报中告知“倭无回复”。

其实，日本方面在得到英国的正式提议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反应。在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7月19日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报告了在其与金伯利的会谈，金伯利透露说中国对分占朝鲜表示认可。金伯利同时警告日

本，如果在20日未能协商成功，中国将向仁川派兵12万。青木本人的意见是倾向于接受分占朝鲜，他认为这样的话朝鲜就成了另一个埃及。但他强调，在与中国订立占领条约时，一定要保障日本利益。

而在日本驻华临时公使小村在北京与欧格讷会晤后，认为分占朝鲜的方式只对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有利，小村本人反对这一建议。

日本政府也并不准备接受这一和平获得南朝鲜的机会，在7月21日发给青木的训令中，明确拒绝这一建议。训令中说，一方面，外务省因电报线路问题，迟至7月21日才收到青木前电，因此，英国设立的20日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日本亦已向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现在就不可能考虑另一个计划”。

英国当然很不高兴，但还希望日本能回心转意。7月26日，英国驻日本代办巴健特向日本外相陆奥提交备忘录，解释说分占朝鲜就能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此前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过分的（应指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但中国方面表示可以考虑将日本所要求的在朝鲜“与中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改为“与其他列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并且表示，“日本政府不应失去此时机，因为中国以后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准备倾听我们的劝告”。

巴健特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前一天，日本军舰在朝鲜不宣而战，攻击了中国军舰及运输船，并且打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日本所希望的，不是汉城以南，而是整个朝鲜，并且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其作战方案的底牌就是：一旦海军战败，丧失制海权，则海陆军全线收缩回本土，抗击中国必然到来的报复。

朝鲜的一次南北分裂被戏剧性地避免了，但东北亚却迎来了更为血腥的新世纪……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军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抗日。正当大清军队在前线屡战屡败，引起全国民心失望的时候，上海却爆出了大新闻：一支娘子军已经整装待发，开往抗日前线与敌奋战。

上海的著名媒体《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了这一雷人的消息。报道说，左宝贵战死沙场后，其夫人“痛夫情切”，“号召巾帼中之有须眉气者”，建立了一支娘子军，要“为夫报仇”。



《点石斋画报》爆出大新闻：娘子军“为夫报仇”。

甲午战争中，因作战英勇而捐躯，并被时人和后人一直景仰和祭奠的清军高级军官，并不很多。陆军的左宝贵与海军的邓世昌，是其中的卓越者。左宝贵并非出身李鸿章的淮军，而是跟随僧格林沁起家的，在北洋系大军云集的朝鲜战场，他算是少数派。平壤保卫战中，他为了表示誓死的决心及激励士气，居然身穿黄马褂及全套朝服，翎顶辉煌地指挥作战。左宝贵驻守玄武门，因主帅叶志超临阵脱逃，防线被日军突破，左宝贵所部坚守阵地，左宝贵亲燃大炮向敌军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颗”。部下感奋，拼死抗御。日军炮弹弹片贯穿左宝贵肋下，但他负伤不退，终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而阵亡。左宝贵迅速被大清政府树立为爱国典型。

《点石斋画报》报道说，左夫人组建娘子军的事惊动了紫禁城，皇上看过本章，止之曰：“中国堂堂之上邦，满朝文武，与左军门报仇者何患无人。何必使妇人从军，为外邦见笑耶？”遂不许为夫报仇之事。在整个民族最悲痛的时刻，《点石斋画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娱乐大众，至少起到了精神上减痛的作用。娘子军的报道，自然又是其“新闻体”小说的一种，遍查史料也找不到此支娘子军的丁点信息。百年前的传媒人，其忽悠和娱乐精神丝毫不输于当代。

《点石斋画报》经常以小说般的新闻高举正确的舆论导向大旗，迎合民众，清军在前线的溃败都被报道成了大捷。朝鲜牙山战役（又称成欢之战）清军大败，《点石斋画报》却发表了一篇图片报道，题为《牙山大胜》，报道说：

牙山离海口不远，向为华兵戍守之所，此次叶曙卿、聂功亭二军门之督兵援高（即高丽）也，驻守期间，颇得形势。乃倭人不知利害，突于六月二十五、六等日，有倭奴之名亚希玛者，闻中国六军将到，深恐四面受敌无处逃生，遂率倭兵四千余人前来攻击。时华兵仅二千余名，各奋神威，短兵相接，无不以一当十。鏖战良久，我军大获胜仗，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刃伤倭兵不计其数。倭兵官见势不佳，急调占据韩京之兵回阵助战，而兵锋既挫，依然败北而逃，倭兵死亡枕藉，满目疮痍，



牙山大捷：点石斋画报的假新闻



浮士绘：牙山大捷图

有自相践踏者，有长跪乞哀者，悲惨之形动人怜悯。华军声威大振，奏凯而回。是役也，我军以少胜多伤亡无几，而倭兵已死伤过半矣。若待厚集雄师大张挾伐，吾恐倭人皆不知死所矣！”



日本《日清战争图绘》对叶志超进行嘲讽

日本人在当年的画报中，描绘了另一种牙山战役画面。在我收藏的多种日本当年的战斗画报、杂志中，那化装成女人逃走的叶志超俨然是大清的第一名人。东阳堂发行的《风俗画报》增刊《日清战争图绘》，其每期封底基本都是广告，而独为叶大人放弃了一期广告，将他作为封底人物，并配诗一首：

功名非所慕 / 一意只奔逃 / 鹤唳风声际 / 知君汗马劳

在该画面上，为日本将军配的诗是：

挥刀时逐敌 / 跃马又冲营 / 一将奏功日 / 万邦传大名

显然，两首五绝中，文字上看，描写叶大人的这首嘲讽诗要明显优于另一首赞美诗，似乎又一次验证了拍马的文字都不如激愤或嘲讽的文字。

文章憎命，笔杆子编出来的胜利毕竟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胜利，倘能报捷，即使秃笔又何妨，而为粉饰，笔下生花亦是枉然……

中国此类传奇历来不少，虽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但也展现了中国人在自我精神治疗方面的特殊能力。从历史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或团体热衷于制造娘子军、儿童团的神话时，这个国家或团体估计也不会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些把戏。

日本人在当年的画报中，描绘了另一种牙山战役画面。在我收藏的多种日本当年的战斗画报、杂志中，那化装成女人逃走的叶志超俨然是大清的第一名人。东阳堂发行的《风俗画报》增刊《日清战争图绘》，其每期封底基本都是广告，而独为叶大人放弃了一期广告，将他作为封底人物，并配诗一首：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一位日本老父亲，给身在前线的儿子写信，勉励他为国家鞠躬尽瘁，不必顾念家中一切，丝毫也没有受到“军国主义”胁迫的痛苦和无奈，字里行间倒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这封信，显然十分符合日本政府的舆论导向，因此，可以被半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所转载（第三十一编）。

这位父亲，名叫森鸥村（森是姓），信是写给他儿子森贞吉的。显然，森鸥村有着相当厚实的汉学修养，全信均用汉文文言写就，用典用词也比较讲究。《日清战争实记》收录时，题目是《送儿贞吉从军之支那序》，估计应该是战后将家书（包括诗文）合集出版时，将这封信作为序言之用。甲午战争胜利后，很多日本文人都将战时家书合集出版，以纪念他们这场“伟大的胜利”。在当时的日本报刊中，这类书信集的广告不少，可见其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这些私人出版物现在也成为甲午战争研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惜中国学者基本对此十分漠然。

森鸥村在这封家书中，首先把战争全貌描述了一番：

日支构难，已数阅月。我陆海军，于丰岛，于威海，于牙山，于平壤，于黄海，连战连胜，连奔逐北。悬军长驱，饮马鸭绿江，直陷奉天，以为根据。陆海并进，行将屠山海，破天津，只冲北京，使清帝面缚舆榇，降于我轅门，何其勇且壮也。夫平壤者，敌兵悉锐死守，而我兵一蹴就之，

优胜劣败，大事已定。

这段中，“面缚舆榇”典故出自《左传》：“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经，士舆榇。”意思是双手反绑、用车载着空棺，表示投降并自请极刑。面缚舆榇基本是中国历史上投降的主流模式，刘阿斗投降时就用的这个仪式。一个日本乡间的老先生，也在憧憬着中国皇帝投降的一天。

随后，这位父亲谈到明治初期的内战，认为那是“同胞相杀，有中心难忍者”，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这场对华战争就不一样了：“今役不然，伐异域，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故苟有义气者，所在蹶起请从军，皆不允，欲率汝辈以终局，其幸荣果如何哉。”内战、外战，于国民情绪当然是不同的。国内外史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日本当时国内矛盾很尖锐，经济发展停滞，发动甲午战争的直接目的之一的确是转移国内矛盾。

这位父亲深情地开始为远在中国的孩子担心：“虽然自犯兵家忌，方冬北



日军攻击中国本土时，天已大寒，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图为清军在威海卫时的情景。

伐，驱数万兵马，转战于层冰积雪间，防寒之具虽备，恐不能免冻死。或免，不婴疾病者殆稀。”显然，他对此一战争的残酷也有了相当的认知，后面就提到了拿破仑征俄故事。“往年莫斯科之战，佛人（即法兰西）冻死者十余万。我台湾役，毙瘴毒者亦伙。”

他说：“殷鉴不远，可不寒心乎？于寻常寒暑，犹且害人，况其酷热者乎？人非木石，少（稍微的意思）不惯水土，往往酿疾，况淹万里客土，日夜冒冰雪。虽强健着不能免，况汝蒲柳之质，一朝伤寒，不死敌而死病，使余失嗣子，以永绝先祀。不幸孰大焉？”亲情流露，思绪复杂。

接着，他说：“顷读陆军省报告，在韩兵卒，病死者不堪，盖中暑之所致。今也夏过冬将至，北地严寒，果出意料外，汝何以能耐之？余之所杞忧是而已。”这说明，日军在夏季战斗中，因天气因素伤亡较大。甲午这一年，夏季特别炎热，冬季特别寒冷，交战双方都相当艰难，但清军毕竟占据“主场优势”，如果准备应对得当，天气可抵十万雄兵。时人有论述到那年天气的，认为这是天意怜我，但天意二字，实在莫测，黄海大东沟海战时，我舰就曾发一鱼雷，直射日舰比睿号，但居然在即将触舰时，鬼使神差地潜入舰底下方穿过，敌大惊而终无碍，诡秘异常。

情已诉毕，理就上来了。在“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后，森鸥村劝导儿子，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

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读信至此，即便身为仇敌，也不禁肃然。最后，这位父亲教诲儿子要团结战友：“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輿望。”

在《日清战争实记》所收录的大量用汉文写作的诗文中，这封家书是最令我感慨和唏嘘的。这么好的一封信，它所激励出来的，是怎样一个儿子、

怎样一个军人呢？再看看那些充斥战时杂志的商业广告，甚至直接用杀人图片作为招徕，这难道只是“广大人民”被“一小撮军国主义者”蒙蔽和裹挟了吗？

中国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将近现代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上，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自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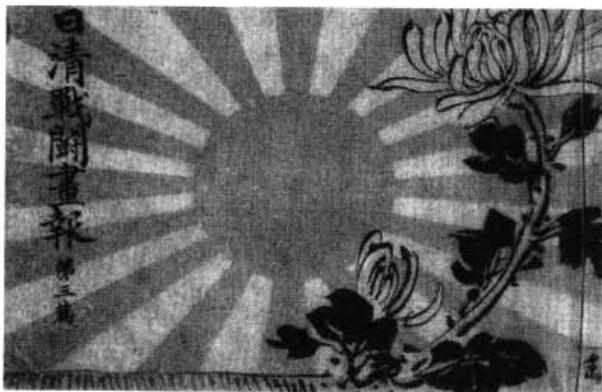
所谓“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更是由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百年祸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甚至战争发动本身，也是为了让这些“人民”能提高生活水平，拓展生存空间。甲午战争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海外作战，成功地在刚刚统一起来的日本推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日本人第一次集体凝聚到了同一面旗帜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而甲午战争也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经济，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此后不断移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由武装平民组成的“满蒙开拓团”等民兵组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都在中国扮演着积极的殖民者的角色。

鲜政府乞援于宗主国中国，日本是不请自来，霸王硬上弓）。

圣上轸念乃顾旧盟，为告清国。欲左提右挈与共靖其难。而清人傲顽，不啻渝其盟，翻镞乱人，阴为之声援，又敢派大兵，邀击我战舰。圣上乃发诏宣战，大戒六师，鳞艘蔽海，铤蛟满野，以讯其罪，名正言顺，旭帜（太阳旗，华人常贬之为膏药旗，近有网友恶搞考据此即日人为武大郎后代之据也——烧饼旗）所指，势若破竹，陆拔金城，海挫铁舰，盖平之攻，积尸成田；旅顺之陷，流血漂鹵（旅顺大屠杀果然是流血漂鹵，日本人其实一点也不隐讳），而韩人之内斗，烟散雾销，八道自安定矣。

清人惶惑不知所出，特差重臣乞和，割土地偿军资。圣上宽仁，遂听其请，方始憩师。大奏凯歌，振旅而旋。恭惟我有事于海外旧矣，自神后尔来，观兵耀威，固不一再而止。然其宣扬威武，光被仁恩，使海外万国，重我如九鼎大吕（该目的倒真是达成了，日后再与沙俄一战，更是奠定日本的东方霸主地位），若是役者旷古所未有，是固虽圣天子文武圣德，应天顺人之所致，元勋画策适机宜之效，抑亦谓之非从军诸子克履果毅，若貔若虎视死如归，忘家报国之功可乎哉？

是役我村中从军者九人，皆力战立功，相继罢归。于是，同志胥谋，椎牛沥酒，以慰其劳，且将刻其事于碑，以告后昆。若夫诸子雄心奇迹，则载在史乘，人皆知之，余复何赘焉？



《日清战争画报》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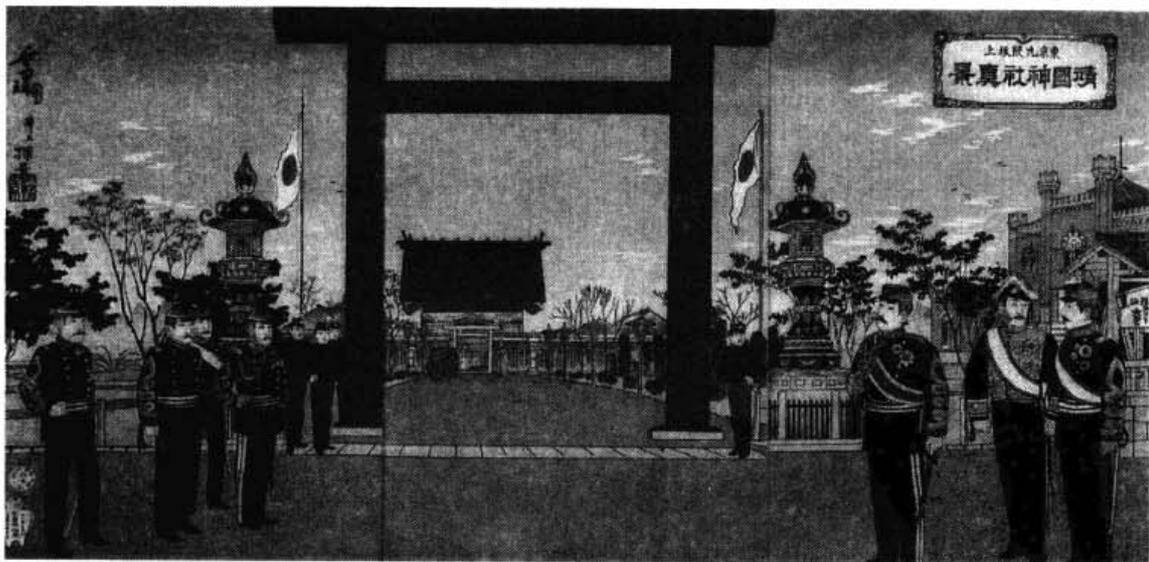


《日清战争画报》内页

看全文之语气，这岂止是一个小村庄的碑文，便是供奉到东京作为英雄纪念碑也不惶多让，由此亦可以窥甲午之胜令日本全民如何膨胀。

日本的文化人，也在积极地记录甲午战争，争夺日后历史的发言权。《日清战争画报》的编绘者米仙田宽，就在画报的序言中，毫不隐讳地表示，要将日军的“丰功伟绩”记载下来，“裨益世教，启人心智”。他说：“若以古人投笔从戎为轩昂之事，予实为荷笔从军，目睹此世所无双之雄壮战争，欢欣雀跃之余，不揣笔墨之浅陋，且无暇深思熟虑，仓猝执笔，将所睹之场面诉诸丹青，固为渺小之册，倘于世教能广有裨益，即或聊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亦为一大幸事。即令仍为无用长物、赏玩之具，又有何虑哉？”

半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足足有50卷，而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树碑立传之外，日本人更是在全国各地为“烈士”们举行葬礼，连那些被大清政府处决的间谍们的尸首，也不惜大费周章，挖掘出来，运回国内，隆重安葬。一排排的神位被放置到了靖国神社，天皇亲临祭奠。相比较之下，不说是百年前的甲午战争，即使一个甲子前的抗日战争，我们那些阵亡的将领们，又有几



浮士绘：靖国神社外景



浮士绘：靖国神社内景

人还能被后人记住名字？更有几人还能在天堂享受到后人的祭祀呢？“公祭”一词虽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

在日本人将他们的英雄供奉于靖国神社，即使冒天下之骂名也在所不惜时，偌大的中国，能为抗日英雄献花默哀之所在，尚余几何？神州万里，如果我们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儿呢？

后记

十多年前开始收藏晚清文物时，我刚开始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离开洋溢着母鸡翅膀般温暖的机关和报社，下海经商，在上海郊区打理一家高科技医药生产企业。

当时绝对想不到，以我曾经客串的中文财经专栏作家身份，也能获得澳大利亚移民部的热忱欢迎。于是没多久，“下海”经商便与漂洋“过海”一同进行了。“空降”到澳洲后，还没来得及向任何一只袋鼠做自我介绍，便又以一个完全外行的身份开始执掌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亚洲市场业务。剧烈的变化，令我在那段时间常感窒息，除了住家附近的悉尼歌剧院之外，任何名胜景点都没去过，倒是因为公务，隔三差五就要到墨尔本、布里斯本等设有分公司的城市出差。在澳洲有限的这几个大城市中，我至今唯一熟悉的就是从机场到公司的路。

那时，我做出了一个并不痛苦的选择：封笔！不仅是因为写作的时间对我来说过于奢侈，更因为直接下海游泳后，才发现自己当年的所谓财经评论是多么稚嫩可笑。

随即，工作之外的少数时间缝隙便被文物收藏所填满。不断地收集，不断地比较，其间便不断会有写作的冲动，也只能强行抑制着，因为我给自己的心里写下了四个字：厚积薄发。

再后来，便有机会到国内参与地产开发，一个绝对“纸醉金迷”密集型的行业。巨额的资金进出，复杂的利益交换，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面对各种相当可爱的诱惑。于是，我开笔写作，一是将积累了近十年的思考整理释放出来，二是藉此帮助自己稍稍增强点抗拒“纸醉金迷”的“慎独”功力，令自己那并不宽广的胸怀中，不至于完全被金钱和欲望所占领。

对我而言，起初的历史写作纯粹是件“独乐乐”的私人游戏，信马由缰地在博客里涂鸦，与几个老同学、老同事互相唱和。没想到，博客的点击量很快上升，那些散漫的文字开始顺着网络蔓延，报刊、电视台和出版社也费尽周折找上门来，

成了“众乐乐”的互动游戏。开专栏、出专著、做顾问，游戏不再，而成了严肃的交流和共享。尽管被突然而来的虚名晃得有点恍惚，但我内心依然坚持“独乐乐”时的写作标准：认真地找一段新史料，说一个好故事，谈一个新观点。

这本书是个集子，把我近年零星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一些文章重新梳理了一遍。其中一些内容，当年在报刊上发表时，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和讨论。我个人觉得，比我这些粗浅的文字和观点更有意义的，或许是我从私家收藏中挑选出来的近百幅图片。这些图片几乎都来自百年前的日本宣传品。我也尝试着找大清国自己出版的图片资料，但除了《点石斋画报》有少部分相当粗糙的图片外，别无所获，令我叹息良久。

需要感谢我的朋友隋丕宁，他是我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编辑，后来又成了我与国内媒体和出版界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也要感谢文汇出版社北京中心的叶文龙，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写作，而我习惯了报刊的立竿见影，向来对周期漫长的出版敬而远之，文龙兄用他的热情和专业，令我对出版有了更深的了解。正是在他们俩的帮助下，这本书才有了清晰的框架结构。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Beryl和Ceri，虽然她们总是更习惯说英文，中国对她们来说只是一个有着一大堆亲戚和一大堆美食的遥远地方，但我还是希望她们有朝一日能对祖籍国的历史发生兴趣。

我也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曾经斗胆地提醒他们，他们那代人所被灌输的“近代史”是有着大问题的，因为缺少了最基本的要素：“真实”，并且我坚信，“真实”的缺位与他们所亲历的这么多民族苦难，也有着直接的必然的关联。

我要向读者朋友们报告：这本书或许有着很多瑕疵，但它是认真的，也是真实的，我将因此而对于您付出的书款感到问心无愧。

最后，我有个请求：不管你信仰什么，请在翻完这本书后，与我一同祷告，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坚韧不屈的民族！

谢谢。

雪珥 2009年5月31日晚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主要参考资料

《日本外交文書》，日本外务省档案

《日清战争实纪》(1-50卷)，博文堂，1894-1895年版

《東亞先覺志士記伝》(3卷)，日本黑龙会编，原书房1933年版

《对支回顧録》，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原书房1968年版

《日清戦争》，檢山幸夫，东京讲谈社1997版

《东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大江志乃夫，东京立风书房1998版

《日清戦争から芦沟桥事件》，吉岡吉典，新日本出版社1998版

《日清戦争と东アジア世界の变容》，大畑篤西郎，东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编，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版

《近代日本の形成と日清戦争》，檢山幸夫，东京雄山阁出版社2001版

《日清戦争期の韩国改革运动》，柳永益，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2000版

《日清・日露戦争と法律学》，白羽佑三，东京日本比较法研究所2002版

《明治前期日清交渉史研究》，安岡昭男，东京岩南堂书店1995版

《日清戦争と陆奥外交》，深谷博治，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40版

《竹桥騒动と日清戦争》，名草杜夫，东京回天発行所1994版

《日清戦争の军事戦略》，斎藤圣二，东京芙蓉书房2003版

《东郷平八郎全集》，小笠原长生，东京平凡社1930版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 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 1989.《英国外交档 / 中日战争及三国干涉 (1894-189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3., Reports, correspondence, returns and dispatches respecting Japan 1871-99.《英国议会档 / 第3卷》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 5, , Diplomatic affairs :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notes and conventions respecting Chinese relations with Great Britain and other countries 1860-99.《英国议会档 / 第5卷》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 17, , Commercial reports : 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 1890-94.《英国议会档 / 第17卷》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 22, , Reports of journeys in China and Japan by members of Her Majesty's consular service and others 1868-92.《英国议会档 / 第22卷》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Ser. 3, ,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 1, , The China scene V. 2, , The Sino-Japanese War, 1 .Dacids, Jules. Scholarly Resources, c1981. Wilmington.《美国外交档第

3 编 / 从中日战争到日俄战争, 1894-1905》

Kenkenroku: a diplomatic recor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c1982.《蹇蹇录》

The I.G 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1975《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信集)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A STUD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PHILIP JOSEPH, Law Exhibitioner (McGill), 1924《中国外交 1894-1900: 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研究》

The Pigtail War :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Dorwart , Jeffery M.,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5.《猪尾之战: 美国与中日战争 1894-1895》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Paine , S. C.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日战争 1894-189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7册),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1957年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12册), 戚其章主编, 中华书局, 1991-1996年

《中国海关密档 / 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1874-1907》(1-9册), 中华书局, 1990-1996年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册), 三联书店, 2005年

《蹇蹇录》, 陆奥宗光, 商务印书馆, 1963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王信忠, 国立清华大学出版事务所发行, 1937

《中日战争》, 王钟麟等, 商务印书馆, 1930

《甲午战争的教训》, 钱安毅, 正中书局, 1939

《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研究), (日) 田保桥洁, 南京书店, 1932

《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 1935

Times (英国《泰晤士报》)

Le Petit Journal (法国《小日报》)

New York Times (美国《纽约时报》)

Chicago Tribune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Los Angeles Times (美国《洛杉矶时报》)

Wall Street Journal (美国《华尔街日报》)

Washington Post (美国《华盛顿邮报》)

《申报》

《字林沪报》

North-China Daily News (上海《字林西报》)